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46期 | VOL.46 NO.4



4 · 2024

TAIZHOU XUEYUAN XUEBAO

台州学院·校史馆



临海校区校史陈列室



椒江校区校史馆

台州学院办学源头上溯至1907年成立的三台中学堂简易师范科，在百余年的办学过程中，虽历经曲折，但始终薪火相传、弦歌不辍。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学校先后建成临海校区校史陈列室和椒江校区校史馆。

临海校区校史陈列室建成并开放于2008年。陈列室以“长河涌潮：台州学院百年史巡礼”为主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和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反映了我校百年办学发展历程。陈列室分“顺时而起，顽强成长”“烽火弦歌，勇赴国难”“迭经磨难，终归正道”“枯木逢春，健康发展”“乘风破浪，沧海扬帆”五个部分，以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办学精神为主线，展现了学校

不同时期的办学风貌。

椒江校区校史馆筹建于2018年，2020年12月建成开放。全馆展陈面积1200多平方米，设有序厅、历史厅、成就厅、校友厅四个展厅。

序厅系统性地展示了自1907年三台中学堂简易师范科至1978年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再到2002年升格为台州学院的总体办学脉络。

04

Vol.46 No.4

台州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总第246期)

中国人文学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317000
Postcode

网址 <https://journal.tzc.edu.cn>
The URL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 (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xbb@tzc.edu.cn
E-mail

电话 0576-85137169
Tel.

目次

科学技术史

- 刍议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及其与他类典籍的关系厚宇德 | 01
- 《菽园杂记》及其中的科技史料姚登程 | 07

哲学

批判二元对立思维

-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过往研究的反思彭志恩 | 12

天台山文化·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

- “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徐克 | 21
- 中华和合文化源头新探杨供法, 杨轲玮 | 26
- 论文化组学视角下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周芬 | 34

语言

-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对中国译学创新的启示胡作友, 陈晓敏 | 40
- 人际类关系名词的语义及其词典释义高翀 | 47

文学

论英剧《天堂一刻》对左拉小说《妇女乐园》的松散改编 ···王欣 | 55

何为“诗的内容”？

——雅各布森隐喻和转喻理论视野下的废名诗论探析 ·····徐旭敏 | 62

拉丁精神和身份构建

——罗多《爱丽儿》的美洲主义构想 ·····陈义山，马翔 | 68

诗学视域下“清风”到“林风”的分化

——以魏晋为源起 ·····冯琪琪 | 75

法学

三维视角下整合设立背信罪的思考 ·····阮俊杰 | 82

书评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周兴陆 | 88

CONTENT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iterary Sketch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Sketches and Other Book TypesHou Yude	01	
<i>Miscellanies from the Shu Garden</i> and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tYao Dengcheng	07	
Deconstructing Binary Oppositional Thinking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Past Research into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Practice, Nature, and AestheticsPeng Zhien	12	
Hehe Cultur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2023 Global Forum on Hehe Culture"Xu Ke	21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oot of Hehe CultureYang Gongfa, Yang Kewei	26	
A Study on the Global Transmission of Han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omicsZhou Fen	34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Research to China's Translatology InnovationHu Zuoyou, Chen Xiaomin		40
Semantic Analysis and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ounsGao Chong	47	
On British TV Series <i>The Paradise's</i> Loose Adaptation of Zola's <i>Au Bonheur des Dames</i> ...Wang Xin	55	
What Is "Poetic Content"?		
—Analyzing Fei Ming's Ideas of New Poetry in the Theory of Jakobson's Metaphor and MetonymyXu Xumin	62	
Latin Spiri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Rodó's Americanist Vision in <i>Ariel</i>Chen Yishan, Ma Xiang	68	
The Differentiation from "Qing Feng" to "Lin F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s		
—Starting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Feng Qiqi	75	
A Reflection on the Crime of Breach of Trust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Ruan Junjie	82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Qing Dynasty		
—Comment on Zhang Tianxing's <i>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i>Zhou Xinglu	88	

刍议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及其与他类典籍的关系

厚宇德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笔记小说是一种古代特殊文体。它或者记载有趣、有价值的人、事或知识,或者在事实上依靠虚构的故事阐释某个道理,并以传世为目标。笔记小说内容的多向性,决定了这类典籍与小说、史书和类书等其他类别典籍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甚至有时难分彼此,有必要对其深入辨析。鲁迅、谢国楨等著名学者都在著述中从多个视角揭示过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但客观地说,笔记小说内容也不无诸多局限性。比较而言,它是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类重要文献。

关键词:笔记小说;类书;科技文化;史料价值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1

一、何谓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有的更关注历史,有的更关注文学,有的更关注官场见闻,有的则以记录街谈巷议为主,有的载有较多自然知识及科技日用方法……不一而足。因此,很难基于所涉内容来定义笔记小说,或者只能说凡属记录以上诸项而行文自由的古籍,一般而言皆可称为笔记小说。可能正是因为难从内容界定笔记小说,学术界有基于形式特征来界定笔记小说的做法。笔记小说存世久远,即使按照比较严格的限定,两汉、魏晋^①即已经存在这种文体。“笔记”原指与“骈文”相对的文体,即较为随意的非骈文著述。因为不需考虑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与要求,所以“笔记”的特点就是简单容易。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笔记”文体的早期地位堪称最低。《南齐书·丘巨源传》即言:“议者必云笔记贱技。”^[1]这里强调的就是笔记文体不讲究对仗与声韵,乃随手而记而已。因此,“笔记”即指几乎无需技巧的文字记录。不过后来由于颇多著名文人赋闲时往往都撰写笔记,由此笔记中不乏脍炙人口的文字。将“笔记”与“小

说”并列而称“笔记小说”,所指大抵一如“笔记”。基于这些,笔者曾说:“凡古人记载其亲身经历、所读所思所想,以及耳闻目睹之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的书籍,无论是有一说一的写真或者是漫无边际的幻想、玄想,无论是严谨求实还是过度离奇夸张,笔者均视之为笔记小说。”^[2]这种说法,大抵是可以接受的。

与笔记小说对应的骈文,起源于汉魏,盛于六朝。骈乃并列、合并之义。骈文或骈语以偶句为主,是严格讲究对仗和声律的文体。骈文于唐代受到抑制,宋代再受到抑制而几乎不再延续;笔记小说也于汉魏时期多了起来,而随后愈发蔚为壮观,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新作,有人说明清时期是笔记小说的高峰期,至民国时期,这种文体仍存。

二、著名学者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一)鲁迅先生论笔记小说的重要史料价值

鲁迅先生是包括笔记小说在内的中国古代小

^① 下文将谈到,鲁迅先生认为汉魏时期的笔记小说皆为伪作;而从晋代到隋代的笔记小说也只能从唐宋类书中觅得部分遗文。

说的权威研究者。他不仅撰写过《中国小说史略》^[3],还校录过《唐宋传奇集》^[4]《小说旧闻钞》^[5]和《古小说钩沉》^[6]等书籍。他对古代小说的研究视野宽广、用力至深,观点深邃,值得格外重视。

鲁迅对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研究,很大一个特点是既追求历史的真实可靠,又紧密结合由古至今的文化与民俗。如他在1937年所说,中国人习惯将小说之类称为“闲书”,而“闲书”历来喜闻乐见: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常读闲书自娱,“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地听下去”^{[7]515}。鲁迅先生自己有随意翻阅闲书的习惯。根据他的回忆,自从上私塾学会认字,他就开始把家里的几箱旧书翻来翻去,从而形成了以“不用心、不费力”地读闲书来消遣并解除疲劳的习惯^{[7]744}。由己及人,鲁迅先生建议年轻读者,如果读中国古籍,不要读四书五经等线装书,而是去读史书,尤其宋史和明史,而且最好是读野史或者杂说^{[7]173}。鲁迅先生所说的野史和杂说,大体上都属于笔记小说的范畴。

在正史、野史与杂记之间,鲁迅先生更加青睐后者。1925年,他说:“历史(指正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7]137}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曾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7]174}可见鲁迅先生反感正史而对野史和杂说更为认可。他认为,不仅可以通过笔记小说了解更真实的中国历史,还可以基于它研究很多社会文化问题:“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7]234-235}翻阅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小说,包含了绝大部分笔记小说。鲁迅先生有渊博的笔记小说积淀,他十分重视笔记小说史料的学术价值。

(二)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重视笔记小说史料

谢国桢先生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毕业后曾以“私塾先生”的身份专门指导梁启超子女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后成为明清史名家。1935年鲁迅先生曾引用年轻的谢国桢撰写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的结论,并评价谢国桢:“钩锁文籍,用力甚勤。”^{[7]838}鲁迅先生对文艺青年不吝褒奖、提携,但对于史家及其著述有如此评价者,颇为鲜见。谢国桢先生著有《江浙访书记》一书,顾廷龙先生为之作序曰:“先生……尤好笔记小说、类书。”^{[8]序:2}谢国桢先生对自己“尤好笔记小说、类书”,有过几点说明。首先,清朝统治阶级对于其发迹等事件,有诸多忌讳而语焉不详;对于明朝的一些历史及史料,采取毁灭和隐蔽的做法。鲁迅先生在1934年指出,被清朝统治阶级销毁、删改的古籍,不仅限于明朝^{[7]759-761}。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明清史,就不得不求助于包括野史和杂记等在内的笔记小说。其次,谢国桢先生通过查阅其他学者的研究、个人进一步阅读明清笔记小说,证实笔记小说中有关于古代科技的大量记载^{[8]10-11}。谢国桢先生“明代野史笔记资料辑录”著作——《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内容即为从笔记小说等古籍中辑录出来的明代科技史料,以及这些科技发明对当时经济的影响^[9]。

(三)科技史家张秉伦先生著述中的笔记小说史料

张秉伦教授是著名科技史家,在他的指导下,张江华博士研究明清笔记中的科技史料而于1991年完成学业^[10]。其博士论文中参考引用的古代笔记小说,多达数百部,包括多部即使今天也并非寻常可见者。张秉伦教授在京工作期间遍览古籍,张江华博士得见并援引如此众多的笔记小说,想必与张秉伦教授的指点和提供的帮助有关。

张秉伦教授长期讲授的课程之一是《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张教授辞世后,基于他的讲义和部分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讲义》一书。在该著作中,张秉伦先生在《四库全书》的分类框架下,把笔记小说归于子部之“小说家类”,但该书中只提到了《山海经》《西京杂记》《世说新语》《金台纪闻》《涑水记闻》《萍州可谈》《山家清事》《文昌杂录》和《墨客挥犀》等为不多的笔记小说,评述亦只是寥寥数语,惜墨如金^[11]。网络可查,《四库全书》子部收录历代笔记小说仅150余部,有些重要的笔记小说如《梦溪笔谈》等并未收录。

张秉伦先生在著作中还指出集部也收录小

说,但“集部的小说与子部的不同,主要是指章回小说”^{[11]141}。又言:集部小说“作品很多,又与科技史关系不太密切……但是小说中有时也能找到一些科技史料……”^{[11]141}笔者浏览过文渊阁等版本《四库全书》的目录,认为集部未曾收录小说类著述。网络学术平台《国学大师》中所列《四库全书》之集部目录中,也不见有小说收录。笔者还曾向王瑞来、高珂立、李浩楠等几位饱读之士请教,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都认为《四库全书》未曾收录章回体小说著作。这令笔者陷入困惑,忽然一日想起有续编《四库全书》一事。查阅《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录^[12],知其集部从第1783册至第1800册,确实收录了《虞初新志》《古今小说四十卷》《警世通言》《警世恒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等小说作品。张秉伦先生所言,应该即指这部分内容。

(四)历史学家漆侠教授谈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

漆侠是一位已故宋史专家,曾撰《〈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一文。他认为《三言二拍》等五部明代小说,可以为宋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其核心道理在于,《三言二拍》虽然成书于明代,但是其中有些内容却源自宋元时期说书人的口头材料,即话本^{[13]1-13}。鲁迅先生也有类似观点。1923年,鲁迅先生指出:“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与历史家所著录者很不同,当时并非文辞,而为属于技艺的‘说话’之一种。”^{[7]46}即宋代行于民间的小说并无付诸文字的书籍版本,而完全由说书人心口相传。有些受欢迎的宋代“说话”即“话本”,经过宋元流传到明代,才由冯梦龙、凌濛初等人与后来发生的故事一起,编辑成书。因而明代小说里包含宋元时期的历史信息。

漆侠教授还指出了小说史料的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重要史料价值。第一,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不像史官那样有意识承担编辑史料、纂修史籍的任务,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的束缚和限制较小,信笔写来,不做作、不粉饰,较史官记录的东西更加真实可靠。所论与鲁迅先生更青睐小说和野史而对正史缺乏好感的表述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三言二拍》的许多篇目来自宋人话本,而宋代说书人之所言说,多属于当时的耳闻目睹之事,因而具有重要的宋代史料价值^{[13]12}。

(五)其他学者基于笔记小说史料的部分科技

史研究工作

涉猎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学者们基于其中史料的研究著述,虽时有问世,但也并非为数众多。但有限的著述足以彰显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如张秉伦先生曾指出严敦杰先生研究过小说中的科技史料,并提到了其代表性文章——《论红楼梦及其他小说中之科学史料》^[14]。笔者下载这篇文章后,不无吃惊地发现——这篇文章发表于1943年的《东方杂志》。1943年中国既没有独立的科技史专业机构,也没有科技史这个学科,严敦杰先生不仅是我国数学史领域的权威,也是于小说等文学著述中爬梳中国科技史料的先行者。

笔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集发现,刘钝先生1989年发表过一篇研究明清笔记中数学史料的文章^[15]。黄一农教授2017年发表了一篇基于《红楼梦》研究古代戥子计量的文章^[16];2018年他还发表了一篇基于《红楼梦》研究中药方的文章^[17]。基于小说和笔记小说史料,研究中医及中医文化的文章较多,在此不再赘述。王挺博士2019年发表了基于笔记小说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史的文章^[18]。武汉纺织大学李强、李斌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系列基于笔记小说史料研究古代纺织技艺及文化的文章,如《〈齐东野语〉中的纺织考辨》等^[19]。想必还有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做过研究,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三、笔记小说

与其他类别古代典籍的关系

古代笔记小说与多类别古代典籍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本文只重点提及它与文学类小说作品、史学著作以及类书等几类古籍之间的关系。

(一)笔记小说与小说的关系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虽然意在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小说著作编史,但很多笔记小说也都被他在书中重点提及,如《山海经》《博物志》《搜神记》《异苑》《幽明录》《拾遗记》《世说新语》《古镜记》《枕中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夷坚志》《青琐高议》等。只是进入明清时期,在大量文学作品题材的小说出现以后,鲁迅先生提到这两朝的笔记小说才明显减少。这就是说,在明清之前,笔记小说和小说是很难区分的。即使到了明清

时期出现章回体小说之后,二者也并非再无交集。张秉伦先生说:“有时也很难分清哪是子部小说,哪是集部小说。”^{[11]141}这反映的就是笔记小说与明清时期出现的章回体文学小说作品之间,难以截然区分的关系。

鲁迅先生发现并指出,不同时期的笔记小说作者的旨趣和价值取向有明显的变化,这使得历史上的笔记小说,在一个时期更加趋近于史学著作,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更趋向小说类文学作品。1935年鲁迅先生指出:“武断的说起来,则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此书即大损声价云云……”^{[7]804}这种价值取向到唐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7]804}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后来都被纳入笔记小说系列。但是如鲁迅先生所言,唐代传奇崇尚虚构而更接近现代的小说类文学作品。

明代人已经具有小说和剧本不能全部虚构,也不能完全写实的文学观念。如谢肇淛认为完全写实是有些作品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20]1829}。这个观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艺术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谢肇淛认为理想的做法是虚实各半:“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20]1829}正因为有这样的古代小说价值取向和作者的自觉,才使得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部分内容具有史料价值。

(二)笔记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可以虚构的唐代传奇更接近于现代小说体裁,那么与其相反、崇尚写实的六朝笔记小说则更具有史书的特征和价值取向。鲁迅先生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现在之所谓六朝小说……在六朝当时,却并不视为小说。例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等,直至刘昫的《唐书经籍志》,还属于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里的。那时还相信神仙和鬼神,并不以为虚造,所以所记虽有仙凡和幽明之殊,却都是史的一类。”^{[7]804}这就是说,唐

以前的笔记小说,当时的人们本就把它视为史书来撰写和阅读的。在唐之后,才不断有笔记小说由史部退出而入小说中。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史著述才最终退为小说^{[3]5}。

虽然不断有笔记小说退出史书而被归入小说行列,但历代史家都十分重视笔记小说史料。宋代朱弁在其笔记小说《曲洧旧闻》中,归纳了史官治史的四种主要史料来源,并指出每种均存在不可信之处^{[2]13}。那么怎样才能有利于治史呢?他给出的方法是呼吁士大夫勤于撰写笔记小说,并使之行于世,从而为史官提供更多可靠史料:“《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私有所记,多不肯轻出之。”^{[2]13}具有史学意识的笔记小说作者并不少见,再如明代何俊良撰写《四友斋丛说》时,是按照经、史、杂、子、文、诗、书、画等多个部分结构全书的,史是重要内容之一;全书最后还加有续史环节。关于历史的内容,既有其读史书时的体会和个人观点,更包括他认为重要的、他所处时代的一些史实。这样的著述当然能给史家治史提供有力的助益。

(三)笔记小说与类书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一种叫作“类书”的书籍,其编写方式是从其他历代典籍中搜集、分类辑录各种知识。古人编写类书的宏愿是:“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21]1}因此,古代的类书“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21]1}。基于此,类书与笔记小说貌似有明显的区别,但事实上二者却有诸多关联。有的笔记小说或笔记小说中的部分内容,就是作者对自己读过的典籍内容的摘录与汇总,这就使笔记小说具有类书的性质。明代笔记小说《草木子》就是这类笔记小说的一个典型之作^[22]。类书和笔记小说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有的书籍既被列入类书,也被视为笔记小说。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被称为北宋四大类书,但有时《太平广记》也被列入笔记小说之中。

陈源等人曾诬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了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26年鲁迅就此予以详细批驳,指出两本著作上的诸多不同,其中之一是:“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7]202}1935年鲁迅还说过:“从晋到隋的书目,现在一种也不存在了,我们已无从知道那时所视为小说的是什么,有怎样的形式和内容。……《郭子》《笑林》,殷芸《小

说》《水饰》,及当时以为隋代已亡的《青史子》《语林》等,还能在唐宋类书里遇见一点遗文。”^{[7]804}鲁迅先生的这两段话揭示了同一个事实:笔记小说是类书内容的重要来源之一;有的笔记小说失传了,后人可以从类书中辑录、了解失传笔记小说的部分内容。

明代黄瑜曾批评道:笔记小说虚实相半,是非交杂,有的治史作志者却不辨真伪或不能辨别真伪,误把笔记小说著作中虚构的或不可靠的内容当作事实写入了史书,《资治通鉴》也未能幸免^{[23]210}。他将庄子视为这种乱象之始作俑者:“溯其所自,则庄周启之也。”^{[23]211}为防止虚构入史的错误发生,黄瑜呼吁学者们:“编辑类书,当分实事、寓言而科,以精别之,斯为无弊。”^{[23]210}黄瑜的观点颇有道理,也间接反映出笔记小说、类书与史书之间密切的内在关系。

四、笔记小说史料的局限性

笔记小说内容多源于作者的耳闻目睹,这既可以成就笔记小说史料的真实性、特殊性,有时也使笔记史料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笔记小说里有唐代和清代两则用兔毛或羊绒做衣物的文献。其一,说宣州兔毛:“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24]其二,说陕西羊绒:“陕西以羊绒织成者谓之姑绒,制绵衣,取其暖也,今则制为单袍。”^[25]这两则史料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只在某些特殊地区才有用动物毛绒制衣的做法。然而,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已对羊的种类、各类羊毛的特点、羊绒的处理方法,以及动物绒毛织机等,进行过详细的描写,呈现出在明代羊绒制衣已经是成熟产业的局面^[26]。比较之下,笔记小说作者个人视野之局限极为明显。

另外,笔记小说中存在大量未经实证却人人相信、代代流传的荒诞无稽之谈。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认为地震是凶兆,如晋代《博物志》曰:“地动臣叛,名山崩,王道讫,川竭神去,国随已亡。”^[27]再如《搜神记》载有具体事件:“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此王敦陵上之应也。”^[28]这种观念,从更早到晋代再代代流传到明清时期。明代的《双槐岁钞》说:“成化乙酉……地震,屋宇摇动,

轰轰有声,盖兵兆也。”^{[23]254}明代的《今言类编》也载有:“嘉靖十八年……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楼灾。山西地震,有声如雷。南京礼部右侍郎吕柟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辽东兵变。”^[29]地震为凶兆、兵兆的观念流传久远而内涵几乎不变。

只有清晰了解中国古人关于地震的成为千古定论的错误观念,才能理解在清代当有人说某夜将有地震后,在那天夜晚京城重要官员夜不能寐、通宵达旦端坐以待,直到证实并无地震方才作罢;而妄言将有地震者则被治罪,由皇帝亲自指示将其押回本籍收管,并要求“毋令出境”^[30]。笔记小说中的这类内容本身具有欠科学性甚至反科学性,然而却是了解古人自然与社会观念的重要依据。

结语:笔记小说是古代文化研究的 宝贵信息源

如前所述,有多位名家肯定笔记小说的史料(尤其科技史料)价值;而在笔者看来,笔记小说对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古代文化研究,远远超过其对科技史研究的支持力度。不难理解,笔记小说很大部分内容,是古代文人对其生活中有感兴趣的事件的描写和记录。这就决定了笔记小说既有浓郁的历史与生活信息,也展示着古代文人的好恶与是非观、价值观等。也正因为如此,“阅读笔记小说时,能嗅到的浓郁的沁人心脾的历史与文化气息,是阅读文学名著、诸子经卷、二十四史等,根本无法比拟的。笔记小说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却具有最强烈的代入感,其中的叙述,常给人以身临其境感”^{[2]2}。这种具有代入感的特殊享受并不受历史或科技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真实与否、可靠与否、正确与否等考证维度的局限,而因为笔记小说的代入感、交融感,更多的体验是进入古人的视域;并由此看开去,从而更多地了解古人所依赖、所思想、所信仰、所追求、所欣喜、所忧愁,即介入的是多维度的古代文化时空。这一点鲁迅先生亦从独特视角有所阐释,正如前文所说,他认为,通过笔记小说史料可以更真实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基于此还可以分析、厘清中国诸多社会文化问题。笔记小说是古代文化,尤其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世俗文化研究最宝

贵的信息源、最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萧子显. 南齐书: 第三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894.
- [2] 厚宇德. 知识、技艺、理念: 传承与反思: 基于笔记小说史料对古今科技文化的系列思考[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23.
-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4] 鲁迅. 唐宋传奇集[M]. 蔡义江, 蔡婉若,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 [5] 鲁迅. 小说旧闻钞[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8.
- [6] 鲁迅. 古小说钩沉[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8.
- [7] 鲁迅. 鲁迅杂文全集[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8] 谢国桢. 江浙访书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9] 谢国桢.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中[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 [10] 张江华. 明清笔记中的科技史料价值研究[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91.
- [11] 张秉伦. 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讲义[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21.
- [12]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索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229-231.
- [13] 漆侠. 《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 1988(3).
- [14] 严敦杰. 论红楼梦及其他小说中之科学史料[J]. 东方杂志, 1943, 39(4): 59-62.
- [15] 刘钝. 若干明清笔记中的数学史料[J]. 中国科技史料, 1989(2): 49-56.
- [16] 黄一农. 《红楼梦》中的戥子与计量单位“星”[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7, 36(2): 231-243.
- [17] 黄一农. 《红楼梦》中最珍贵的药方“暖香丸”新探[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8, 39(1): 1-10.
- [18] 王挺.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工艺技术史料的类型、分布与价值[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5): 155-161.
- [19] 李强, 李斌, 曹孟莎. 《齐东野语》中的纺织考辨[J]. 丝绸, 2017, 54(9): 80-86.
- [20] 谢肇淛. 五杂俎[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1] 胡道静. 中国古代的类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2] 叶子奇. 草木子[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84.
- [23] 黄瑜. 双槐岁钞[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4] 李肇. 唐国史补[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00.
- [25] 刘廷玑. 在园杂志[M]//清代笔记小说大观: 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131.
- [26] 潘吉星. 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9: 336-337.
- [27] 张华. 博物志[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87.
- [28] 干宝. 搜神记[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42.
- [29] 郑晓. 今言类编[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825.
- [30] 阮葵生. 茶余客话[M]//清代笔记小说大观: 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647.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iterary Sketches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Sketches and Other Book Types

Hou Yude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sketches are a special style in ancient times, which either keep record of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people, things or knowledge, or rely on fictional stories to explain a certain truth on the basis of facts, and aim at handing down. The multidirectional property of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sketches determines that this kind of books has a complex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oks of other types, such as novels, historical books and class books, and even sometim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s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Lu Xun and Xie Guozhen have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iterary sketches from many perspectives in their works. However,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tent of literary sketches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it must be an indispensable kind of important document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Keywords: literary sketches; class books; the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ical value

《菽园杂记》及其中的科技史料

姚登程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菽园杂记》是一部明代笔记小说,其内容包罗万象,上到国家时政、典章制度、名人轶事,下至奇闻怪谈、方言雅音,书中均有所载。书中包括大量科技史料,医学、自然现象、动植物学、农学、手工业等领域都有涉及。这些内容展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技艺,反映出明代科技发展情况,为今人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和古代科技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研究。

关键词:陆容;史料;《菽园杂记》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2

一、陆容与《菽园杂记》

陆容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卒于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号式斋,字文量,南直隶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是明朝政治人物、学者,著有《世摘录》《式斋集》《菽园杂记》等。

《菽园杂记》是明代中期编撰的笔记小说,全书十五卷,内容广泛,涵盖了诸多方面。大到国家时政、典章制度、名人轶事,小至奇闻怪谈、方言雅音、琐碎小事等均有涉及。

《菽园杂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且内容繁杂,并没有专门用于记载科技笔记的卷章,而是将科技内容散落在各卷章之中。摘录、整理这些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陆容所处时代的科技观念、生产力水平等。本文尝试从医学、自然现象、动植物学、农学、手工业等方面整理并阐释书中的科技史料,为当下学术界研究明代科技发展情况提供若干参考。

二、关于医学的史料

《菽园杂记》中关于医学的内容包括疾病、医

药、临床治疗、养生等方面的记载。

(一)疾病方面的记载

《菽园杂记》关于疾病只有零星片段的记载,通过其中描述可以了解到明代关于部分病症的表现,以及当时社会对疾病的认识。

1. 耳鸣。根据《菽园杂记》记载可知,明代对耳科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也具备基本的医疗手段。《菽园杂记》卷二记载:“言其乡人有患耳鸣者,时或作痒,以物探之,出虫蛻,轻白如鹅翎管中膜。”^[1]¹⁴这里提到“以物探之”的物是指挖耳勺,说明明代人们已经能熟练掌握挖耳勺的使用技巧,用于治疗耳鸣及相关疾病。

2. 赤龙甲。《菽园杂记》卷二记载:“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乡有卫生者,手大指甲中见一红筋,时或曲直,或蜿蜒而动。或恐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龙集指甲也。’卫因号其指曰赤龙甲。”^[1]¹⁴从陆容对赤龙甲的描述中可以推断出卫氏应该患有甲真菌病,但由于古代医学对微生物认识的局限,并不清楚真菌诱发皮肤病的致病机制,对于无法解释病因的疑难杂症,人们往往会将其归为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影响。

(二)医药方面的记载

《菽园杂记》中关于医药方面记载,多为民间偏方,其中不乏鲜为人知或十足珍贵的药材、药

方。譬如金汁这类药材因为本身材质的特殊性,并不被当时的医家推崇,鲜有用于针对患者的临床案例。

《菽园杂记》卷七中记载:“還元水者,腊月以空瓶,不拘大小,细布絨其口,引之以索,浸粪厕中。日久,粪汁渗入,瓶满自沉,取埋土中。二三年,化为清水,略无臭气。凡毒疮初发时,取一碗饮之,其毒自散。”^{[1]82}金汁的炮制是医学文献记载最早的粪菌移植技术。《本经逢原》云:“腊月取粪置坛中,埋土内越三年,取出,如水者是。”^{[2]421}《雷公炮之药性解》载:“主天行狂热,阴虚燥热,解一切毒,疗一切疮,埋土年久者佳。”^{[2]421}有关金汁的制作方法,与早先的记载相比,《菽园杂记》的炮制手段有所改良。书中提到了用细布包裹瓶口,再将瓶子浸入粪池,直到粪汁渗入,瓶满为止。相比原来的放置坛中的粗放处理,这种操作起到了过滤的效果,实现固液分离,有效隔离其他杂质,保障药物的纯度。

陆容不仅热衷于记录那些鲜为人知的民间药材和药方,更在药物功效的描述上与当时众多本草记载有所不同。他对于药材的独到见解和深入探究,使得他的记载与当时其他本草书籍存在一定的出入。比如关于芭蕉的药用价值在诸多本草中有所收录。《滇南本草》:“芭蕉花暖胃,散痰,软坚。治寒痰停胃,呕吐恶心,吞酸吐酸。”^[3]《岭南采药录》:“芭蕉花治红白痢,能通经。”^[4]医家大多认为芭蕉具有通经活络、解毒、治热病的功效,而陆容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对此不以为然。《菽园杂记》卷十中写道:“南方寺观及人家庭院中,多种芭蕉,但可资观美而已,实无所用。或以其叶代荷叶,衬蒸面食。然妇人有症瘕及血气病者,感其气则益甚,是亦不可用也。”^{[1]122}陆容在文中明确说明芭蕉主要起观赏作用,几乎没有药用价值,甚至若妇人患有妇科疾病(如血瘀、肿瘤)的情况,食用芭蕉叶还会加重病情。这体现出陆容在记录民间药材功效时的求真求实精神,具有宝贵的科技史料价值。

(三) 临床治疗方面的记载

陆容书中一些关于治病的指导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了解与借鉴。《菽园杂记》卷七载:“凡咽喉初觉壅塞,一时无药,以纸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喷嚏数次,可散热毒。仍以李树近根皮磨水涂喉外,良愈。”^{[1]82}这是在药品匮乏的情况下,用于应急治疗鼻塞堵塞的办法。十分难得的是书中特别提到皂角末有毒,体弱者及孕妇忌服。

陆容在书中还载有治疗霍乱的经验。“霍乱”一词在中医学体系中存在已久,作为病名最初源自《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5]霍乱开始作为独立的疾病辨治被后世医家讨论源于张仲景。《伤寒论》原文第382条:“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此名霍乱。’”^[6]古人对于霍乱的定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各种急性胃肠消化系统疾病,不等同于由“霍乱弧菌”引发的烈性传染性霍乱。对于中医概念的霍乱治疗方式,陆容在书中有所提及。《菽园杂记》卷十五载:“病霍乱者,浓烈香薷汤冷饮之。或掘地为坎,汲井水于中取饮之,亦可。最忌饮热汤,热米汤者必死。”^{[1]190}由文中指出的宜冷饮、忌热汤可知,该段所说霍乱属湿热证型霍乱,属热病,应清热化湿,辟秽泄浊。而陆容提倡服用浓烈香薷汤医治的方法是相当正确的,与诸多医家关于香薷的论述不谋而合。如汪颖《食物本草》:“夏月煮(香薷)饮代茶,可无热病,调中温胃;含汁漱口,去臭气。”^[7]同时,陆容特别强调切忌服用热米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也说明辨证论治在中医临床治疗中的重要性。

(四) 养生方面的记载

陆容在养生方面很有心得,其在书中记录了一段饶有趣味的关于养生的辩论。《菽园杂记》卷十一载:“尝闻一医者云:‘酒不宜冷饮。’颇忽之,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数年后,秋间病利,致此医治之,云:‘公莫非多饮凉酒乎?’予实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饮醇酒。医云:‘丹溪知热酒之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矣。’予因其言而思之,热酒固能伤肺,然行气活血之功居多;冷酒于肺无伤,而胃性恶寒,多饮之必致郁滞其气。而为享饮,盖不冷不热,适其中和,斯无患害。古人有温酒、暖酒之名,有以也。”^{[1]131}丹溪之论指由元代名医朱丹溪(朱震亨)所创“滋阴派”的医学观点,认为人体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人体内的动态平衡总是往阴虚的方面倾斜。而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火为阳、水为阴,故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以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到了明代,朱震亨的学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后人在其理论的基础上成立了丹溪学派。陆容原本深受这一学派的影响,早年以冷饮为主;后因长期饮用凉酒导致秋季发病,思想发生转变,得出酒温应“适其中和”的道理。这说明中医的养生,不能脱离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不可机械地套用前人经验。

三、关于自然现象的史料

《菽园杂记》载有若干关于自然现象的记录,其内容多为逸闻趣事,特别是其中关于夜间鬼火和海市蜃楼的描述,为我们揭示了一些有趣的自然现象。

(一)鬼火的记载

《菽园杂记》卷十五中道:“乡人尝言野中夜见鬼火、神火。鬼火色青荧,不动;神火色红,多飞越,聚散不常。盖火为阳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已……古战场有磷火,鱼鳞积地及积盐,夜有火光,但不发焰。此盖腐草生萤之类也。”^{[1]188}在《菽园杂记》中,陆容对于“鬼火”的产生进行了探究。他指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石和木可以产生火焰,而对于其他产生火焰的方式知之甚少。例如,磷火这种特殊的火焰现象,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然而,陆容对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现象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充分体现了陆容的敏锐观察力和科学探究精神。

(二)海市蜃楼的探讨

《菽园杂记》卷九中道:“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然滨海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观此,则所谓楼台,所谓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气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气,亦非神物。”^{[1]112}陆容对海市蜃楼的成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首先质疑了传统的关于海市蜃楼成因的解释,即认为是由神兽或海洋中的蛇形成。继而通过观察和推理,他指出沿海地区并未出现过楼台状的景象,因此这种解释并不成立。在此基础上,陆容进一步探讨了海市蜃楼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猜想。他认为,海市蜃楼是由物体掩映日光而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超自然力量。这种解释涉及了光的反射、折射现象,与现代科学关于海市蜃楼的解释十分接近,在当时堪称巨大的进步。

四、关于动植物学及农学的史料

《菽园杂记》有关动植物学和农学的记录颇

丰,包括动植物介绍、动植物在农学中的价值、粮运、栽培技术等。许多有关动物、植物的描述都与农学思想息息相关。

(一)动物方面的记载

《菽园杂记》卷十三中写道:“石首鱼,四五月有之。浙东温、台、宁波近海之民,岁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近处网之,盖此处太湖淡水东注,鱼皆聚之……金山、太仓近海之民,仅取以供时新耳。温、台、宁波之民,取以为鲞,又取其胶,用广而利博。”^{[1]156}此段描述了浙东沿海地区居民利用石首鱼资源的不同方式,并说明了金山、太仓地区的石首鱼数量较多的原因,揭示了地区间饮食文化的差异,也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同时,该段记载了当地居民对于石首鱼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反映出古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二)植物方面的记载

《菽园杂记》卷六中提道:“菘菜,北方种之。初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芜菁,南方种之亦然。盖菘之不生北土,犹橘之变于淮北也……菘菜即白菜,今京师每秋末,比屋腌藏以御冬。其名箭干者,不亚苏州所产。”^{[1]177}描述了白菜的生长特点、种植技术、南北方的不同种植情况,以及京城冬季腌制白菜的习俗。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农业生产和食品保存方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卷十四写道:“苳,每四五年一种,种须八九月去旧根,取当年旁生枝为佳。久不更种,到老根生白蚁伤之。种法,先锄地作沟,用污泥填壅,每沟约疏五六尺,或一尺。五月刈者名头苳,七月刈者名二苳,九月刈者名三苳……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风可也。若过时而生旁枝,则苳皮不长。生花则老,而皮粘于骨,不可剥。遭大风吹折倒,皮亦有断痕,而不佳矣。凡将刈,先以杖击去叶,然后刈之。落叶既壅于根,久而邑烂,到地亦肥,刈后,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剥重皮沤水中,一时取起,以铁刀戛去粗皮,阴干;若晒干,则硬脆不堪绩矣。雨后刈者,光润而佳。戛法以时,但一面着刀,以指按粗皮于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后,制苳稍暇,须灌粪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则肥,而收刈可以及时。大率织布以头苳为尚,二苳滋润而便于绩者耳,三苳尤劣。”^{[1]174-175}苳即苳麻,该段从多个方面对苳进行全面的介绍。首先是关于苳的种植与收割时间。提到了苳的种植周期、不同月份的收割时间,以及收割的最佳时机;详细描述了如何进行种植,包括锄地作沟、填

入污泥、选择适当的枝条作为种子等步骤;提到了如何判断植物的生长状况,以及何种生长状况下的苾品质最佳。其次是收割前的准备。比如如何去掉叶子,如何处理落叶作为肥料,如何用水浇灌等步骤;还有在处理和保存过程中如何去掉粗皮、如何晾干以及如何保存苾的皮,以防其变得硬脆。再次是提到了在种植和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在种植时需要灌粪和用污泥覆盖来增加土壤肥力,在收割后要及时处理,以免影响品质。最后是品质比较。对不同收割时间的苾品质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头苾、二苾和三苾之间的质量差异。此段记录是关于古代苾麻种植十足珍贵的笔记材料。

(三)农学史料方面的记载

农学史料方面包括农具设备、粮运、栽培技术等。农具设备的记载在其卷十二:“严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轮。其制:约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为轮,轮之辐以细木干为之,每辐出构处系一竹筒,但微系其腰,使两头活动,可以俯仰。置轴半岸,贯轮其上。岸上近轮处,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缓,则以石约归轮下使急,水急则轮转如飞。每筒得水,则底重口仰。及转至上,则筒口向下,水泻木槽,分流田中。不劳人力,而水利自足。盖利器也。”^{[1]143}此段介绍了严州山中使用水轮灌溉田地的技术,这种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水流的动能驱动水轮,进而转化为机械能,实现自动化的农田灌溉。水轮的大小和构造是根据水面到岸的高度来决定的,这体现了设计者对于机械动力学和农田水利的深入理解。水轮的构造精巧,其辐条由细木干制成,并在一端系有一个可以活动的竹筒。这种设计使得竹筒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活动。当水流冲击竹筒时,由于水的重量,竹筒的底部会变重并向上仰起。当竹筒转到上方时,由于重力的作用,竹筒的口向下,水就会从竹筒中泻入木槽,然后分流到田地中。这种自动化的灌溉方式极大地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农田灌溉的效率,反映了在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对于更高效、自动化的生产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推动了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陆容作为典型的士大夫,曾供职于浙江布政司,因此掌握关于粮运的一手材料。卷十二载:“漕运定规,每岁运粮四百万石,内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运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

定价银一百两,军卫自备三十两,府县出价七十两。兑运者,各卫所军驾船至府县水次仓兑粮,起运京仓、通州仓交纳。”^{[1]150}陆容详细记录了明朝漕运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涉及的船只建造、经费来源和人员组织等问题。这些资料可以弥补史书职官志中的遗漏,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参考意义。

在栽培技术的记载中,卷十四引用《龙泉县志》中的香蕈条目最为突出。香蕈别称香菇,陆容考证蕈字原本应该是蕈字,因为《说文解字》《韵会》都没有蕈字,《广韵》才有这个字,蕈字的使用是方言导致的错误^{[1]179}。但事实上,《说文解字》中是存在蕈字的^[8]。《菽园杂记》中有关记载是:“香蕈,惟深山至阴之处有之。其法,用干心木、橄榄木,名曰蕈樛。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斑驳锉木皮上,候淹湿,经二年始间出,至第三年蕈乃遍出。每经立春后,地气发泄,雷雨震动,则交出木上,始采取。以竹箴穿挂,焙干。至秋冬之交,再用工遍木敲击,其蕈间出,名曰惊蕈。”^{[1]178}陆容对香蕈的生长环境和采制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香蕈的生长环境被强调为“深山至阴之处”,这表明香蕈对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因素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其在阴暗、湿润的环境中更适宜生长,而且生长的树木种类也有特定要求,比如“干心木、橄榄木”等。采制香蕈的过程则是一种工艺和耐心的结合。工匠们需要砍倒树木,锉去树皮,然后耐心等待两年的时间,让香蕈自然生长。采摘的时机也非常重要,立春之后,地气开始散发,雷雨带来震动,香蕈便纷纷从树干上长出。香蕈采收后的处理也相当讲究。将其穿挂在竹箴上,进行烘焙干燥。到了秋冬之交,还需要再次敲击树木,让隐藏在木屑中的香蕈重新长出。这段引用《龙泉县志》中关于香菇栽培的文字,是中国食用菌栽培技术史上极其重要的史料^[9]。

五、关于手工业的史料

《菽园杂记》中详细记载了明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涵盖了造纸、冶炼、制瓷等多个行业。这些史料表明,明代手工业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一)造纸技术

《菽园杂记》卷十三极为具体且细致地记载了

一种在浙江衢州的造纸技术:“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糝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卓状,圻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1]¹⁵⁷此处有关衢州常山、开化等县的造纸工艺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该地区的造纸业已经非常发达。其造纸流程首先采集特定的原料,即文中提到的“采楮皮”,这表明他们使用的是楮树的皮作为造纸的主要原料。之后经过蒸煮、去粗质、加石灰、浸渍、去灰等步骤,再浸泡、晒干、捣烂后加药料,最后晾干成纸。其中强调要经过三天的浸渍和七天的浸水后,再次进行蒸煮。这样反复处理是为了让原料更加细腻,有利于后续的加工。文中指出在晒干后将原料与胡桃藤等药混合,然后用水漂洗,是为了使原料更加柔软和有韧性。整个过程虽然繁琐,但是每一步都有其科学依据,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技艺。此造纸工艺非常成熟,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研究价值。

(二) 冶炼和制瓷技术

《菽园杂记》卷十四收录的《龙泉县志》关于五金之矿、青瓷、韶粉的采集以及制作工艺是当前学术界热衷讨论的话题。这些收录的材料详尽地介绍了金属冶炼、瓷器制作和原材料采集等手工业技术,是研究古代手工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因为陆容未注明所引用《龙泉县志》的时代和作者,所以现代学者对其考证产生分歧。有观点认为,该文献出自下限为明正统(1436—1449)、上限为南宋嘉定二年(1209)的版本。也有观点认为,引文出自南宋《龙泉县志》(120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料来自明初或正统志^[10]。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菽园杂记》引用的《龙泉县志》具体年代尚无定论,学界较多认为源自南宋^[11],但《菽园杂记》引用的《龙泉县志》确切成书年代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作为支撑,以便达成学界共识。

结 语

《菽园杂记》是一部涵盖了广泛自然知识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书籍。其中关于医学保健、动植物的内容丰富多样,同时涉及了自然现象和手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在医学保健方面,书中详细阐述了

各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医药、临床治疗,以及养生保健的方法,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健康指南。在自然现象方面,其中一些逸闻趣事能够激发读者对于自然现象的思考与探索。在动植物和农学方面,书中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生长规律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涉及了一些农业生产工具、粮运和栽培技术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十足珍贵的笔记材料。书中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记载也是相当丰富的,特别是《菽园杂记》卷十四中引用《龙泉县志》的内容在当前的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些内容不仅展示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技艺,反映出明代科技发展情况,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科技史料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发掘。

《菽园杂记》中记录了许多科技方面的材料,说明陆容对于自然知识和传统技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和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其进行简明的归纳与分析,可以进一步丰富学界对于陆容的认识,且对研究明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明代民间的科技成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对这些科技知识的理解和诠释与立足现代科技知识的理解和诠释,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12]。部分条目用现在的科学认识来看甚至是荒谬的。然而对于史料,我们不能只站在现代眼光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更应该结合这些史料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古人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陆容. 菽园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石斌豪. 基于中医典籍浅析温病中“金汁”的应用特点[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36(6).
- [3] 兰茂. 滇南本草:第一卷[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5:260.
- [4] 萧步丹. 岭南采药录[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172.
- [5] 田代华.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3.
- [6] 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03.
- [7] 汪颖. 食物本草[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343.
- [8]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36.
- [9] 芦笛. 再论明陆容《菽园杂记》所引《龙泉县志》源出嘉定志[J]. 食药菌,2014,22(5):301-306.
- [10] 贾身茂. 陆容《菽园杂记》引香薰之《龙泉县志》的作者及时代研究进展[J]. 食药菌,2017,25(1):70-76.
- [11] 张寿橙. 香菇发源地探秘(二):香蕈185字之时代印记的确定[J]. 食药菌,2020,28(6):470-473.
- [12] 厚宇德,刘姣婷. 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方法之反思[J]. 台州学院学报,2023,45(1):35-39.

批判二元对立思维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过往研究的反思

彭志恩

(台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辩证的话语承诺与隐蔽的二元对立思维长期共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当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的研究表现得比较有代表性。在辩证的话语承诺掩盖着的隐蔽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视角”与“客体视角”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自在之美”与“为我之美”等范畴经常被直观化、纯粹化、绝对化理解,由此导致在学理上形成一系列长期难以疏通的理论堵点。逐一反思与批判这类理论堵点及其背后隐藏的思维方式,不但有助于终结一些长期无法弥合的无效争论,而且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论体系在学理上真正完成上下贯通。

关键词:二元对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审美观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以唯物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把握世界,这固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然而若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则会发现存在隐蔽的二元对立思维(直观思维)。也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致使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内部一直存在一些长期无法弥合的无效争论,由此在学理上形成一些长期难以疏通的理论堵点,导致整个理论体系无法在学理上真正实现完全的上下贯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长期存在于学术领域,也存在于实践和各类教材当中,由此凸显认真反思这类基础性问题所具有的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自然观和审美观已有研究的反思,指出学术界在过往研究中客观存在的上述现象及其影响,并借此阐述笔者对于相关理论问题的见解。

一、辩证实践观承诺之下的 隐蔽二元对立思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中讨论,起因是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运动。这场讨论最初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后来逐渐深入,一直到达本体论层面。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性质及其内在构成要素的讨论成为众多争论焦点之一。例如有学者认为实践并不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活动,它属于客观物质的范畴,不包含丝毫主观的精神因素,否则将导致物质和精神二元论,因此应该把精神的东西从实践中“净化”出去^[1]。这种“净化论”受到同时期不少学者的批评,人们批评其具有明显

收稿日期:2024-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然范畴的百年争论及其现实困境与出路研究”(20XZX001)

作者简介:彭志恩(1983—),男,湖南花垣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直观唯物论色彩,主张实践应该被理解为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他们通常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中开篇的那段话作为论据,即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499}鉴于此处马克思关于“主体方面”的表述,多数学者都赞同马克思的“实践”结构当中必定包括“主体方面”。

然而这部分学者却在接下来的另一个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歧,即应该如何对待“主体的方面”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二者的关系问题。

其中第一派强调,应该“从主体方面”出发去理解世界,而不应该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后者意味着把人从自然界驱除出去,把自然界理解为与人无关的世界,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因为,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现实存在都具有社会历史性。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率先提出的:“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3]330}该观点指出了现实自然界的主体性维度,即自然向人呈现为何物受到社会本身发展的制约,其最初目的是反对彼时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夸张和过高估计直观的作用”^{[3]12},因此其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即主体能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对于主体性的强调也同样存在风险,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卢卡奇曾在自我反思中承认自己早年曾一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解存在“狭隘”,使得“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3]12},以致使自己“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3]13}。而让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这一早期观点对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以持有上述第一派观点为主要代表)常常表现出有甚于卢卡奇所言的“狭隘”,即对于实践的强调常常呈现出“一种夸张的高调”,由此表现出一种甚至远超于卢卡奇早期所谓的“唯心主义的直观”,一种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嫌疑,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了实践唯心论。例如其通常只承认人对自然对象化过程中的主体视角而拒斥其直观视角,以

及将“实践的思维方式”视同于“主体的思维方式”,相应地将“实践辩证法”视同于“主体辩证法”,进而又将“唯物辩证法”视同于“客体辩证法”,甚至将“辩证唯物论”视同于“直观唯物论”。也正因为如此,其十分重视对诸如“实践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的区别、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观的区别等问题的证明。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自然”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不是同一个自然,前者是与人有关、受人影响的自然,即人化自然;后者是与人无关、直观的自然,即自在自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一部分学者在处理哲学的自然和自然科学的自然二者的关系时,不得不作出以下的极具庸俗直观主义色彩的结论: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所从事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脑力劳动。前者是直观的,后者是反思的;前者是中立的,后者是非中立的;前者是“无我”的,后者是“有我”的。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发展,少数学者进而又认为,应该将“实践辩证法”归于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归于恩格斯,进而指责恩格斯在哲学立场上“背离”马克思而退回到旧唯物论那里去了,理由是恩格斯的自然观完全是基于直观的视角,是“非实践的”“离开了人”的抽象直观,而马克思的自然观则总是基于人的“实践(历史)”维度的。

上述第一派的主张遭受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只是批评了单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的局限性,而并没有完全否定它存在的价值。马克思真正强调的是人们应该兼顾主、客两种视角的辩证统一,应该同时纠正旧唯物论与唯心论各执一端的极端做法,转而在物质与精神、意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能动与直观、历史与自然之间寻找一个现实的矛盾场域,这个现实的矛盾场域就是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实践”这个现实的矛盾场域当中必然同时包括上述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各方要素。鉴于此,持上述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虽然声称坚持马克思的辩证实践观,但事实上却陷入了隐蔽的直观论,从而将马克思的辩证实践观无形间推向了主体主义的泥潭。

然而,尽管通过辩论使得上述第二派观点,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共识,可一个更新的且极少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于,这部分学者在现实中并不总是能够将其正确的立场真正贯彻到底。换言之,上述共

识在一些重要场合下通常只是表现为一种口号,或者说一种浮于表面的信念。在这种情形下,尽管学者们的话语承诺及其个人信念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然而当其真正开始运用实践的观点去尝试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时候,其实际运思过程却又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立的立场当中去,表现出非辩证的、非历史的、非实践的特征。这导致其思维方式常常呈现为一种比持上述第一派观点的学者更为隐蔽但实质却是一致的自相矛盾,即在辩证实践观的合理承诺与坚定信念之下隐藏着直观的、二元对立思维(直观主义)。

二、辩证自然观承诺之下的 隐蔽二元对立思维

如上所述,由于不同程度的隐蔽二元对立思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范畴时也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直观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某些所谓共识。其中最具典型例子就是人们对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对范畴的理解。例如人们通常直观地将整体自然割裂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自在自然是与人无涉的、未知的“纯粹”自在自然,对这部分自然的把握只能通过单纯“直观”的视角(客体思维);人化自然则是被人类实践改造过的、已知的属人自然,又称社会或历史的自然,对这部分自然的把握只能通过“主体”的视角(主体思维)。在实践活动发生之前,自然界与人化自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彼此隔绝、绝无关系的,只是在经过实践的中介之后,自在自然才开始转化为人化自然,由此导致自在自然日益缩小,人化自然日益扩大,这是单向不可逆的过程。当前这一认识俨然是不可撼动的定论,无论是在学术的“论坛”上,还是在学校的“讲坛”上,其都拥有极为广泛的共识。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所谓广泛共识的存在,导致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的理解上形成了不少长期难以弥合的二元对立的无效争论,由此在学理上形成一些长期难以疏通的理论堵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之争”。

国内学者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对象问题时,有的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然是人化自然,自在自然并非其研究对象,因为后者属于科学研

究的对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它不是属于“元哲学”的^[4]。有的学者则认为,包括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5]。由此问题又引发出一连串与之密切关联的争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之争、功能之争、性质或称谓之争等。其中在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以及物质—实践本体论、超越论等争论;在功能问题上存在解释世界(世界何以可能)与改造世界(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等争论;在性质或称谓问题上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争论。由于上述这些争论长期未达成真正的共识,再加上伴随着不同时期学者们研究兴趣和研究焦点的转移,导致这些争论被长期搁置,以至于人们纷纷淡忘了它们的存在,进而在那些普遍尚存争议的结论之上开始构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由此也完全可以预见,这些不同的理解范式之间必然会再次面临一系列完全不可调和的对立。

迄今为止,上述的许多争论点依然基本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派系对立的格局。欣慰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学者率先在宏观层面发起了从分歧走向综合的号召。如有不少学者积极主张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统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近年来,有学者全面系统论述了辩证、历史、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性,提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不同的‘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三个不同称谓,是从三个不同维度反映了同一个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征。”^[6]当前,这种具有广泛包容性和鲜明辩证性,旨在于弥合各方长期无效争论的主张得到了最大的拥护。由于这种主张能够最大限度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特征,并且有效弥合以往各派各执一端的争论,因此它标志着在一些重要的宏观层面问题上,二元对立的格局基本走向结束,同时也昭示着在微观层面问题上,更多的二元对立问题亟待走向弥合与统一,使得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论体系在学理上真正完成上下贯通。

再次回到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二元对立这个具体的微观问题上。其争论之所以长期无法弥合以至于形成理论堵点并由此引发更多的争论,究其根源乃是由于辩证法话语承诺之下的隐性二元对立思维使然。其实,如果单纯从常识性思维上考

量,上述关于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彼此隔绝的观点也并无过错。但正如恩格斯所言,常识性思维(形而上学)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才显得伟大,其一旦跨入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7]24}。按照常识性思维,任何两个事物在经由第三者的中介而建立起直接现实的联系之前,它们之间必然是彼此孤立与隔绝的。这种观点的形成是由于常识性思维通常只看到事物之间狭隘的、直接的联系,而看不到整体的、间接的联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基于此,任何两个现实事物之间都必然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现实联系,现实的自然界中绝不可能存在两个彼此完全孤立于对方的“部分”。因此,那种承诺在人化世界以外存在一个完全与人类实践无涉的、人类对其毫无认知的所谓纯粹自在自然,其表面看似十分地坚持辩证唯物论,实质上却陷入了独断论。因为从真正辩证实践的立场看,当人用“自在自然”这个概念指称现实世界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也就同时证明着这个部分已经进入人的认知实践范围之内,成为人的现实对象了,尽管这个对象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高度概括的整体而出场。只要承认实践是人的“自身自然”与其“外在自然”发生现实联系的唯一途径,那么人与其外部自然之间的一切现实联系都只能理解为实践的关系,包括人与自在自然(只要它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自然)的联系同样也只可能属于实践的联系,而不可能是别的某种神秘的联系。反之,如果一方面声称自在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却又声称自在自然在人类视野范围之外,是与人类实践无关的,那就相当于将“自在自然”设定为神秘物,陷入独断论,或宣称“我察觉到我永远不可能察觉到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从而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判断一个存在物是否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关键看它是否为对象性的存在物。“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210},因为“非对象性存在物”在逻辑上只可能是唯一的存在物,而唯一的存在物在逻辑上只可能是“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时空和物质运动的关系时指出,时间和空间离开了运动着的物质都是“无”^{[7]500},这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存在物的不可能性。因为非对象性存在物一定是绝对静止的存在物,这意味着它是脱离了时空维度的“纯粹存在物”,这显然是违背辩证唯物论基本原

则的。由此证明“非对象性存在物”只可能是头脑中的想象之物,其本质只能是“非存在物”“无”。那么人在现实中如何能够判断何种存在物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呢?这是由于人本身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他作为人,就必须与现实世界发生对象性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契机就是实践。因此只有从辩证实践的方面出发,才可能真正看懂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的深刻内涵。

首先,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由于其中只有自然物而没有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人与自然间的对象性关系,在此意义上它相对于人类而言也属于某种“非对象性存在”。马克思曾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2]530}但是这里的“非对象性存在”的内涵已经被大大窄化了。由于它仅仅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非对象性”,因此“非对象性存在”在这里仅指自然界处在人类历史的时空范围以外,但它却曾经客观存在。换言之,人类虽然不曾与其同处一个时空场域,但它曾经客观存在是可以被确证的。因为,尽管人类并未直接面对它、研究它,但却可以通过研究它变化了的形态,即通过研究今天的自然界而间接地了解它。这正是马克思所述的“从后思索法”,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而言是一把“钥匙”。

其次,人类诞生后自然界开始成为人的现实对象,但是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人类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对自然的直接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即便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将自然理解为整个宇宙,那么人类对自然的直接影响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总之,在人类直接的实践活动以外始终存在一个极为广袤的“相对自在自然”。其内涵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空间维度看,在直接的实践对象以外始终存在一个极浩瀚的相对自在的宏观宇宙;在直接的实践对象内部始终存在一个极精微的相对自在的微观世界。二是从时间维度看,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为自然界的“人化”和“去人化”两种趋势的对立统一。在某项实践活动正式开启之前,其潜在自然对象处于相对自在的状态,此时的自然界处于“去人化”占优势的过程,例如自然生态的恢复;直接实践活动的过程则是自然界“人化”占据主导的过程,表现为向自然的进军;而实践活动一旦结束,则之

前被直接改造的自然对象再次进入以“去人化”为主导的过程,自然界中的人类烙印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减少。三是从物质属性维度看,一切具体的物质都具有客观属性(或说运动方式/存在方式),虽然它们终究能够被人类以某种间接的方式把握,但这些属性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物质属性具有相对自在性;而物质运动方式的极其复杂性和人类直观能力的极其有限性共同决定了人类无法通过直接的实践活动把握和影响自然界的绝大多数物质形态。

上述同人类处于同一时间维度但在空间上相对隔离的“相对自在自然”对人而言同样也是某种相对意义上的“非对象性存在物”。只不过“非对象性存在物”的内涵在这里再一次被大大窄化了。由于它仅仅是相对于人类的直接实践活动而言的“非对象性”,因此“非对象性存在”在这里仅意味这个自然界处在人类直接的实践活动范围以外。由于从整个自然界整体上看,这个相对自在自然始终与人类处于同一个时空场域当中,因此其“客观自在性”不再是神秘的“彼岸性”,而是“此在性”的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换言之,它只是空间局部和直观意义上的“自在自然”和“非对象性存在”,但却是整体和实践哲学意义上的“人化自然”和“对象性存在”。因为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就是自人类第一次真正按照人的方式改造自然界的那一刻起,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就已经属于被人类实践改造过的自然了,从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自在自然”了。站在人的角度而言,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绝对自在自然。因为基于实践的主客对立的视角天然地包含以人为中心的属性,这就决定了一切现实的自然都必定是属人的自然。正如有学者所述的那样,自然界“在产生出人类以前是‘未完成’的,在产生出人类之后是从属于人、为了人的”^[8]。“在历史性先行澄明之后,当我们去研究自然时,自然就成了人化自然或历史的自然。”^[9]

颇为吊诡的一幕是,在学术史上,由于上述隐蔽二元对立思维的存在,导致恰恰是最重视“辩证”的恩格斯,反而遭受最多关于“非辩证”的批评。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责恩格斯在自然观方面“背离”了马克思,认为其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立场上属于费尔巴哈式的旧的直观唯物论。例如麦克莱伦指出,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的规律客观存在于人脑之

外的自然并且独立发挥作用,因此自然和历史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体现的却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任何构造一种外在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历史过程研究的客观依据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社会的,其意义只有通过对社会的研究才能够把握”^[10]。施米特则批评恩格斯“想在纯粹客观的辩证法意义上,解释人类史前的和外在的自然领域,这种尝试正如某些批判家们所反复指出的,事实上不能不转而使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互不相容。……离开人的思维活动和生产可以独立实现的自然辩证法观点,必然转向对‘自然主体’的泛神论、物活论的理解,随之也就放弃了唯物主义的立场”^[11]。我国当代学者当中同样不乏持近似立场的人。人们似乎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恩格斯在讨论自然辩证法问题时特别强调的一个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牢牢奠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根本立场。“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7]⁴⁷对此,葛兰西也曾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正确概念的种子在于,为了证明世界客观实在,它求助于历史,求助于人”^[12]。由此可见,只要人们愿意承认一切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属于人的活动,那么恩格斯就非但没有“离开了人”,反而是比谁都更加主动地走进历史、走进人。“恩格斯并非‘连提都没有提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相反,恩格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并结合社会关系阐述了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这是恩格斯辩证法思想中的隐性的主题。”^[13]然而,长期以来,恩格斯在自然观方面持有的这种深沉的历史视角并不为多数自诩深谙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人们所普遍注意到。那些批评恩格斯的人们往往只是单纯地、直观地注意到他所强调的客体性(直观)视角,却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主体性(主观)视角,看不懂他的唯物辩证思维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由于上述原因,人们便不得不面对如下的尴尬场面:一方面,“马恩对立论”成为他们心中一种或明或暗的挥之不去的执念;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得不承认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阐释工作中的特殊地位与客观贡献。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有的学者干脆选择性忽

略它,而有的则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去证明和强调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非核心地位,以及努力证明马克思对于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这项工作是如何的缺乏热心甚至貌合神离。这种尴尬的局面是上述隐蔽二元对立思维所导致的理论堵点的最典型表现,也是导致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难以在学理上真正完成上下全面贯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也进一步说明了隐藏在辩证话语承诺之下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异常顽固性。

三、辩证审美观承诺之下的 隐蔽二元对立思维

人们在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理解上所表现出来的隐蔽二元对立思维,也相应地表现在审美观之上。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所面临的关键理论难题正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难题同样也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主要包括自在之美与人化之美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对立、静观美学与参与美学的对立。

20世纪后半叶,我国学者受西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研究影响,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哲学思想,开创了当代中国的生态美学理论。其核心主张认为:“生态价值是人类最高价值所在,不言而喻的天地大美是至高无价之美,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人天和谐相处,是人类自救之道,也是一切美的创造发展的根本出路。”^[14]其通常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理由是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范式中,人将自然分裂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使作为主体的人与外部对象处于敌对状态,人被视为不同于自然且地位和价值高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存在的特殊存在,形成人类中心主义。鉴于此,其认为首先在价值观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而主张自然中心主义。主张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再具有独特价值,也不再享有自然界的特殊权利,而仅仅是作为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融入自然之中,人被视为“身体、心灵、环境三元融为一体的独特物种”^{[15]56}。其次,在审美上则应该摒弃传统基于主客二分认识论基础上的静观美学理论,主张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重建一种基于生态整体主义之

上的参与美学理论,即以“审美直觉”的方式体会自然对人的栖居之美、家园之美、生命之美。审美直觉主要是指人对自然的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意识,这些意识“不是一种远距离的静观,而是全身心地参与和建构。而这种建构并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建构,它承认自然本身的特性,承认自然的荒芜、不对称等不合乎认识论的形式美的地方也是美的。……在这种美学思考中,万物并不是因和人的距离才美,而是人因万物的自然状态才美。只有在万物的自然状态里,人类才找到了自我的归属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16]98}。最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应摒弃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关系而拥抱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借此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是对实践美学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其本质是一种存在论美学。其认为,虽然实践美学将社会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视为审美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曾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随着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实践美学的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审美“并不完全起源于生产劳动”,而是“取决于人与对象处于一种中和协调的亲美的审美状态”。因此实践美学“难以准确解释自然美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原始的未经人类实践改造的自然,更是难以用‘人化自然’的观点解释。因为,无论是经过人的实践,还是未经实践的自然,只要同人处于一种中和协调的亲美的审美状态,那么,这个‘自然’就是美的”,所以有必要推进实践美学“向实践基础上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17]。其指出存在论美学并不完全抛弃实践美学,并不否认审美活动源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上,而只是突出强调了审美过程中的诗意与意境,强调审美主体对人与自然“中和协调”状态的审美直觉。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主张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辩证实践观基础上,从美学的高度重建一种系统整体的自然观,这种努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它的核心理论却面临不少学界同仁的质疑。如上所述,其一方面承诺始终存在一个“原始的未经人类实践改造的自然”,断言在这个未经实践改造的自然当中存在一种质朴的“自在之美”,且人只有作为自然界普通一员的时候,即只有去掉主客对立的对象性关系意识的时候,才能够体悟到这种自在之美。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坚持实践的观

点,指出审美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就是说,其一方面主张“去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又肯定人类对自然的实践干预。或者说,一方面肯定人类的特殊性,一方面又反对人类的特殊性。这使其在理论上陷入了难以自洽的逻辑矛盾当中。“其逻辑困境的本质就在于生态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美学以人类思维为核心两个基本原则的背离。”^[16]⁹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通常选择在泛灵论与泛神论之间摇摆:一方面将人与自然视为彼此平等的主体,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主客关系,而应是彼此平等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人和自然互为主客。然而当自然被赋予了主体性地位的那一刻,其理论也就陷入了泛灵论。另一方面则是将人与自然视为彼此平等的客体,即一般自然物,然而一旦没有了对人的主体性的承诺,则一切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意义关系的表述(例如“有机整体”“生态美”等)均成了基于上帝视角的结论,由此其理论也就陷入了泛神论。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之所以面临上述理论困境,根本原因同样在于陷入了辩证话语承诺之下的隐蔽二元对立思维陷阱。这种隐蔽的二元对立思维,又是与其对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这对范畴的直观主义理解密切相关的。

首先,由于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通常倾向于承认一个未经实践改造过的所谓真正原生态意义的自在自然,与此相应其常常向往一种自然界本身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生态之美,亦即“自在之美”。对自在之美的向往又进而促使其产生超越传统实践美学的冲动,由此便极易引发基于纯粹自在自然之“自在之美”同基于纯粹人化自然之“为我之美”的二元对立。从真正辩证实践的方面看,现实自然既非纯粹的自在自然亦非纯粹的人化自然,因此既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自在之美”亦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为我之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劳动产生了美”^{[2]158-159},所谓美是人在对象化自然的劳动过程当中“按照美的规律”^{[2]163}而构造的东西,它呈现为人的一种感性、一种“享受的感觉”。而“人的享受的感觉,……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191}。可见现实自然之“美”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既不可能超越实践而先验地存在于头脑当中,也不可能超越实践而独立存在于某个与人无涉的所谓纯粹的自在自然当中,而只可能存在于实践过程当中,

其实质是“实践之美”,是“自在性”与“为我性”的统一。

其次,由于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对于自然原生态的自在之美的向往和追求,导致其在审美上通常主张一种基于单纯直觉的参与美学理论,模糊或否认审美过程中的理性因素和主客间客观存在的距离感,由此引发关于静观美学与参与美学的二元对立。所谓静观美学通常是指人与审美对象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凭借视听感官完成审美的美学理论。在其看来这是一种基于主客二分思维的“认识论哲学”的审美理论,以康德的无功利的静观美学思想为典型代表。其认为,由于上述静观美学强调人与审美对象的距离感,强调主客对立,隐含“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性自负,因此这种静观美学“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18]。而所谓参与美学(或称“介入美学”)则是基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是一种“存在于人的生存进程之中、所有感觉都介入的动态之美”^[19]。从真正辩证实践的方面看,无论是静观美学还是参与美学,本质都是实践美学。人与自然之间既不可能存在绝对的静观(距离),也不可能存在绝对的融合(零距离),因为绝对的距离和绝对的融合折射的都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其描述的是非矛盾性,而非矛盾性即非对象性,非对象性存在即非存在,非存在也就意味着生态之美将无从谈起。换言之,现实审美实践中的“静观审美”和“参与(介入)审美”其实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侧重于审美的客体 and 形式维度,强调主客距离;后者则侧重于审美的主体和内容维度,强调主客融合。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分别获得上述两种不同的审美体验。一是表现为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审美对象常常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正所谓“你的诗和远方,不过是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前者体现的正是远距离的静观审美(视听为主),后者体现的则是“零距离”的参与审美(全部感觉器官参与的),抑或“具身的(embodied)审美”^{[15]56}。二是表现为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同一个审美对象往往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正所谓“曾经的诗和远方,变成了呆腻的地方”或者“曾经呆腻的地方,变成了诗和远方”。从辩证认识论角度看体现了低级认识与高级认识、片面认识与全面认识、浅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的辩证统一。

再次,由于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对参与美学理论的笃定,导致其反对传统主客对立的审美

理论,主张审美过程的主体间性理论,由此引发关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二元对立。从真正辩证实践的方面看,用主体间性否定主体性必然导致否定人和人的现实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一种非实践的、直观的思维。在辩证实践观看来,所谓主体间性不过是广义上的主体性,即不同主体之间互为主客的关系。真正的主体间性并不排斥主体性,也不可能消除主客对立关系,它只不过是主客关系的另一种视角的呈现。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视角看,人与人的依赖表现为主体间性;从无数个体的角度出发,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对抗的主客关系。从真正辩证实践的方面看,审美过程不可能在没有主客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审美一定是主体对象化于客体的结果。我国的一些生态美学学者引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同西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理论关于“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相提并论,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倾向于用前者论证后者的合理性,往往忽略二者的区别。西方生态美学理论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是主张人类返魅到自然的原生状态,即无主体意识(“无我”)的状态,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却与此不完全一致。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即便是处于自然境界以上的所有境界中的人,都始终是“有我”的,“不惟不是‘无我’,而且是真正的‘有我’”^{[20]610}。人的审美境界应属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范畴,人在审美过程中不但“有我”,而且是有“真我”,即“知天”的我、“与天地参”的我。尽管审美上的“忘我”与动物式的“无我”看似两种非常近似的状态,实则存在天壤之别。人们之所以往往看不清二者的分别,一来是“因为不知有我,有时候似乎是无我或无大我”,二来是因为“自然境界与天地境界,又都似乎是混沌”^{[20]611}。真正辩证的实践观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人在自然景致面前的所谓“无我”其实只是一种假象,真相仅仅是人们在理智上达到了近乎“忘我”的“超然”状态。人类所追求的“养浩然正气”以达“与天同一”的状态,本质上不同于动物的“与自然界直接同一”。前者是混合了信念、向往、想象、认知等多种非理性和理性因素的综合,后者只是单纯的动物式感知。前者是先拥有了通透的“觉解”而后“坐忘”,后者是原本就不曾拥有觉解。前者是经过否定之否定而进入了审美境界,后者则始终停留于动物境界。总之,审美直觉固然能够给人“忘我”的、主客体水乳交融的

“审美意象”,使人产生“无我”的假象和信念,但它的本质仍不过是以“我”为出发点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意识。

最后,为了适应审美过程的主体间性逻辑,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必然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主张去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只能是主体间性”^[21]。由此引发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真正辩证实践的方面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自然的内部关系是内在一体的。因为人类是现实自然的一部分,而现实的自然不可能绝对“自在”,总是具有实践属性,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自然内部的关系,反之亦然。在这里,实践被理解为自然界诸多运动方式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现实的自然则被理解为实践。当代生态美学理论的真正思维方式是直观的二元对立思维。由于这种直观性,导致它所理解的“自然内部的关系”是“纯粹的自然物”之间无声的、非人的关系,人仅仅作为普通自然物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真正的、现实的人被抽掉了。因此“自然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在它那里必然表现为“返魅”,表现为“没有人”的“主义”。同样由于这种直观思维,导致它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的人”同“纯粹的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里的“人”是异质于“纯粹自然物”的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人”),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关系,只要有这种“人”存在,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美学看来,在认识论哲学将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并用主体的思维能力为客体立法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16]96} 综上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内部的关系在单纯的直观视角里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可统一的关系。只有在辩证实践观的视角之下,即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内部的关系同样被理解为“实践”的前提下,这两种“关系”才能被真正统一起来。一旦这两种关系被统一起来之后,“自然中心主义”便失去了其“返魅”的内核,其核心内涵转而变为“以保护自然生态为目的”的“主义”,与此相对应,“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则是“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主义”。由于保护自然和满足人类需求是可以相统一的,因此“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并不必然导致对立,二者之间完全存在统一的一面。

结 语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而言,尽管坚持辩证思维是我们最常作出的原则性承诺,但是隐性直观思维却常伴随我们的实际运思过程,导致我们常常陷入各种二元对立的困境当中。这或许与辩证思维方式的反日常、反常识、反直觉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人们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身处日常生活情境当中,常识性思维是人们普遍最熟悉、最擅长的思维方式,因此即便是对于专业学者而言,在常识性思维与辩证思维之间切换也同样存在风险,要想始终保持真正辩证的头脑状态并非易事。这启示我们,辩证的思维方式不仅应成为我们的方法论信仰,更应成为我们的方法论自觉。我们对于辩证法固然要心存敬畏,但仅有敬畏还不足,还需用意志和理性持续为之开辟道路。

参考文献:

- [1]吴建国,崔绪治.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J].中国社会科学,1980(6):47-6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刘福森.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J].人文杂志,

1989(20):35-40.

- [5]黄楠森.重谈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0):34-40.
 [6]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53(2):5-25.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舒远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79.
 [9]俞吾金.哲学的“世界”概念[J].长白论丛,1996(1):29.
 [10]麦克莱伦.恩格斯传[M].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5.
 [11]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欧力同,吴仲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5.
 [12]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跖,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58.
 [13]杨耕.“回到辩证法”:关于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19(12):3.
 [14]李欣复.论生态美学[J].南京社会科学,1994(12):54.
 [15]程相占.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J].探索与争鸣,2016(12).
 [16]孙丽君.生态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逻辑困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17]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J].文艺研究,2002(5):13.
 [18]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J].文艺研究,2007(4):21.
 [19]曾繁仁.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J].文学评论,2012(2):110.
 [20]冯友兰.贞元六书: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1]杨春时.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81.

Deconstructing Binary Oppositional Thinking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Past Research into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Practice, Nature, and Aesthetics

Peng Zhien

(School of Marxism,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Dialectical discourse commitments have coexisted with latent binary oppositional thinking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inquiries since the 1920s. Research on Marxist perspectives of practice, nature, and aesthetics stands out as particularly representative in this contex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ert binary oppositions obscured by dialectical discourse, Marxist views on practice, with it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and conceptions of nature as "in-itself" versus "humanized" and aesthetics as "intrinsic beauty" versus "beauty for us" are often reified, purified, and absolutized. This has led to a series of stubborn theoretical bottlenecks that persistently obstruct scholarly advancements. Reflecting on and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se bottlenecks and the underlying modes of thought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resolution of long-standing, unproductive debate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a genuinely coherent and integrated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ical system.

Keywords: binary opposition; Marxism; practice perspective; nature view; aesthetic perspective

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

——“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克

(台州学院 和合文化研究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2023年11月7日至8日,“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召开。论坛以“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为主题,围绕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合文化的实践价值,以及天台山、台州与和合文化等论题展开。论坛彰显了和合文化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价值,实现了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新突破,显示了和合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全球文明倡议;天台山;综述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4

一、引言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之一,其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追求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发展 and 未来人类命运走向均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2023年11月7日至8日,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华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台州市天台县隆重举行。本次论坛以“和合文化与全球文明倡议”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和合文化,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论坛设置文明对话合作、共同价值引领、保护传承创新、家庭文明建设四个分论坛,深入讨论和合文化各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大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温州大学、台州学院,以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台州市委党校、中共天台县委党校、浙江道教学院、天台山文化研究院等机构组织的论文60篇。著名学者彭永捷教授、许正中教授、刘建平

教授、孔维勤教授、张新鹰教授、张永路副研究员、陈明教授以及徐永恩先生做主旨发言。围绕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和合文化与社会治理、和合文化与儒释道思想等论题,本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下择要简述之。

二、和合共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本次论坛主题相契合,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本次论坛的中心论题之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郭海龙助理研究员认为:在美欧中俄+英日+印度巴西(“4+2+2”轴对称结构)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各方的权力交汇点在北冰洋,这预示着北冰洋世纪(北极时代)的到来。中国和合文化的传统将有助于权力的和平转移,这便凸显了和合文化在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的独特价值。中共缙云县委党校尤永盛和中共丽水市莲都区党校李琪琪认为:和合思想有助于消除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有助于中

国-东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体途径包括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文化推广、做好贸易合作、做好服务救援等。

成都理工大学**罗浩轩**教授和**雷达**认为:当前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遭遇西方势力各种诘难,实则映射出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话语地位与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国要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主导权,更好地传播“中国方案”,应努力将独特的中华文化基因融入“中国方案”传播理念,拓展“中国方案”多样化传播渠道,逐一回应“中国方案”的西方叙事以及提高“中国方案”国际传播精准度。厦门大学**韦俊全**博士和**谢清果**教授认为:“中国之治”具有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传播层面以“和平发展”对话“霸权主义”、经济传播层面以“开放包容”对话“利益封锁”、文化传播层面以“文明共生”对话“文明冲突”、生态传播层面以“命运共同”对话“人类中心”。

北京大学**闫雨**副研究员和**王燕**副教授指出:中正平和、以人为本的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有补偏救弊之功,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进文明交流,加强“一带一路”文化合作,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文化治理的现实路径。中共江门市委党校**邹陆林**副教授指出:儒家仁爱思想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济南社会科学院**王政**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和举措。陕西师范大学**王一博**博士认为: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融合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对和合文化理论资源的激活和引领。

三、和合大同:和合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青岛科技大学**吕幸福**副教授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华“和文化”的渊源,认为总书记“一和四观”的提法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认识。《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王艳**编辑将研究重点放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与和合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文化基础上,并指出:“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

斗争性与和合文化尚和性合并,是统一战线既斗争又联合理念的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联合理念与和合文化和谐观念相融通,是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许峰**教授从融合之基础、可能、趋向三个维度,论述了党性修养与和合文化的内生性价值关联。

和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兰溪市委党校**何霄航**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而是采取与西方现代化“和合”的态度,从显隐秩序和合的内在规定,通过语境、话语和价值三重尺度进行秩序和合以求擘画人类文明新图景。暨南大学**郑维**博士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这主要表现在和平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

中共天台县委党校**姚楚楚**认为:和合文化能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注入文化力量。中共汕尾市委党校**王天旺**教授和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丁万英**副教授认为:和合文化有助于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天台县人民法院**姚梦莹**和**杨丹**则从基层法院的角度论述了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精髓、进程及其司法价值体现,并探讨了和合文化价值转化的方式和途径。

安庆师范大学**蔡洞峰**副教授和**殷洋宝**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和合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鲁东大学**邢亮**教授和**李林**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条实践路径,分别是在团结奋斗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在共建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在实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台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梁立新**副主任讨论了如何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弘扬和合文化。天台山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秋月**通过对和合文化的时代价值、历史脉络、基因解码等方面的学理分析,对新时代背景下和合文化传播路径、社会效能转化路径、经济效益转化路径的实践探索,阐明了和合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和合智慧：和合文化的实践价值

和合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又包含巨大的实践价值。大到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共同富裕的实现,小到乡镇治理、文化的打造以及文化旅游的繁荣,均可见和合文化的现实意义。绍兴文理学院**蔡爰斌**和**赵江**认为:和合文化中的“以和为贵”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利于改进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和而不同”与“执两用中”的观念有利于丰富社会治理模式。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科研处**林宁**处长指出:和合智慧是中国人民向往共同富裕、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力量。中共台州市委党校**徐利芳**副教授、台州科技职业学院**魏广志**认为:和合文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魏广志进一步指出:和合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路径是“以国家目标为宏观战略指导,探索实现其目标的宏观路径;以省域目标为中观战略指引,丰富实现其目标的中观路径;以市域目标为微观战略指路,践行实现其目标的微观路径”。和合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对策是“从和合文化的内涵性视角出发,既要物质富裕,又要精神富有;从和合文化的差异性视角出发,要承认适度差距,反对平均主义;从和合文化的统一性视角出发,要追求共同富裕,避免贫富分化”。

中共天台县委党校**张密珍**认为:和合道德观是在吸收儒家道德观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的深刻内涵。中共台州市委党校**马井彪**阐述了和合文化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沟通机制优化的意义。同时,他指出:在具体运行中存在农村基层村民参与协商沟通的水平不高、农村基层协商沟通平台的建设力度不够、农村基层协商沟通的内容不够明确细化等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刘建锋**副教授认为:“新时代中国小乡镇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与地方优秀乡俗文化,融合政府、资本与当地文化,融合现代科技建立云会馆、云文化平台,建立现代小乡镇文明体系,定位小乡镇优秀文化的现代性与本土性融合发展,借鉴城市社区文化活动经验来传承、创新小乡镇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小乡镇优秀文化

的时代新风尚。”

中共天台县委党校**蒋丽娇**以天台县为例,分析了和合文化传播体系的建设。中共天台县委党校**陈蒙媛**分析了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天台和合文旅深度融合的内在优势与实践模式。其中内在优势包括“人与自然和合”的生态资源禀赋和“人与社会和合”的人文环境优势两大方面;实践模式包括理念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交流融合六大方面。

五、和合圆融：天台山、台州与和合文化

诞生于台州的和合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天津社会科学院**张永路**副研究员认为:“和实生物”是早期中国生成论的代表,其与阴阳原理相结合,形成的阴阳二气和合化生万物的阴阳和生理论,正是中华文化解释宇宙万物生成的最重要理论和最普遍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在题为《和合的基本内涵与现代意义》报告中提出:从差异、中庸、最优、人性四个角度来理解和合,对于更好地认识和运用和合文化有着重要的启发。中国台湾孔子研究院院长**孔维勤**围绕“一针一线的和合文化”“以人为本的和合文化”“经世致用的和合文化”“中国梦的厚德载物”“和合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常态”五个方面讨论了和合文化的特性。天津社会科学院**张新鹰**教授所作的《“和合文化”全面反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发言,认为和合文化清晰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中共中央党校**许正中**教授作《数字文明开启人类和合文化新范式》的报告,认为人类再次面临新式文明的跃升,数字文明开启了新式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创新,以和合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应对数字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

温州大学**崔岐恩**教授等从宇宙观的角度讨论了物质、符号、精神三个世界的双螺旋结构,认为三者以和合之态涡旋于挠场,而和合运动则包含符号化、升华、降解三种状态。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周琦**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天台山和合文化学产生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论述了“天人和合论”“社会和合论”“自我和合论”“文化传播论”四

个方面的内容。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徐永恩**作题为《建立和合文化联盟(国内)的构想》发言,就建立和合文化的国内联盟,阐述了台州市建立和合文化联盟的紧迫性、重要性、可行性。

和合文化的“根”和“源”是和合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有鉴于此,台州市和合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明**教授作了题为《以和而合,以合而和——和合文化的文明论根基试说》的发言,认为“和”是相应,相应的前提是相似,是和谐;“合”则是配、聚、会。“和合”可理解为相异的二者相应相配聚为一个整体,同时指出天、地是和合文化的根基。台州市和合文化研究院**杨供法**副教授和**杨轲玮**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从和合字源上看,‘和’‘合’在甲骨文中就已分别出现了;从和合文化的思想源头看,和合文化源于河图洛书,远比‘三祖’甚至伏羲时代早;从其社会根源看,和合文化根源于群体劳动中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从其文化符号产生的源头看,和合文化的象征符号源于周代之前的‘媒官’”。以上关于和合文化根基、源头的新论,对于学界重新思考和合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启示。

作为和合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寒山、拾得,也在本次论坛中被精彩阐释。台州学院**王正**教授提交的《论和合精神观照下的寒山禅诗》一文,围绕和合精神的本质内涵、寒山与和合精神的关系、寒山之于和合精神的意义三个问题展开。作者指出寒山的生平事迹,本就是一个从“人一世”冲突到“身一心”和合的过程。其诗中所述静坐观空、明心见性、妙有显真的禅修心路历程,实现了由“外”向“内”、由“有”转“无”、由“空”融“真”的三个转变。寒山诗以山水之境传达幽玄之思,在禅悟的彻底和深邃方面,在表现禅趣的满目生机方面,在心灵的自足、和合、圆融等诸多方面,也较之其他诗人更为通透。王正教授指出寒山其人其诗对于唐宋时期文人的影响力,东南大学**魏福明**教授则具体分析了王安石《拟寒山》诗中所阐发的佛理,他认为该诗主要涉及般若空观、佛性自具和因果业报,这些内容构成了精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体系,与宋儒的哲学思维也具有相似性。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蕴含着深厚的和合思想。温州大学**路永照**教授认为:出现在《老子》不同章节的“和”,其意义并不一致。首先,第十八章的“六亲不和,有孝慈”、第七十九章的“和大怨,必有余怨”,乃表征社会伦理层面的平和、融

洽。其次,第二章的“音声相和”、第四十二章的“冲气以为和”,是表达哲学方面的相关应和、作用。最后,第五十五章的“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第五十六章的“和其光,同其尘”,表现的则是理想存在方式的和谐、自然。商丘师范学院**舒笛**认为:和合思想贯穿于庄子的宇宙观、生成论、内圣观和外王论之中。太原理工大学**吴金生**研究员和山西大学**吴昊**将视野扩展至先秦诸子,考察和呈现诸子思想和合的人文气象与历史价值。

和合文化与儒家思想有共通之处,西南大学**刘建平**教授在《“理一分殊”:和合文化的精神拓展与实践》的报告中提道:“理一分殊”的命题是传统和合哲学精神的新发展,同时,也可成为现代跨文化对话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高贵朋**分析了“民胞物与”中蕴含的和合思想,认为其包含着“仁和天下”的德性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和“万世太平”的和平理想。

台州学院**何方形**副教授敏锐地观察到在关于天台山的书写中,人们对于王士性研究的忽视。在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他认为:“就天台山文化而言,王士性与徐霞客二人都是通过客观描写,熔铸赞颂之情,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具有整体性思维。感性、知性与智性兼具而韵味自生,臻于胜境且跨越同时代人,都是文学风尚转型的产物。”台州学院**王波**等也注意到学界对于台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的困境,建议使用和合文化来概括台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特征。浙江省群众文化学会**裴斐**以天台山契约民俗与天台山民俗博物馆馆藏民间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从传统契约制度和天台山契约文书两个层面,分析了天台山契约民俗的和合精神、和合共赢理念,同时指出契约民俗中和合理理念的当代启示与价值。上述三篇论文分别在文学、建筑学和民俗学领域,扩展了和合文化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作为佛道共栖的天台山,其宗教文化历史悠久而内涵深厚,浙江道教学院**万勇**、**李星晨**通过文献分析、访谈研究、观察信息等方法,从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信仰情况、演变原因等方面,分析了天台桐柏真人的信仰更迭与转变。浙江道教学院**郑为一**论证了张伯端在天台山和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将其标举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旗手”。浙江道教学院提交的两篇论文,展

现了新时代道教界人士对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理解。或可期待,在今后的论坛中,可以见到佛教界人士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以契合天台山佛道圆融的文化标识。

台州及其所在的浙东,因地理相邻,历史上便与东亚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台州学院胡正武教授描述了浙东诗路名茶与茶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事实,他认为茶叶与茶文化起源于中国,茶道则形成于日本,中国茶艺的东传与日本茶道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都与浙东唐诗之腹心区域存在密切关系。如果说茶及茶文化体现的是“往教”,那么,日本天台宗的“唐决”传统,则为“来学”。对此,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钦泉研究员指出:“唐决”请益与“问难”融摄具有复杂的多重面向。但就日本天台宗的演进而言,日僧入宋,借以“唐决”的请益形式,的确增强了自身发展的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六、结语

统观本次学术论坛,既取得了丰硕成果,又有着鲜明的特色。其一是宏观研究与微观案例的结合;其二是理论探索与实践分析的并重;其三是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的兼顾。前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应重视和合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以加强学术对话。又如,应明确和合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以构建和合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总而言之,本次论坛彰显了和合文化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价值,实现了部分论题的新突破和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显示了和合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Hehe Cultur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2023 Global Forum on Hehe Culture"

Xu Ke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he Cultural,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2023 Global Forum on Hehe Culture"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Tiantai County, Taizhou City from November 7th to 8th, 2023. With the theme of "Hehe Cultur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this forum focuses on the topics of Hehe Cultur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ehe Culture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value of Hehe Culture, as well as Tiantai Mountains, Taizhou and Hehe Culture. This forum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Hehe culture in global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and its practical value in social life. It has achieved new breakthroughs in some topics and expanded research fields, demonstrating the broad prospects of Hehe Culture research.

Keywords: "2023 Global Forum on Hehe Cultur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Tiantai Mountains; summary

中华和合文化源头新探

杨供法¹, 杨轲玮²

(1.台州学院 和合文化研究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2.谢菲尔德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英国 谢菲尔德 S1 4TY)

摘要:关于中华和合文化的源头,学者主要从其产生的时间和文化母体两方面考察,前者最早定位为伏羲时代,后者主要定位为龙图腾文化、“三祖”文化和天台山文化。和合文化源头的这些定位都有其不足,和合文化探源还可以从思想渊源和社会根源两个方面着手。河图、洛书蕴含了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终极”源头;群体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中华和合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

关键词:和合思想;源头;河图;洛书;分工;协作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5

探源和合文化,不仅由此能观察民族文脉及其亲缘谱系,更是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就其研究现状看,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的观点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从和合文化产生的时间看,主张和合文化“源于先王”说。但因“先王”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因而在和合文化发端的时间上又有差别。如叶万松、徐圣选认为和合文化的“源头在黄帝时代”^[1]。杨建敏也认为:“炎帝神农时代,出现了和合思想的萌芽,炎黄结盟,催生了和合思想。”^[2]李孟存等人则认为和合文化的发端要晚一些,他们主张和合文化“源于陶尧”。其理由是,尧是中华文明曙光时代的鼻祖,他们援引《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为证,认为尧是孔子眼里的“先王”,因而得出了“和合思想的源头当尧莫属”的结论^[3]。二是从和合文化产生的母体看,这类观点不论和合文化的发端时间,而是转向其得以产生的母体。如郭胜强认为传统儒家学派的中和思想是和合文化的重要源头^[4]。徐鸿武、谢建平则主张“多源”说:“中华和合文化最早发祥于龙图腾文化、三祖文化、天台山文化,这些都是中华和合文化的源

头。”^[5]但细究起来,这一推断尚有讨论的余地:第一,龙图腾文化与天台山文化在形成的时代差上,至少超过5 000年,把跨越如此之长的不同文化形态都视为和合文化的源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判断。第二,“龙图腾”不是单一动物的形象符号,而是多种动物形象的集合体,每一种动物形象很可能是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是代表某个氏族部落文化的符号象征。因此,作为由多种动物符号汇合而成的龙图腾,无疑蕴含了多个氏族部落文化“不同而和”的思想。就此而言,把龙图腾视为和合文化的源头,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判断。但问题在于,龙图腾文化与“三祖”文化在产生的时间和内容上都高度重叠。“三祖”文化是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各自代表的部落文化,把这三种不同的部落文化融合起来,成为“三祖”文化,自然具有“和而不同”的显著特征。然而,“三祖”文化与龙图腾是一体的,“三祖”文化是实体,龙图腾则是这个实体的符号,不能把文化实体与文化符号分割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应视为同一文化形态的不同组成部分。换言之,龙图腾作为“三祖”文化的符号,是早期中华和合文化的一个象征。但把两者并列起来,作为和合文化的

收稿日期:2024-06-02

作者简介:杨供法(1963—),男,浙江临海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华和合文化;杨轲玮(1996—),男,浙江临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两大源头,这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赞同和合文化是多源头融合的结晶,但我们也认为中华和合文化另有其源。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和合文化的思想之源和社会根源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和合文化的思想之源

追溯和合文化的思想源头,有必要先了解已然成形的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体系,找出其中最基本的思想。如果能探索到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源头,也就找到了中华和合文化的源头。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期,也是和合文化的基本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儒、道、墨、法、兵、农、阴阳、名和杂家等流派多元并存的和合文化生态(史称“百家争鸣”);更重要的是基本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体系,包括“和实生物”^{[6]573}的本源论、“天人合一”^①的宇宙观、“和为贵”^{[7]12}的价值观、“允执厥中”^{[8]361}的思维方式、“和而不同”^{[7]160}的社会观、“协和万邦”^{[8]6}的国际观、“并行不悖”^{[9]1036}的文明观,以及“天下大同”^{[9]419}的社会理想等。以上8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万物起源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等一系列问题,构建了一个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和合思想体系^[10],标志着中华和合文化的形成。中华和合文化就是以和合思想体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合二圣”为符号象征的文化。其中的“和实生物”作为和合文化的本源论,是派生和合文化其他思想的基础。因此,探究“和实生物”思想之源,是我们追溯中华和合文化源头的可行之路。

“和实生物”是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合文化本源论,是他在综合商末思想家箕子的“五行”说和《周易》的“阴阳”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6]573},说的便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和合而衍生百物。他也以阴阳失调来解释地震产生的原因:“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6]28}在这里,史伯提出了阴阳五行和合衍生百物的思想,这是史伯所提“和实生物”本源论的实质内涵。探明了阴阳五行说的源头,也就搞清了中华和合文化的总源头。

(一)“五行”说

“五行”说最早见于《尚书》,因此《尚书》应是

五行和合思想探源的始点。《尚书》有多篇出现过“五行”。其中《甘誓》篇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另一篇《洪范》有对“五行”的具体说明,并且开始将其与“五味”对应起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8]145-146}在这里,箕子举例说明了五行和合如何衍生咸、苦、酸、辣、甜“五味”。《甘誓》通常被认为是夏书,《洪范》是商书,如果这两个判断成立,那么五行和合的思想早在商周之前就有了。或者说,由于思想总是存在于书写思想的文本之前,如果《尚书》写定于商周,那么其五行和合的思想至少可以上溯至商周之前。

这一判断有不少文献可以佐证,如《尚书》还有一篇有关“五行”的记载:“禹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8]355}这显然是说,夏禹之时已有“五行”说。《吕氏春秋》更把“五行”说之源推至黄帝时代:“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11]375-376}可见,商周时人认为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之时已有“五行”说,断定“五行”说源于黄帝时代也似乎持之有据。以据实写春秋闻名的司马迁似乎也对此深信不疑,他在《史记》中记载“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甚至断言“五行”说乃黄帝所创:“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12]

然而,后人对“五行”说源于先秦之前的认定多有质疑,他们认为“五行”说之源不会早于商周。就笔者寡闻所及,持此类观点的学者非常多,说法也莫衷一是。如彭华认为,直至商朝中后期,商人仍没有明确的“五行”概念。“五行”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应当就在殷商末季”^[13]。梁启超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谈道: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五行,其语希见,其义平淡。且二

① “天人合一”出自北宋张载的《西铭》,但这一思想在先秦已出现了。如《周易·乾卦》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又如《道德经》“人法地”等思想观点,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早期体现。

字从未合为一谈。他认为,较为系统的“五行之说”始于《吕氏春秋》^[14]。后来,其弟子刘节作《洪范疏证》一文,推定《洪范》所载的“五行”说并不是三代之前的学说,“当在秦统一中国以前、战国之末”^[15]。

庞朴对梁启超师徒的观点则不以为然,他把“五行”说的流行扩及整个先秦时期。他说:“整个先秦时期,几乎很少有哪个思想家不谈五行;所差别的,只是分量的多寡和方面的不同而已。”“五行思想在当时是人们比较普遍接受的思想。”^[16]总之,“五行”说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属见仁见智,一时难以定讞。

(二)“阴阳”说

阴阳最初的意思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据《说文解字》解释,阴的本义是“水之南,山之北”;阳的本义则是“山南水北”^[17]。阴、阳分别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但能表明其义的文字罕见。最早比较系统阐述“阴阳和合”思想的文献是《周易》,只是阴、阳两字在这里未联成“阴阳”范畴,尚以单字形式分别出现,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18]9}。但可以确定的是,关于“阴阳和合”的观念在这里已相当清晰了,如“阴凝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18]43}、“履霜坚冰,阴始凝也”^{[18]30}。其他虽不以阴、阳直接表述,但与此类似、具有相反相成的范畴则反复出现。如乾与坤、刚与柔、泰与否、贵与贱、损与益等,这些范畴与阴阳一样,讲的都是事物不同的“两端”。

不过,这些“两端”在《周易》里不是对立的,皆有相反相成的和合之意,典型如泰卦(䷊),其卦象为上坤(地)下乾(天)。具体言之,䷊的上半部分是坤卦,代表地,地属阴,表示阴气在上;下半部分是乾卦,代表天,天属阳,表示阳气在下。而从阳气变化趋势看,它是由下往上升的,阴气则从上往下沉。当上升的阳气与下沉的阴气交汇平衡,混为一体,就达到了一种“和合”状态,也就“泰”了。阴与阳的这种和合过程,存在于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中,用老子的话说,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9]。阴阳和合,衍生万物,这是《周易》的一个核心思想,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18]571}。

“五行和合”与“阴阳和合”是和合文化本源论的两种观点,借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前者是一种多元和合本源论,后者则是二元和合本源论。究竟

是谁把这两种本源论合而为一的?通常认为《黄帝内经》最早把“五行”与“阴阳”融合起来,表现在它不仅以“阴阳反作”解释病理,更把“阴阳调和”“五行相生”视为“治病必求之本”,甚至看作是决定人“死生之期”的东西,认为“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20]。但《黄帝内经》不仅作者的身份尚难确认,在成书年代上也大有争议,有说是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也有说是成书于西汉中晚期。我们认为,史伯最早把“五行和合”与“阴阳和合”融为一体,提炼出“和实生物”的观点,以此解释百物成因,相较于《黄帝内经》的类似解释要早300多年。

(三)伏羲“八卦”说

其实,“五行”说和“阴阳”说始于何时,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两种思想源头的探究和认定,因为一种思想的形成时期,与它的起源时间是不同的范畴。如果按照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标准看,阴阳和合衍生百物的思想最早见于《周易》,五行相生衍生百物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那么和合思想之源可以据此追溯至商周时期。

《周易》和《尚书》是否就是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终极源头?恐怕还不能这么肯定。孔子推断:“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18]639}这是说,《周易》的创作时代,大概在殷商之末年周文王道德隆盛的时候,其内容反映的是文王与纣的事情。这里用“兴”字,意味着“易”思想(包括阴阳和合思想)在商或之前就有了,到了商代末期发展到最“兴”,周代只是辑录成书为《周易》而已。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在商或商之前,“易”思想就已经产生了。

在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探源中,如果我们囿于文献的记载,来推断和合思想的起源,会让自己的思维陷入迷乱。因为在有关阴阳五行说之源问题上,不仅古文献本身的记载不一,后人据此研判的结论也众说纷纭,所以明智或许也是科学的方法是,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众所周知,《周易》的核心内容是八卦,而八卦乃伏羲所作,“古者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18]607}。这里记作“始作八卦”,也就是说,孔子显然将伏羲视为创制八卦之人。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爻有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气,阴爻表示阴气,由此我们可以将阴阳和合思想

之源推至伏羲时代。但深思之后,则颇觉这一文献论据并不充分。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合文化也是深远绵长,仅仅凭借传世文献,即便是孔子辑录的《周易》来推断文字产生以前的和合思想之源是不够的,还须借助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同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来探究其蕴含的思想,科学追溯传承至今的和合文化源泉。2014年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遗址的发现就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为我们探源和合思想提供了极为珍贵而有力的证据。这里出土的彩陶是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这一时间与伏羲时代大致相当)。其中一个陶罐上有一幅卦象,很像“豫”卦,上卦为“震”,由两根阴爻和一根阳爻构成;下卦为“坤”,由三根阴爻构成,与伏羲所创的“八卦”卦象非常一致,见图1^①。这一考古发现与《周易》记载的“始作八卦”所指一致,都指向伏羲或者伏羲时代。如此看来,阴阳和合思想应是源于伏羲时代。我们推断的和合文化这一源头,远早于本文开头所列的两类源头说,也远早于司马迁的“源于黄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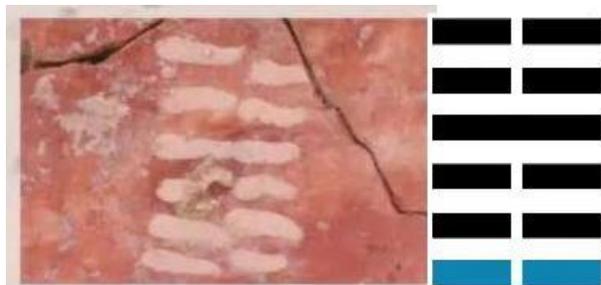


图1 义乌桥头遗址彩陶上的卦象与伏羲“八卦”卦象

然而,我们旋即否定了这一推断。因为我们细究之后发现,“八卦”还不是阴阳和合思想的终极源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伏羲作八卦也是有所本的。相传伏羲为部落盟主时,看见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它的背上有十个图点花纹,后人称为“河图”(见图2),伏羲依据这些图点画成八卦,流传数千年。大禹治水,巡查至洛水时,发现一只神龟从河水中浮出,其背上也有一幅图案,后人称为“洛书”(见图3),夏禹据此治理天下。《尚书》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8]144}其中的“洪范九畴”就是洛书。至此,我们应明白伏羲作八卦的依据是河图,夏禹治理天下的依据是洛书,正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8]596}。这样看来,将和合思想源头停留在伏羲及其所作的八卦上还是不够的,八卦还有它自

身的思想源头。

(四)“河图”“洛书”说

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两者是否蕴含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

对于前一个问题,历代论者有不同的说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到春秋时期,已没有人见过河图、洛书了。晚年的孔子为此感到非常遗憾:“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7]101}1500多年后,河图、洛书才“失而复得”。据说,朱熹的弟子蔡元定曾入蜀找到了河图、洛书,并交给了老师,朱熹便将它们附在了《周易本义》里(见图2、图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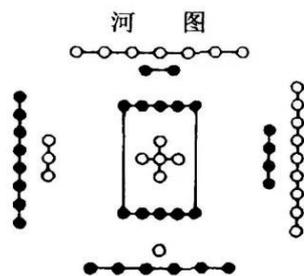


图2 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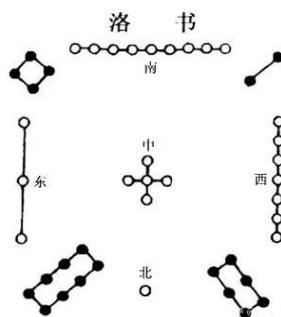


图3 洛书

河图、洛书不仅内含阴阳和合思想,还蕴含五行和合思想。我们知道,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用“结绳记事”的办法解决许多事情。在河图(图2)中的这些黑白点很像绳结,绳结的不同数量,表示不同的空间方位:一个白点表示“北”、两个黑点表示“南”、三个白点表示“东”、四个黑点表示“西”、五个白点则居“中”。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十,分别代表北、南、东、西、中五个空间方位,即“五方”。洛书(图3)其实是河图(图2)的延伸发展,也就是说,把河图上的偶数

^① 图片由作者合成,仅为了比较说明陶文与卦象的类似。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局。

(黑点)移到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的位置,构成四维;留下的奇数(白点)依然标示五方,五方加上四维,就构成了九宫(传说禹据此把天下划分为九州)。这看似简单的黑点移位,却代表着先人扩展了对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的认识,是先人关于完整空间知识体系的体现^[22]。

对和合文化探源意义重大的是,前人将五行引入河图、洛书,与五方对应起来,为和合文化探源超越“三祖”说开辟了新的前景,让今天的我们有可能将和合思想之源延伸至河图、洛书。需要说明的是,论述五行与五方对应的文献众多,但最先是何人、何时以及如何把两者对应起来,尚需进一步比对和考证。这里摘录隋人萧吉引春秋时期元命苞的说法,以便呈现前人是如何联结五行与五方的:木者,触也,触地而生,其时春,其位东方;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其时夏,其位南方;土者,地之别号,其时季夏,其位处内(中位);金者,禁也,阴气始起,其时秋,其位西方;水者,五行始焉,元气之溱液也,其时冬,其位北方^[23]。也就是说,五行的每一行各代表一个方位,即木:东方一春,火:南方一夏,金:西方一秋,水:北方一冬,土:中方一季夏(或全年)。有学者据此得出“五行起源于五方”的结论^[24]。由于春、夏、秋、冬四时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于是木、火、金、水、土五行之间也有了相生相克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关联,在汉宋的许多文献如《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太极图说》《易学启蒙》等文献中均有论述。

将五行与五方对应,从形式上看,是把金、木、水、火、土与黑白点、奇偶数融合在河图、洛书之中;从文化内涵上看,其实是把相生相克的五行和合思想与阴阳和合思想融为一体,使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成为河图、洛书和合思想的重要内容。诚如清代著名学者江永所说:“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已。”无怪乎他得出结论:“阴阳五行正是‘夫子(朱子)发明河图、洛书之数也’^[25]。

总之,古代论者在河图、洛书里看到了阴阳图像,发现了奇偶数、黑白点。我们则从中解读出了其中蕴含的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进而推论出河图、洛书是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之源,因而是迄今有案可稽的和合文化之源。

二、和合文化的社会根源

探源和合文化,除了依循历史的逻辑探究其和合思想之源外,还可根据唯物史观,探究和合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合文化不是在文化系统中自我生长的,而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6]。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们的生活,也塑造了文化。正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会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一样,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也会结成分工协作的劳动关系,尤其是在群体劳动过程中,人们的分工协作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合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或者说,要使群体劳动顺利完成、实现群体劳动目的,必须维护和促进其中的分工协作关系。而倡导不同个体和平共处、合作互助的和合文化,既是在群体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实现群体劳动目的所需的。

和合文化也可称为合作文化。只要存在分工,就必然需要一定的合作;有合作关系,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和合思想。虽然劳动分工的种类与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协作关系在文明初期的狩猎采集时代就已存在。如果考虑到劳动创造了人类,有群体劳动就有分工协作,我们甚至可以更加大胆地推断:和合思想应在那时就出现了,或者说,和合思想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

一般而言,人类社会早期的分工是自然分工,男女两性区别和年龄区别成了自然分工的标志——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负责狩猎,获取“周生之本”^[27],女人负责采集和照顾老幼。这是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和合关系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进入农耕社会,劳动过程还是以自然分工为主,如普遍存在的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男性从事重体力的耕作,保障家庭食物来源,解决家庭“吃”的问题;女性织布,为家庭添补衣物,解决家庭“穿”的问题。两性既分工又协作,合力保障家庭衣食所需,缺少了任何一方,家庭生活便难以继。正如《周易》所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8]561}也就是男人为阳,女人为

阴。天道刚健有为,坤道厚德载物,万物才能丰长。男女各尊其道,阴阳调和,人间才能和谐繁荣。《吕氏春秋》也引“神农之教”说:“土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11]807}距今约4 000~4 600年的龙山文化就存在男耕女织的分工,在1965年发现的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男子骸骨旁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妇女骸骨旁多随葬纺车轮^[28],这一发现足以证明男耕女织分工在我国历史上久远悠长。也就是说,男耕女织是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关系,也是夫妇和合的重要经济基础。明白了男耕女织分工的历史,也就能理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歌为何能传唱至今,就能理解家庭劳动中的分工协作对于滋育包括家庭和睦在内的和合文化的意义。一旦生产力得以发展,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不再成为家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形成新的基础,夫妻之间传统的“夫唱妇随、百年好合”的和睦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和合文化能在商周时基本形成,还与井田制下的劳动方式有关。井田制下的劳动方式,主要是集体劳动。《诗经》有许多诗篇描写了井田上的劳动场景,如《周南·芣苢》就是一篇农妇集体劳动的欢歌:“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漉之。”^{[29]15-16}这首欢歌博得了清代方玉润的赞叹:“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30]而《周颂·载芟》也描绘了老幼出动、男女合作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景:“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侯。有嘏其磕,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29]776-777}如果从和合文化的视角看,在这首诗里,劳动目的是什么似乎不紧要了,集体劳动中的分工和协作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有人除草,有人砍树枝;有人耕地、有人播种;有人劳动,有人送饭。在这样的劳动中,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和谐:男人对女人的温存,女人对男人的体贴;老人对孩子的关爱,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这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劳动场面,又是互助、互爱的和谐画卷:有男女之和,有代际之和,甚至还能看到贵族与平民之和。这种大规模的群体劳动场面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不同而和”的和合画卷:每一个人,

包括老人与孩子、男子与妇女,都有自己不同的位置,但人与人之间又是融洽和谐的。阅读这些诗篇,我们是否更容易体悟男耕女织对于家庭和睦的重要意义,领悟分工协作与和合文化“和而不同”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分工协作滋育和合文化的意义方面,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出的论据,五行和合思想的形成很可能直接与远古的劳动分工有关。有学者认为,五行其实就是远古最基本的五种分工,包括治水、管火、伐木、冶金、耕作(土)^[31]。《左传·昭公十七年》谓之“五工”,具体指木工、陶工、金工、皮工和染工五种工作(分工)。而且,“行”原本也有“工种”之义,今天我们的用语里还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因此,上述五种工作自然可以称为“五行”。与此相应,政府机构里也设有“五工正”,也就是管理五行的“五行之官,是谓五官”^[32]。“五行”和“五官”便是民间和政府五种不同的分工。在五种工作之间,都需要构建起既独立工作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也就是五行相克相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和而不同”思想在本源论层面的另类表述。

文化无外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总体呈现。无论在《诗经》描绘的群体劳动场面,抑或是《左传》的“五工”关系中,我们都能看到和合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人们在劳动中的分工或“五行”,这些是“不同”;在家庭或社会中的紧密协作,这是“和”,也是“合”。分工协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建立其上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是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而和合文化一旦形成,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它教化人们树立和合理念,培育和合思维,规约过度竞争,从而维护群体劳动的分工协作关系,保障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替代了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为主的自然分工,也随之转化为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更为发达,相互间的协作更加紧密,已成为“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遍布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33]。从理论上讲,它为完善的和合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分工使各个生产者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生产不同的商品,或从事不同的生产环节,这些属于“不同”;另一方面,各个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又是互补的,A商品是生产B商品的原材料,或者从事不同环节的多个生产者组合起来才能完成

一个完整的商品,这又属于“合”。以上两方面构成了“不同而和”的关系,是统一市场中的差异化共生,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典型的和合关系。可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即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加发达和密切。这是今天和合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基础,也是和合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根本依据。

然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了人们的劳动,也异化了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不再是和谐的劳动关系,而是资本最大程度剥削剩余价值、追求最大利润的对抗竞争关系。资本对利润的贪欲,最终把因资源有限性带来的竞争推上了高峰,和合文化因而被淹没在过度的竞争文化之中。其结果是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阶级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相反,远在市场经济成熟之前,中华和合文化便已成熟。今天,我们探究和合文化的起源,不单是为了建设和发展和合文化,而且希望人们正视和合文化在财富创造和人类社会中的重大作用,认清和合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共同基础,更好地推进和合文化的对外传播,以此制衡过度发展的竞争文化,使竞争与合作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相克相生、相辅相成。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 语

和合文化的起源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从多角度进行探究。从其思想源头看,河图、洛书蕴含了“阴阳和合”“五行和合”思想,它远比徐鸿武、谢建平所说的源于“三祖”文化更早;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看,和合文化是群体劳动过程中分工与协作关系发展的产物,它反过来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劳动的协作关系,保障生产力的稳定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使新的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又使相应的社会协作愈加密切,这为我们弘扬和传播和合文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契机。超越零和博弈的竞争文化需要和合文化;扭转逆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和合文化。

参考文献:

[1]叶万松,徐圣选.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和合”文化源头考

略[C]//秋爽,姚炎祥.第七届寒山寺文化论坛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456-466.

[2]杨建敏.从炎黄时代探寻和合文化的源[C]//秋爽,姚炎祥.第八届寒山寺文化论坛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692-698.

[3]李孟存,李引丝.唐尧是和合文化的源头[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70.

[4]郭胜强.和合文化之探源:兼论殷商时代对和谐社会的构建[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17(2):86-89.

[5]徐鸿武,谢建平.和合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64.

[6]陈桐生.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陈晓芬,徐儒宗.论语·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8]王世舜,王翠叶.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胡平生,张萌.礼记: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

[10]杨供法.先秦和合文化思想体系论析[J].台州学院学报,2020,42(5):27-32.

[11]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等.吕氏春秋[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2.

[12]司马迁.史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94.

[13]彭华.阴阳五行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280-3281.

[15]刘节.古史考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5.

[16]鹿朴.公孙龙子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79:90.

[17]孙永清.说文解字[Z].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2414.

[18]杨天才,张善文.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汤漳平,王朝华.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165.

[20]姚春鹏.黄帝内经: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60-62.

[21]朱熹.朱子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18.

[22]冯时.禹别九州与洪范九畴:二里头遗址九宫规划探析[J].中原文物,2024(1):79-86.

[23]萧吉.五行大义:卷一[M].钱杭,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22:5.

[24]刘宗迪.五行说考源[J].哲学研究,2004(4):35-41.

[25]江永.河洛精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

[27]方勇.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169.

[28]杨子范.山东宁阳县堡头遗址清理简报[J].文物,1959(10):61-64.

[29]王秀梅.诗经: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0]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8.

[31]李德永.五行探源[C]//包遵信.中国哲学: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70-90.

[32]郭丹,程小青,李彬源.左传:全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2046.

[33]张康之.分析社会及其治理的分工:协作体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5):68.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oot of Hehe Culture

Yang Gongfa¹, Yang Kewei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he Cultural,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Sheffield S1 4TY, the UK)

Abstract: Regarding the root of Hehe culture, scholars primarily examine it from the time of its emergence and its cultural matrix. The former is initially traced back to the era of Fuxi, and the latter is oriented to the Dragon Totem culture, the "Three Ancestors" culture, and the Mount Tiantai culture. However, both positionings of Hehe cultural source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Exploring the root of Hehe culture should be based on two aspects: the origin of Hehe thoughts, and the social root that gave rise to Hehe culture.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ehe thoughts, Hehe culture initially comes from the He Tu and Luo Shu diagrams containing the harmonious concept related to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Regarding its social root, Hehe cul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in collective work.

Keywords: Hehe thoughts; root; He Tu; Luo Shu; division of labour; collaboration

(上接第11页)

Miscellanies from the Shu Garden and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t

Yao Dengche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Miscellanies from the Shu Garden* are various, ranging from national political affairs, regulations and institutions, celebrity anecdotes, to odd stories and dialects.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recorded, including medicine, natural phenomena, animals and plants, agriculture, handicrafts and other aspects. These contents demonstrate the wisdom and skills of the ancient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provide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oday's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pas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 Lu Rong; historical source; *Miscellanies from the Shu Garden*

论文化组学视角下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

周芬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寒山诗歌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式,其中蕴含的和合思想是构建当今和谐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实践的精神动力。基于文化组学视角,运用语料库词语搭配研究方法,深入文本语境,挖掘文本话语信息,可以探索寒山文化在域外的当下影响力,探究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的更有效途径,以此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影响力。

关键词:寒山文化;域外传播;文化组学;语料库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6

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特征,优化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功效。

一、引言

寒山是我国中唐时期的隐逸诗人,其撰写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未被充分重视,却在众多海外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经典范式。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区,寒山诗的各种译注本和评论文章层出不穷,寒山诗的翻译与相关研究备受关注,寒山文化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形成了独特的寒山文化现象。寒山文化主要包括寒山诗歌、寒山生平、寒山和拾得的事迹,以及以寒山为主的诗歌里蕴含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和合思想等内容。已有的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研究大多是以文献梳理为主的综述研究,缺少基于数据处理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探讨20世纪的传播情况,对21世纪寒山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认知较模糊。随着大数据的文本处理技术日趋成熟,基于一手数据探索寒山文化域外传播实践,通过挖掘批量文本信息梳理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话语模式,开始具有可行性。作为中国和合文化的象征,寒山文化是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源泉。本文拟结合当代网络信息媒介特点,探讨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现状,深入分析

二、“文化组学”视角

2011年,自然科学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基于数以百万计数字化图书的文化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一文。该文影响巨大,促使了人文科学范式向“数字人文学”转型,Michel等在文章中介绍了文化组学的概念和方法^[1]。文化组学(culturomics)是“文化(culture)”和“基因组学(genomics)”组成的合并词。正如DNA基因序列能够透露生命信息一样,大规模的词语数据也能揭示人类文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文化组学的研究视角就是将人或物的影响力类同于它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数,如此一来,影响力可以通过词频统计加以测量。

在国外,文化组学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早期的文化组学研究多注重概念厘清和具体的案例分析,如Michel等开发了“谷歌图书词频查看器”(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通过将“谷歌图书语料库”(16世

收稿日期:2024-06-05

基金项目: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台州文化关键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研究”(22YA06)

作者简介:周芬(1981—),女,湖北沙市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语料库话语分析。

纪至今)的词频变化以曲线图形式进行呈现,他们依次开展了英语词汇总量预测、语法演变趋势、人的名气测算等相关研究^[1]。之后,文化组学在语言演变、文化研究、情感分析和未来预测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文化组学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包括中国城市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历时国际知名度研究^[2-3],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的文化影响力研究^[4]和浙江文化关键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研究^[5]等。

文化组学研究对人文社科研究已产生革命性影响,但也不乏质疑之声。Schwartz认为谷歌图书虽经过Michel研究团队认真筛选,在内容重要性上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毕竟只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研究结论难免以偏概全;此外,谷歌图书不像期刊和报纸具有较高时效性,在反映当下文化趋向上相对滞后^[6]。数字人文研究中还容易出现重数字、轻人文倾向。文化组学中的文化研究主要考察文化关键词使用频率的波动情况,这种脱离文本语境,单纯基于频率统计的研究方法较难从文本中发掘更多的文化信息,有一定的局限性。最近几年,学界产生了一些完善文化组学的相关研究,如“基于知识的文化组学”(knowledge-based culturomics)^[7]、“语义文化组学”(semantic culturomics)^[8]等,这些研究试图对大数据进行语义挖掘,改善原本文化组学研究中单纯基于频率统计的研究模式。

本文基于文化组学视角,借助语料库词语搭配相关研究方法^[9-11]来研究寒山文化的域外影响力,除了考察文化关键词“寒山”在域外的频数波动情况外,还依据检索词“寒山”的高频搭配词,深入文本语境,挖掘文本话语信息,梳理寒山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特征以及影响力情况。

三、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情况

寒山文化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广为流传。通过梳理以往相关研究,本文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聚焦探讨寒山文化在当今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传播情况。

(一)传播现状

本文基于Web Corp网络语料库语料来考察寒山文化域外当下影响力,原因有二:其一,作为Web语料库的代表之一,Web Corp语料库以海量

网络文本为资源基础,其实时动态、数字化特征,更能反映寒山文化在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时代的传播特征;其二,Web Corp有针对网络文本语料设计开发的检索和量化统计界面,且可以通过设定域名范围搜索不同地区语料资源,有利于研究语言的区域特征。

我们以“Han-shan”^①“寒山”为检索词,分别检索该词在Web Corp网络语料库中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不同国家区域里的分布情况^②。表1为检索词“寒山”出现在上述各国网址(URL)和检索行(concordances)的频数信息(已除去和检索词同音的少量噪音网址和对应的检索行)。

表1 “寒山”在域外国家中的网址和检索行频数

国家	网址	检索行
日本	13	356
美国	13	231
英国	11	218
法国	10	57
德国	7	62

表1数据显示,检索词“寒山”在日、美、英三国网址中检索行的频数较多,法国和德国相对较少。寒山诗自北宋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寒山诗伴随禅宗一起,经由日本传到美国,立即在美国掀起了“寒山热”。进入21世纪,寒山文化依然在日本和美国持续保持较高的影响力。本文大致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历时呈现“寒山”在各个国家网址里检索行频数的具体波动情况,见表2。

表2 不同时间段“寒山”在域外国家中的网址检索行频数

国家	1996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未知年份	总计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2023		
日本	10	—	—	11	—	111	224	356
美国	8	—	16	122	—	69	16	231
英国	—	—	7	122	—	69	20	218
法国	—	—	5	7	—	30	15	57
德国	—	—	3	8	—	48	3	62
总计	18	—	31	270	—	327	278	924

① 寒山的常见英语译名有“Han-shan”“Hanshan”等。经检索,“Han-shan”在Web Corp语料库中最为高频,除美国和英国外,法国和德国区域语料中,也普遍采纳“Han-shan”这种译法。为便于比较寒山相关文化在各国的传播情况,本文统一采用“Han-shan”这种译法。

② Web Corp网络语料库为实时动态语料库,本文数据收集截至2023年4月23日。

表2中,除去日期不明检索行外,检索词“寒山”在各国的历时频数分布较多地聚集在2005—2009年、2010—2014年和2020—2023年这三个时间段,呈现出聚集特征。从频数波动情况来看,在21世纪里,寒山文化在各国历时关注度并非均衡分布,而是呈间隔性起伏趋势。2020—2023年,寒山频数分布最多,这一时期频数上升可能和近些年中国大力推广文化“走出去”战略举措有一定关系。近年来,随着和合文化全球论坛的成功举办,寒山文化作为和合文化的价值主体,在域外相关媒介中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

(二)传播形式

在Web Corp网站中,输入检索词后,设定语料区域来源,也就是主界面的Language中Market选项,可以返回检索词出现的网页URL地址、网页更新日期以及以KWIC格式提供的“语境共现”检索行信息。网页作为网络媒体传播的重要载体,具备传递信息和与用户交流等多重功能。本文通过对检索词“寒山”出现在各国网页URL地址情况进行梳理,按照“寒山”在域外的传播网址媒介种类进行分类,大致可把这些网址分为四类:百科知识和词典类、语言翻译和文化类、图书出版和销售类、禅宗精神和心灵类,见表3。

表3 “寒山”在域外的传播网址分类及频数

国家	百科知识和词典类	语言翻译和文化类	图书出版和销售类	禅宗精神和心灵类	总计
日本	8	4	1	—	13
美国	3	2	3	5	13
英国	3	2	1	5	11
法国	2	5	2	1	10
德国	3	2	1	1	7
总计	19	15	8	12	54

检索词“寒山”的域外网址分类频数中,百科知识和词典类频数最多。其中,百科知识网址为维基百科,如<https://ja.wikipedia.org/wiki/寒山>; <https://en.wikiquote.org/wiki/Hanshan>等。维基百科是用多种语言编写而成的网络百科全书,是全球网络上最大且最受欢迎的参考工具书,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浏览用户。检索词“寒山”在日本网址中还出现了在线词典类网址,如<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寒山拾得/>; <https://kotobank.jp/word/寒山-469915>等。第二类语言翻译和文化类主要涉及寒山诗歌翻译,寒山文学作品等内容,如

<https://bunka.nii.ac.jp/heritages/detail/383037>等。第三类图书出版和销售类主要涉及一些出版社和亚马逊网址链接,如<https://sunypress.edu/Books/T/The-Poetry-of-Han-shan>等。第四类禅宗精神和心灵类在美英两国频数较多,如<https://www.hermitary.com/articles/han-shan.html>等。表3中的分类信息初步呈现出寒山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内容趋向,而探索寒山文化在域外具体传播内容特征,需要深入索引行语境。从检索词“寒山”的高频搭配词入手,梳理寒山在域外的典型话语内容,以此阐述寒山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特征以及影响力情况。

(三)传播内容

使用Web Corp主界面上的搜索后处理选项(post search option)、设定高频搭配词左右跨距(position)为4、常见词(stopwords)排除等选项后,可以检索到“寒山”的高频搭配词。表4为日本地域中检索词“寒山”排行前十的高频搭配词表。

表4 日本地域中“寒山”排行前十的高频搭配词表

搭配词	频数
拾得	66
寒山拾得	33
拾得図	27
寒山拾得図	26
寒山	26
中国	24
編集	23
詩	22
の意味	19
広島県	19

采用语料库词语搭配相关研究方法,可以从点(检索词)到线(检索行)再到面(网页),逐层推进概括检索词所在语境的话语特征。表4中“寒山”的高频搭配词可按语义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搭配词为“拾得”“寒山拾得”。依据搭配词的线面语境,此类搭配词语境话语信息主要是以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画作信息介绍,如森鸥外的历史题材小说《寒山拾得缘起》、横尾忠则的以寒山拾得为题材的画作展等。另外,“诗人寒山”“拾得”“寒山拾得”被收录进词条百科,“寒山拾得”甚至作为四字熟语进入线上词典。第二类搭配词为“拾得図”“寒山拾得図”。搭配词语境话语信息主要涉及不同版本的寒山拾得图介绍,从“国宝”“重要文化遗产”“枯淡”“洒脱”等评价词汇和短语可以看

出,寒山拾得图在日本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第三类搭配词为“寒山”“中国”“編集”“詩”和“の意味”。此类搭配词语境信息主要介绍寒山诗各种译注版本,尤以岩波书店的寒山诗集版本介绍居多。

美国地域中检索词“寒山”频数排行前十的搭配词依次为:Mountain(30)、Cold(26)、Poems(24)、poems(17)、Translated(17)、T'ang(12)、Poetry(12)、Poet(11)、Zen(10)、poem(10)^①。基于检索词“寒山”的搭配词语境信息,“寒山”在美国网页中的话语信息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寒山诗的各种英译版本信息,提及较多的版本有两个:*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 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前面版本的诗集主要由1958年日本岩波书店刊印的入矢义高注本里的126首诗歌编译而成,该译本让更多的美国读者了解到寒山及其诗歌,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面版本的诗集是继赤松推出寒山诗全译本*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后的第二个全译本,其引论与注释详尽丰富,深受专业读者好评,在寒山诗翻译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12]3}。第二类侧重强调寒山以及寒山诗的禅宗特征,含有搭配词Zen的短语序列有“the T'ang Zen Poet”“transcendental poetry by the T'ang Zen Poet”“the creation of the Zen tradition”“a cult figure in the ch'an/Zen tradition”“the most famous Chan(Zen) eccentrics”等。

英国地域中检索词“寒山”排行前十的高频搭配词与美国地域基本一致,如:Mountain(33)、Cold(29)、Poems(23)、poems(17)、Translated(16)、T'ang(10)、Zen(10)、poem(10)、Poetry(9)、Poet(9)等。检索词“寒山”的搭配词语境话语信息也可分成寒山诗的英译信息介绍、寒山以及寒山诗禅宗特征介绍两类。其中,含有搭配词Zen的短语序列表达有“Transcendental Poetry by the T'ang Zen poet”“Han-shan is referred to as a Zen poet”“the most famous Ch'an(Zen) eccentrics”“the Zen aspects of Han-shan”等。

法国地域中检索词“寒山”排行前列高频搭配词可按照语境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寒山拾得和寒山诗介绍,相关搭配词如Shide(8)、poète(4)等。还有一类主要侧重寒山作为隐士诗人的介绍,这类搭配词如mont(5)、ermite(5)、froide(4)等。检索词搭配词序列表达如“Disciple du zen, il devi-

ent ermite sur le mont Han-shan”“ermite sur le mont Han-shan(Montagne froide)”等。依据搭配词语境,德国地域中检索词“寒山”排行前列的高频搭配词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介绍寒山拾得,如Shide(8)、Autor(8)等。另一类主要是对寒山诗歌的介绍,如poem(7)、T'ang(6)、Gedichte(5)等。

四、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特征

从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来看,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既有地域特性,也有共性特征。在日本,寒山文化涉及寒山形象、寒山思想以及寒山诗等范畴。寒山文化在艺术、文学以及生活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寒山及其同伴拾得的形象深受日本美术界喜爱,历代画家以寒山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寒山文化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十分深刻,许多日本著名作家借鉴寒山思想进行艺术构思,以寒山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寒山成为近现代日本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之一。与学术界相仿,日本民间对于寒山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寒山”命名的各种面馆、饭店以及物品层出不穷。寒山和寒山拾得以词条的形式,成为一种渗透于日本各个领域的文化符号。

寒山文化深刻影响日本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契合了日本的文化审美^[13]。寒山诗歌里描绘山林幽居、回归自然的作品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和“山林情结”相契合。无常是贯穿整个寒山诗的思想与境界,日本人对无常有一种正面的体验和赞美。在日本的审美意识中,寒山诗所体现的无常的境界是一种凋灭、残破的美。寒山诗所表现出的幽玄的禅宗境界、不入世浊的隐者情怀与日本的禅宗美学相契合。寒山诗因其禅宗精神对日本“空寂”审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空寂”审美的确立又反过来促成了日本对于寒山诗及寒山文化的长期接受与认同。

寒山文化在美国的影响主要涉及寒山诗的英译。英译寒山诗在美国广泛流传,成为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翻译功能学派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认为文学异域传播的行为要素可分为“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两大类。“文内因素”包括文本主题内容、语言表达方式等;“文外因素”主要指文本所处的交际语境,其中包括文本交

① 括号里的数字为搭配词的频数信息。

际场所,即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文外因素”对文学的异域生命起决定性作用。寒山诗在美国经典地位的确立受到文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12]1-7}。在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文化需求的文外因素推动下,蕴含宗教哲思和独特风骨的寒山诗广受美国读者青睐。

在反主流文化运动影响下,禅佛教(Zen Buddhism)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受到热捧。“垮掉的一代”拒斥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密不可分的旧式宗教规约,向东方寻求精神上的灵感。寒山怡然自得与禅癫行径中隐藏着的智慧,适时地满足了当时“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需要。英译寒山诗中蕴含的禅佛思想成为当时美国青年逃避高度工业化引发的压抑与异化的精神寄托。英译寒山诗的精神内涵与译入语社会文化需求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寒山诗在美国的文学地位,扩大了寒山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

在20世纪的欧洲大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学者和翻译家对寒山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寒山诗的翻译与研究一时成了欧洲汉学的“宠儿”。直至21世纪,寒山及其诗歌依然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寒山以及寒山诗歌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垮掉派”运动、世界性禅学研究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寒山其人和诗作所体现的自我独立意识和独绝追求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的颠覆和超越的精神相契合,这促成了寒山及其诗歌在法国甚至欧洲国家的广泛传布与接受^[14]。

寒山文化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传播有着共性特征,不同地域都自觉表现出对寒山文化中“和谐”“融合”的和合思想精髓的接受。寒山诗歌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哲理的“禅宗”,体现出一种对身心和合的精神自由追求,这为欧美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中人的精神自由探索提供了一种来自东方古老优秀文明的解答。寒山文化所承载的返朴归真、安闲淡泊的天人和合境界不仅是引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指路灯,对域外读者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五、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启示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遭遇严峻挑战,世界呼唤和平,发展需要合作。寒山文化中蕴含的和合理念是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的思想共识,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能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

的一系列复杂挑战融入中国智慧。

(一)深入挖掘寒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基于共核思想进行地域差异化传播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一。作为和合文化的代表人物寒山,其诗歌和生平蕴含的和合文化思想独具特色。寒山文化中蕴含了“人伦和合”“天人和合”“自我和合”三个维度的和合思想内涵^[15]。慈孝包容的人伦和合内涵具有社会和人伦价值,契合人们对团圆、和合的希冀;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合内涵传承了环境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启示;返本归真的人与自我和合内涵映照出当代物质文明给人们造成的迷惘,寒山超脱物累的精神气度可以缓解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可以持久影响世界的力量,寒山文化中“人伦和合”“天人和合”“自我和合”交织而成的和合思想内涵既是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密码,也能为世界的其他文化所借鉴,对传递世界和平之声、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

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需要基于寒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涵进行地域差异化传播。依据不同地区国家寒山文化需求特征,发掘整理寒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涵与目标输入国家文化相契合的内容和形式,以此更加有的放矢地对外传播。例如,对欧美国家,可以着重挖掘寒山和合文化思想中“自我和合”维度的内容,与此同时,辅以挖掘“人伦和合”“天人和合”中与人相处、与自然相处的独特思考模式,从而既有重点,又较全面地对外传播寒山文化。

(二)推动新旧媒体有机融合,拓宽寒山文化域外传播路径和覆盖范围

寒山文化需要新旧媒体合力进行域外传播。首先,继续发挥传统媒体,如报纸、书籍、杂志等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传播优势,完善寒山文化域外传播内容。基于寒山在域外的传播网址媒介分类,可从寒山诗歌、寒山拾得形象的画作、寒山相关的民间习俗等多重视角进一步丰富寒山和合文化的传播内容。可在*China Daily*开设专区定期宣扬寒山文化,运用国外受众听得懂、易产生情感共鸣的语言方式进行文化信息传播;也可拍摄寒山文化题材的纪录片,在央视英文频道中设立寒山诗歌作品的赏析栏目、投放寒山文化形象的英文宣传广告等。

其次,充分运用新媒体进行寒山文化域外传播,拓宽寒山文化域外传播的辐射路径和范围。当今世界,新媒体已成为海外受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新媒体技术能以新的视觉表现、交互形态和沟通方式带来立体、嵌入和直观的文化体验。民众使用新媒体进行异国文化认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也需要适应这种新变化。“央视新闻”可通过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以多种方式宣传寒山文化,制作微视频报道,联动新浪微博等商业平台扩大报道覆盖的范围。与此同时,着力挖掘海外新媒体传播平台如 Youtube、Vimeo、Hulu、Netflix 等知名视频网站,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知名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16]。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培育和引领民间传播力量,制作一批具有良好传播影响力的寒山文化精品,并在海外新媒体传播平台上推广,立体化、多角度地对外传播寒山文化,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力。

最后,寒山文化已经在亚洲、美洲和欧洲部分国家得到深入传播,接下来可以拓宽寒山文化域外传播覆盖范围。可在“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建立多语种寒山文化驿站,以寒山文化为依托,加强中华现代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断扩大中国“朋友圈”。

(三)普及寒山文化思想,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寒山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这些精神财富需要在国内普及,以此作为向域外传播的大众基础。根据现代社会特点,可发掘整理寒山文化中和合思想的民族性、礼仪性、时代性特征,深入研究国内不同群体对和合思想的需求。例如,老年人注重家人团聚、渴望享受亲情,中年人则注重内心平和,青少年则追求民俗节日的娱乐。基于不同需求,运用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挖掘寒山文化的不同传播形式,使不同群体都能深入感知寒山文化,从中获得情感的释放、心灵的升华。

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需要多元文化交流主体参与其中。政府应在寒山文化的域外传播方面提供顶层设计的支持,其方针政策就是一种最为实际的传播^[17]。统筹研究机构、新闻机构和大学,做强寒山和合文化研究院,打造寒山和合文化的学术高地、重要智库,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传播队伍,并建立广泛的人力传播资源。挖掘民间海外华人群体或社团的传播潜力,使寒山文化域外

传播渗入海外社区^①。在当今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的大量出现,普通民众也应承担起海外传播的重任。多元传播主体能将寒山文化这块瑰宝呈现给全世界,助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实践。

参考文献:

- [1] MICHEL J-B, SHEN Y K, AIDEN A P, et 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ulture using millions of digitized books [J]. Science, 2011, 331(6014): 176-182.
- [2] 陈云松, 孙艳, 严飞. 大数据中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500 年国际知名度分析 [J]. 学术论坛, 2015, 38(12): 92-98.
- [3] 陈云松, 吴青焘, 张翼. 近三百年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 基于大数据的描述与回归 [J]. 社会, 2015, 35(5): 60-77.
- [4] 龚为纲, 罗教讲. 大数据视野下的 19 世纪“海上丝绸”: 以丝绸、瓷器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心 [J]. 学术论坛, 2015, 38(12): 82-91.
- [5] 邵斌. 浙江文化关键词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研究: 基于文化组学的视角 [J]. 浙江学刊, 2017(2): 201-207.
- [6] SCHWARTZ T. Culturomics: periodicals gauge culture's pulse [J]. Science, 2011, 332(6025): 35-36.
- [7] TAHMASEBI N, BORIN L, CAPANNINI G, et al. Visions and open challenges for a knowledge-based culturomic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gital Libraries, 2015, 15(2): 169-187.
- [8] SUCHANEK F M, PREDA N. Semantic culturomics [J]. Proceedings of the VLDB Endowment, 2014, 7(12): 1215-1218.
- [9] BAKER P, MCENERY T. Corpora and discourse studies: integrating discourse and corpora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10] BAKER P, EGBERT J. Triangulating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 corpus linguistic research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1] 许家金, 李潇辰. 基于 BNC 语料库的男性女性家庭角色话语建构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7(1): 10-17.
- [12] 辛红娟, 蒋梦缘. 寒山诗英译在美国的经典化过程剖析 [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1, 34(2).
- [13] 区铨, 胡安江. 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 29(3): 150-158.
- [14] 蒋向艳. 寒山诗在法国的传播及其意义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3(4): 15-20.
- [15] 何晓嘉, 袁春艳, 钱燕军. 寒山诗中的和合文化元素解析及当代启示 [J]. 大众文艺, 2022(23): 14-16.
- [16] 肖荣春. 新媒体和民间传播助力海外“中国文化故事”讲述 [J]. 东南传播, 2019(4): 60-61.
- [17] 徐海艳. 和合文化的传承与外宣: 基于寒山的域外影响研究 [J]. 鄂州大学学报, 2020, 27(2): 14-17. (下转第 61 页)

① 许志惠:《传承和合文化,促进中外交流:关于苏州寒山寺和合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专题报告》,第九届寒山寺文化论坛会议论文,苏州,2015,第 496-501 页。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对中国译学创新的启示

胡作友, 陈晓敏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西方翻译理论经历了从经验到科学再到系统的过程,形成了体系化发展的局面,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遵循继承、批判、创新的发展模式,其独特性在于紧密的内在关系和清晰的逻辑联系,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走的是一条从译介到借鉴再到新创的道路,虽然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理论研究效果不尽如人意。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动力不足、基础不牢和创新不足的缺陷,才能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建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西方翻译理论;理论体系;科研创新;中国特色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7

一、引言

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Cicero)首次把翻译划分为创造性和非创造性两种。自西塞罗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字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等问题进行研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1]。西方翻译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化发展的局面,走向了成熟。潘文国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经历了从零碎的经验性翻译理论到科学的语言性翻译理论再到成熟系统的现代化翻译理论,它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整个过程由浅入深,合理科学^[2]³⁴。其中,第二阶段,即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和特性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翻译研究视野开阔,西方学者已经摆脱

语言学的影响,从世界和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而中国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重点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及其理论探讨,一般围绕西方理论的缺陷进行探讨。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翻译界出现了“言必称奈达”的现象;随着我国学者更多地了解西方翻译理论,学界又出现了“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3]¹⁰⁸。这些暴露了我们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和对西方译论的依赖性,很多学者忙于在西方理论中找漏洞和缺点,有些甚至是强行找错,却忽略了对原创性理论的研究、设计与构思。方梦之回忆,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就对翻译本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开启跨学科研究,已经接近国际学术前沿^[4]。即便如此,我国有些学者仍然热衷于“炒冷饭”,过度依赖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慢慢养成了狭窄的研究视角,缺乏创新和突破。胡庚申认为,我国学者将眼光局限于西方理论,以至于我们的新兴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不能够经历质疑和论辩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很少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5]。中

收稿日期:2024-06-12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心雕龙》话语体系英译和中西文论对话研究”(17BY061);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英语融合研究”(SK2020A0798)

作者简介:胡作友(1969—),男,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与西方文论;陈晓敏(2000—),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与西方文论。

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翻译理论的适用性也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必纠结于在西方翻译理论里寻找不同点,而应吸取西方理论的精华,通过创造性转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当然,停止在西方理论中迷失自我,并不代表其中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西方学者的学术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逻辑与特色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只有借鉴先进经验,结合国际学术研究背景,立足于我国国情与翻译理论建设,才能更好地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国翻译理论与文化走向世界^[6]。以翻译伦理为例,西方翻译伦理研究呈体系化发展,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纷繁多样的理论体系,体系之间相互影响。西方翻译理论家不拘泥于传统观点,拓展思路、积极创新,通过对理论的融合、继承、创新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继承性、批判性与创新性,表1列举了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及其参考来源。

(一)继承性

西方翻译理论百花齐放,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形成了多个学派,学派之间没有门户之见,而是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潘文国对当代西方翻译流派进

行了划分。较早出现的是以埃文-佐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随后图里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形成自己的“描写”或“常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与“描写”或“常规”学派有着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考虑到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以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就此产生;以德国的斯奈尔-杭贝为代表的“综合”学派的出现与先前的翻译研究学派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但又有着自己独特鲜明的观点;之后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以巴特斯、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和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相继出现^{[2]35-37[7]18-20}。翻译研究学派之间的借鉴继承使得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逐渐变得清晰与丰满,学派和理论继承增强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内在拓展性。

西方翻译理论中每一理论的形成都与前期理论基础铺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就继承了20世纪初以来哲学上的语言转向,后经德里达、巴特斯、福柯等人的继承发展逐步完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也是如此,它由凯瑟琳娜·赖斯的文本类型和语言功能理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汉斯·威密尔的功能目的论、克里斯蒂安·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共同构成:文本类型和语言功能理论以对等理论为基础,翻译行为理论以交际理论与行为理论为基础;功能目的论以威尔斯和科勒的翻译理论为基

表1 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及其参考来源

翻译理论名称	代表人物	参考来源
翻译三分法	R. Jakobson	J. Dryden, J. W. Goethe
等值转换理论	J. C. Catford	M. A. K. Halliday
功能对等理论	E. A. Nida	L. Mording, H. Clayn
异化翻译	L. Venuti	A. Berman, J. Derrida, F. Schleiermacher
交际翻译理论	P. Newmark	K. Buhler, R. Jakobson
关联理论	E. A. Gutt	D. Sperber, D. Wilson
功能目的论	R. Vermeer	W. Wilss, W. Koller
解构主义	J. Derrida	W. Benjamin
后殖民主义	E. W. Said, G. C. Spivak, H. K. Bhabha	M. Foucault, J. Derrida
多元系统理论	Itamer Even-Zohar	Y. Tynjanov, T. Parsons
操纵理论	A. Lefevere	Even-Zohar
改写理论	A. Lefevere	Even-Zohar, G. Toury, S. Bassnett

础;功能加忠诚理论以文本类型学为基础。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涵盖翻译的所有类型,这些理论逐步继承发展前人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翻译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8]。

(二)批判性

理论的力量来自理论的批判性,理论必须经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才能证明其阐释力。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帮助人们理解理论框架、理论内核、理论目的与理论运用,在运用中使理论得到证伪、证明与检验。在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批判主体会采取各种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与其他批判主体进行学术上的争鸣与交锋,驱使理论走向成熟与完善。

功能翻译学派赖斯的理论在提出后曾饱受批评,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与威密尔的功能目的论也受到诺德的反对。其后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理论,批判性继承前者理论的优点,将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全面介绍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丰富了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内涵,促进了功能翻译学派的形成。可见,批判性对理论的成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创新性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要素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西方翻译理论,翻译理论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的核心是理论基础。如果没有理论基础作为支撑,那么理论就会成为空洞的说教,失去批判的力量,理论研究也将后继无力。

描写学派的代表人物图里发展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创新引进规范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斯皮瓦克受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思想;尼兰贾娜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出翻译与语言中权力关系的联系^{[7]19-20};后殖民主义者不是放弃了原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而是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将翻译研究与政治研究联系起来。

因此,西方学者在继承、批判、创新的研究模式下不仅继承了原有的翻译理论,还敢于反思原有理论存在的问题,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研究方向。无论是同一理论上的影响和继承,还是不同理论之间潜移默化的联系(如表1中操纵理论和改写理论都借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内容进行创新),西方学者总是致力于在现有的理论体系里开创出

新的研究方向和道路。我们的理论创新最忌在相同的问题上反复探讨,以至于人云亦云,找不到真正的理论新路。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因循守旧的多,大胆创新的少。因此,我们要看到自己理论研究的不足,要善于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经验,这对于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创新尤为重要。

三、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一)整体现状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绽放异彩的同时,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鲁迅的“直译论”,从傅雷的“神似说”到钱锺书的“化境”,再到当代以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和周领顺的译者行为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翻译理论等,中国译学界从译介外国翻译理论到借鉴外国翻译理论再到新创翻译理论,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前进。

生态翻译学是当代中国翻译理论最热点的话题之一,它既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又有与西方翻译理论的交融^[9]。生态翻译学的伦理观彰显了译者应承担翻译的生态责任和伦理责任。在生态翻译学的视野,翻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视角。译者行为理论既可以用作评价理论,也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不过周领顺明确指出译者行为理论的很多研究方向都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核心概念^[10-11]。

从翻译伦理的角度看,翻译伦理研究一直是中国译学界的热点话题和重要内容。中国翻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重复研究、深度不够、先入为主、理论与实践脱节等,相较于西方翻译伦理研究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12]。从一斑窥全貌,中国其他翻译理论研究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朝着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目标前进,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仍然任重道远。

(二)存在问题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虽可圈可点,但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剖析其问题所在,否则跟着西方学术界的道路亦步亦趋,那就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成

就喜人,但并不是每位学者都对学术真正具有创新意识与执着追求,只有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改善了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译学创新的进步,使其上升到新的高度。我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相较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模式来说,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1. 研究目的。所有行为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导向,有些学者对翻译理论研究的目的不纯,以至于带来了不良后果。个别理论研究人员没有坚定的学术价值观,容易掉入功利化陷阱,导致理论研究动力不足,甚至于丧失学术理想和道德操守,自然研究不出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当然这些学者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大多数学者在刚踏入学术门槛时都抱有学术信仰和梦想,但是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可能遇到了各种困难,于是产生了学术懈怠或畏难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严重挫伤了其研究积极性。有些组织和机构开始商业化运作,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学术研究逐渐出现利益抱团现象,学术研究的参与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至于真正有研究价值的研究成果很难有出头之日。因此,个别最初怀有抱负的理论研究者慢慢蜕变、变质,乃至误入歧途,面对利益诱惑弄虚作假,导致学术腐败的现象发生。目的决定方法和策略,作为一名翻译理论研究者,要想真正作出有价值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就要坚守方向,摆正翻译目的,拒绝功利化,维护研究初心。

2. 研究方法。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论文投给各个期刊。一些核心期刊的论文出版需要很长时间。这一方面说明论文数量多,论文发表难;另一方面不禁让人反思:数量上去了,质量是否也跟上去了呢?在数量众多的论文背后,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有多少呢?有创新性的翻译理论又有多少呢?这是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虽然学界取得了不少创新性研究成果,但低水平内容和研究问题总是反复出现,学术含金量低的成果还有不少,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还需要在创新之路上奋力追赶。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重视传承与创新,中国有些学者喜欢抓住一个问题“炒冷饭”,而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突破口;即使找到了理论漏洞也没有用上新的方式方法,没有脚踏实地去突破和创新,结果很难再向前一步。

3. 研究态度。要做好理论研究,需要有端正的态度。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需要端正的学术态度。有

些学者总是在老生常谈的话题上耗费时间,对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却视而不见,或在理论不了解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马。理论理解不透彻直接导致研究结果不明确甚至研究失败,最后为了学术产出只能继续老生常谈。理论素养是研究者的基本功,学术规范是研究者的生命线。有些学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疏于创新,直接照搬别人成果或者利用二手文献,这样的态度非常容易犯下学术不端的错误。研究理论,应该掌握第一手资料,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理论研究的消极态度致使研究不严谨、学术态度不端正、理论理解不透彻、研究成果质量差。

有些理论研究者研究目的、方法和态度上出现了问题,导致学术研究效能降低,其产出自然不会推动中国译学的创新发展。从翻译理论创新研究发展上看,我国一些学者坚持做学术研究,他们在理论研究中力图寻找新的方法和出路,但光靠他们是远远不够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译学研究需要更多的学者不忘初心,锐意进取,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创造性研究,共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四、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对中国译学创新的借鉴意义

理论建设是我国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自成一脉,其理论价值毋庸置疑。但我们不能完全禁锢在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之内,继承和创新出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更为重要。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只是一个先行的例子,我们不用完全按照他们的路线走,而是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注重学习其理论创新模式,通过继承、批判、创新的整体发展模式来反思我们的不足。我们不仅要积极学习其理论知识,更要学习其研究经验,这样才能够推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更好地发展,促进新时代中国翻译理论建设^[13]。

(一) 学术环境改善

学术环境建设是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重要举措,这关系到学术系统的良性运作和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环境低劣会导致学术研究成果差,无效的学术研究只会浪费学术资源。因此,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建设和维护良好

学术氛围。“严惩+奖励+宣传”三要素的方式是维护学术环境的重要举措。

想要改善学术环境,就要坚决打击学术不端的行为。警告和劝诫都不如严惩的效果直接有效。在学术产出的过程中从研究论文的写作、评审到发表都需要建立监管和惩戒机制,通过沽名钓誉、弄虚作假获得荣誉的行为都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学术产出必须保证真正学术成果的展示,研究者需要对研究抱有严谨认真的态度,学术成果的评审必须保证客观公正,从研究成果的产出到公开展示都要通过公正严格的审核和监管,这样学术研究者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科研热情和动力,才能产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针对优秀的研究成果应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体系,并据此采取奖赏激励的机制,以此激发研究热情,推动深入研究,积累学术研究的内生动力。同时,我们也要重视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为学术界持续注入新的活力,使理论研究成为源头活水。除了奖励和严惩,学术环境也需要人为营造,因此要大力宣传正确的学术行为,抵制虚假的学术行为,抨击学术不端行为,净化学术环境,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学术氛围直接影响学术参与者的思考和行为,增加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增添中国学者对学术的敬畏心,这是理论研究得以发展的客观条件。

(二)科研价值观构建

翻译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是研究者,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是成果的直接来源,因此塑造研究者的价值观非常重要。许钧指出,在翻译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树立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形成正确的文化立场^[14]。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亟须构建一种创新、正直、真实和爱国的科研价值观,只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引导研究者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理论实现创新突破。

理论的学习与进步需要研究者不断创新,创造优质的翻译理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早就放弃老旧的话题,跳出舒适圈寻找新的角度;而我国译学界热衷于追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脚步,少有学者主动创新或转换思路来研究翻译理论。我们都习惯在现有热点话题上下功夫,翻译理论研究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语言和文学性层面上,这样的研究思路很难开辟出一个新的翻译理论研究路线^{[7]20}。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一直以其独特的研究模式进行,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原创性。因此,

要跳出西方翻译理论的桎梏,找到具有我们特色的翻译理论,就必须创新。正确的价值观指导研究者不弄虚作假,以严肃客观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如果学术研究者坚持以正直的尺度衡量自己,那么即使在学术环境不那么良好的情况下,也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坚持自己的学术态度,守住自己的研究底线。

许钧指出,只有将翻译活动置于历史语境,在语境中研究翻译,才能更好地揭示翻译的作用与本质^[15]。西方学者对西方翻译理论了解深刻,洞悉不同流派的来龙去脉,能够从不同视角对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和扩展;而急于求成的中国学者往往没有弄清楚理论的来源和实质就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如此科研心态自然欲速则不达。理论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表面,更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构建出科学的理论。

理论研究不是只靠哪一位学者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所有理论研究者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以国家利益和荣誉为首要动力。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可以互相质疑和论辩,也可以合作协商与探讨,致力实现个人梦想与家国理想的统一^[16]。我国研究者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加快翻译理论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潮流,建立起中国气派的译学理论,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而科研价值观构建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核心。

(三)教育重心转移

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想要实现突破,归根结底要关注翻译研究人才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根源入手,将教育重心转移到翻译理论教学,抓住解决问题的源头。

长期以来我国深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理论研究往往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和辩题。我国高校大都使用西方翻译理论作为授课内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往往以西方理论为学术入门,对于翻译理论研究完全固定在西方翻译理论的框架里,缺失了自己的想法和内容^{[3]104}。因此,我国高校在翻译理论教学中,更应该重视翻译理论的创新培养,不要把学生的翻译理论思维从初期就固定于一个模板里,否则我国高校培养出的翻译理论人才都是按照传统模式复制出来的克隆学者。如果按照传统的高校翻译理论教学,那么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人才都是以一种老套思维去进行学术研究,何来创新和突破?高校教学要意识到在重点培养翻译理论人才的翻译实践能力和国际传播力的

同时,也要关注翻译理论研究人才的学术能力。同时,要重点培养翻译人才理论创新意识,拓宽其理论视野,不把思维固化在一个模板里。只关注理论学习的程度而不在意理论思维,培养不出优秀的研究者。

要解决原创性理论少的问题,原创性思维教学和学习十分重要,教学重心要有意识地转移到创新培养和理论教学方面^[17]。翻译研究能力培养应贯穿翻译教育的始终^[18]。翻译研究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点是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思维的培养不代表理论知识的学习不重要,对理论知识的教学依旧是重点。理论知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储备,很多学者对理论知识一知半解,导致其对研究重点的把握不到位。切斯特曼指出,有很多理论构建者以其非常有限的个人经验对理论研究作出判断,导致研究结果不准确,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其对理论知识了解不透彻^[19]。

高校教学需要引导翻译理论研究人才主动思考,从全局观和世界观上把握理论研究,将理论灵活运用于实践中,并从实践中反思创新,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为核心目标,不拘泥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树立创新中国特色翻译理论道路的志向。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高校教育体系里增添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培养从本科到博士的各种人才,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翻译理论研究人才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理论特色构建

今天,我国应该走建设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道路,用自己的理论和方式引导学术研究。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要紧密贴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聚焦国际译学理论发展前沿,精准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翻译理论,推动翻译理论和学术思想创新。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创新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性想法,但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西方翻译理论而展开。中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翻译理论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国情,因此我们需要突破西方翻译理论桎梏,理性辨别、深刻思考和创新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丰富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大有裨益^[20]。我们应该学会用中国视角和思维去解决理论研究问题,不能总是按照别人铺设的道路前行。同时,虽然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理论,但是有些学者好像弄错了特

色的概念,一直在西方现有的翻译理论里寻找、抛出和中国文化沾边的东西,这完全弄错了努力的方向。我们在西方理论中寻找特色,不如在现有的翻译理论地图外开辟翻译理论的新世界,铺设我们自己的道路。因此,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如何权衡西方翻译理论在我国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国外的众多理论我们需要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自我的研究和创新。新时代翻译理论研究要求我们不能盲目跟风,不可生搬硬套国外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是西方学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获得的,我们需要经过检验和实践才能运用到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之中^{[20]84-85}。因此,我们在学习国外翻译理论的过程中既要保持文化自信,又要批判思考避免盲目自大。新时代大变局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学术研究转变,建立文化自信,以中国视角为出发点进行理论研究,创新中国学术^[21]。我们应迎接挑战,抓住机会,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新道路。

五、结语

在新时期,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与时代和国家并肩而行,不能够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停滞不前。我国学者要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关注中国自身的翻译理论建设,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和理论特色,摸索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方向,创造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要取得更大的成就,不仅要学习西方翻译理论,更要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经验。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来看,它采用一种继承、批判、创新的理论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是成功的理论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模式并不仅限于翻译伦理研究,而是适合大多数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这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显著的重要原因。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借鉴和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模式。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由于有些学者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一些成果不尽如人意。我们只有真正解决问题,才能使翻译理论研究者齐心协力,实现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动力不足、

基础不牢和创新不足的问题;改善学术环境,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客观条件;构建积极的科研价值观,培养良好的学术价值观指导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发展的核心;转移教学重心,夯实研究者的学术基础,拓展创新思维,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保证;立足我国国情,以中国视角创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铺设中国特色理论研究道路,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J]. 外国语, 2005, 28(1): 53-59.
- [2]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 23(2).
- [3] 马会娟. 走出“西方中心主义”: 基于中国经验的翻译理论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6(2).
- [4] 方梦之. 我国翻译理论系统研究的发轫: 忆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1987)[J]. 上海翻译, 2023(5): 1-5.
- [5]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 不同翻译研究途径的比较研究并兼答相关疑问[J]. 中国外语, 2014, 11(5): 104-111.
- [6] 韩子满, 钱虹. 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国际传播: 现状与展望[J]. 中国翻译, 2021, 42(6): 103-110.
- [7]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 23(3).
- [8] 胡作友.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述评[J]. 学术界, 2008(6): 249-255.
- [9] 胡庚申, 李素文. 生态翻译学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比较研究: 再论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J]. 中国外语, 2022, 19(1): 98-104.
- [10] 周领顺. 译者行为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过程[J]. 中国翻译, 2023, 44(2): 176-180.
- [11] 周领顺. 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J]. 中国翻译, 2023, 44(1): 16-23.
- [12] 胡作友, 彭九州.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J]. 中国翻译, 2023, 44(2): 26-34.
- [13] 韩子满. 理论改写与科研学术评价: 中国翻译理论建设亟需重视的两个方面[J]. 中国外语, 2022, 19(3): 87-94.
- [14] 许钧. 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 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J]. 中国外语, 2021, 18(5): 1, 12-15.
- [15] 许钧. 翻译史研究的任务: 基于《不平等与不对等》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5(3): 420-429.
- [16] 张智中. 谈许渊冲翻译实践与理论: 贡献与局限[J]. 中国翻译, 2022, 43(4): 92-97.
- [17] 刘云虹, 许钧. 问题 理论 方法: 关于翻译研究的对话[J]. 中国外语, 2023, 20(4): 11-16.
- [18] 蓝红军. 翻译研究能力的内涵及其培养: 理念与方法[J]. 外语界, 2023(4): 2-7.
- [19] CHESTERMAN, ANDREW.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theory: selected papers 1993-2014 [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51-52.
- [20] 吕奇, 王树槐. 西方翻译伦理代表理论批评与反思[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0(1).
- [21] 邵璐. 当下中国翻译话语之哲学反思: 以变译理论为例[J]. 中国翻译, 2022, 43(5): 134-141.

Enlightenmen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Research to China's Translatology Innovation

Hu Zuoyou, Chen Xiaomi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from experience to science and then to system, and formed the situation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research follows a development model of inheritance,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whose unique feature lies in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and clear logical connections, which gradually forms a mature theoretical system.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ina follows a path from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n creating new translation theories. Althoug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research objectives, methods, and attitudes, which have led to unsatisfactory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Only by fundamentally solving the deficiency of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weak foundation, and weak innovation can we embark on the path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construct a translation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research; theoretical system;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人际类关系名词的语义及其词典释义

高 翀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人际类关系名词不同于普通名词,其语义不自足,在句子中要求有领属定语共现。根据语义类型、句法特征等,人际类关系名词可分为单向关系名词和双向关系名词;结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分析,可进一步归纳为直单向关系名词、间单向关系名词、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四种释义模式。对《现代汉语词典》已收录的“孩子、恩人、上家、家属、同事、恋人”等关系名词词条提出的修改意见,说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需要在词义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

关键词:人际类关系名词;语义分析;单向关系;双向关系;词典释义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8

一、引言

名词是汉语中的一个大大类,其中有一类关系名词在语法上较普通名词具有特殊性。有不少国内学者注意到这类名词并指出其特征。如吕叔湘(1979)指出同义词“老乡”和“同乡”的属性差异,“老乡”蕴含着“加而不合”,而“同乡”则是“合而不加”^[1]。周国光(1990)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同乡”是关系名词,属于集合名词;“老乡”则是属性名词,两者词义所蕴含的关系式有较大差异^[2]。刘丹青(1983)对关系名词的语义、语法特征进行详细论述,指出了其相向性和递相性特征,并根据关系性质及用法将关系名词细分为七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3]。杨红(2013)则从来源、构词、语义、句法、文化等多角度对关系名词进行全面研究,定义了关系名词的三项基本特征:自足性、依存性、推导性,并从认知的角度对个别关系名词进行了解释^[4]。更多对关系名词的关注则集中在对亲属关系名词的语义分析以及语义推理上,如陈振宇、袁毓林(2010)^[5],张秀松、袁毓林等(2011)^[6]。总体来看,关系名词相关研究比较有限,关系名词的特性还待进一步挖掘。

我们认为这类特殊的名词是有一定研究价值的,不同语言对比中,这类名词能体现出词汇间的差异性。例如在表示“死了丈夫的女人”这个概念时,在汉语中可以称为“寡妇”或是“遗孀”,而其中“寡妇”是普通名词,“遗孀”是一种表示关系的名词;在英语中用单词“widow”来表示,但是只表示属性,不表示关系。然而在现有汉语研究中,这类名词往往被忽视,在词典释义中也是作为普通名词进行释义,忽略了其表示关系的特性。以“父亲”一词在不同版本语文词典中的释义来说明。例如:

(1)【父亲】有子女的男子。(《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繁体版))^[7]

(2)【父亲】称生育自己的男子。(《现代汉语词典》(实用版))^[8]

(3)【父亲】有子女的男性是子女的父亲。(《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①

释义(1)描述了词义的两个语义特征:一是“有子女”;二是“男子”。释义(2)也说明了两个语义特征:一是“生育自己”;二是“男子”。释义(3)不仅说明了这两个语义特征,并且释出了“子女”与

① 以下词条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不再单独标明。引用其他版本的词条则会另行标明。

“父亲”之间的关系。与其他释义相比较,释义(3)释出了关系义,更完整地表达了“父亲”的语义。因此,为了说明这类名词的特殊性,完善词典释义,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类名词做进一步分析和分类,从而厘清其语义特点,同时结合释义实例,归纳其释义模式并对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提出修改建议。

二、人际类关系名词的特征

“关系”是一个繁复的大类,正是不同的关系产生了缤纷的世界。关系的种类繁多,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由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关系,这类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非亲属关系(社会关系^①)。因此,本文将这类专门表示人与人之间彼此具有某种关系的名词称为人际类关系名词^②(以下简称关系名词)。

从语义上来讲,关系名词往往是关系一方相对于关系另一方而言的,例如“男友”并不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男友,只有对于他的女友来说他才是男友,“男友”所涉及的关系对象就是“他本人、他的女友”;“仇人”是相对于“彼此有仇恨的人”而言的,“仇人”所涉及的关系对象就是“他本人、跟他有仇的人”。这和普通名词不同,例如“新郎”作为一种身份,在结婚的时候对任何人来说他都是新郎;“医生”是指掌握医药知识、以治病为业的人,作为一种职业,不仅对“病人”来说他是医生,对任何人来说他都是医生。

从句法上来讲,关系名词语义不自足,需要借助其他方式使句子成立。一些关系名词需要使用表示领属关系的“的”字结构引入关系对象进行说明,而普通名词不要求有领属定语,甚至有的不能有领属定语。可以对比以下例句:

例1:a她是烈士的遗孀——*她是遗孀^③

b*她是烈士的寡妇——她是寡妇

例2:a王教授是我的恩人——*王教授是恩人^④

b*王教授是我的好人——王教授是好人

例1中“遗孀”和“寡妇”宽泛地讲都是指死了丈夫的女人,但是“遗孀”是相对于“死了的丈夫”而言的,用“的”字结构引入关系对象“烈士”,所以必须说“烈士的遗孀”语义上才成立,只说“她是遗孀”,语义上不自足,句子就站不住。“寡妇”不是相对于“死了的丈夫”而言的,只要是死了丈夫的女

人就是寡妇,所以可以说“她是寡妇”,而说“她是某人的寡妇”却不能成立。同样例2中“恩人”也就是就“我”而言的,用“的”字结构引入关系对象“我”,所以说“我的恩人”语义上才成立,只说“他是恩人”,语义上不自足,句子也站不住。而“好人”不是相对某人而言的,所以可以说“他是好人”,“好人”前面加领属定语变成“我的好人”反而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我们将关系名词定义为:表示彼此具有某种关系,并能够出现在“甲+是+乙的+N”句式中N位置,而不能出现在“他/她/它+是+N”句中N位置的名词^⑤。

三、人际类关系名词的分类与释义模式

关系的形成主要是依靠社会或自然界产生的交际,因此关系名词中就包含至少两个关系对象。以下将根据关系对象、语义指向对关系名词进行分类。

(一)单向关系名词的分类与释义模式

单向关系名词($N_{\text{单}}$)是由关系一方(A)相对于关系的另一方(B)而言的。单向关系名词主要是指关系的一方,另一方是起参照说明作用,用“的”字结构引入。关系一方(A)是主要关系对象($N_{\text{主}}$),另一方(B)是客体关系对象($N_{\text{客}}$),其内部语义指向是单向的。以“丈夫”一词为例,“丈夫”是指男人结婚之后,男人就成了女人的丈夫。换句话说,“丈夫”是“男人”针对“女人”形成的关系,“男人”是 $N_{\text{主}}$,”女人”是 $N_{\text{客}}$,因此在句法上可以说“男人是女人的丈夫”,但不能表述为“女人是男人的丈夫”,这样可以将单向关系名词的特性归纳为“A是B的 $N_{\text{单}}$,但B不是A的 $N_{\text{单}}$ ”。有这类特征的名词如

① 人与人之间因为生活、工作、情感需要交际而形成的关系。

② 构成临时关系的名词不是关系名词。

③ *表示该句在实际情况下不成立。

④ 在一定语境下能使用,在句法上省略了其他的成分,例如“对我而言,王教授是恩人”,句子也可变换为“王教授是我的恩人”。在上下文中有交代,则在句子中可以省略其他成分。

⑤ 有的关系名词看似表领属关系,没有以领属结构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存在于上下文中,如“他是一位父亲,在陪儿子中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等,都可以认为是单向关系名词。

根据语义进一步观察,单向关系名词可以分为直接单向关系名词和间接单向关系名词。

1. 直接单向关系名词及其释义模式。直接单向关系名词是指所含的关系对象是直接发生关系的,关系层次是单一的。“丈夫”是关联两个关系对象“男人”(A)、“女人”(B)通过某种行为(如“结婚”)而产生“丈夫”这层关系,这是关系对象直接作用发生的关系。在词典释义中,对这类关系名词首先表述其关系产生的原因,其次再说明关系对象之间的关系。其语义包含了两条路线,路线 I 说明了属性,即男人成为丈夫的原因;路线 II 说明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即“男人”因为“结婚”(关系动词)而和“女人”产生了“丈夫”这层关系。在词典中有不少单向关系名词就是按此类步骤进行释义的。例如:

【克星】迷信的人用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推论,认为有些人的命运是相克的(①关系背景说明),把克某人的人叫作某人的克星(②用关系构式说明关系对象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单向关系名词的释义模式:一是关系背景说明,即对双方是如何建立起关系或如何发生关系进行说明;二是关系构式,即“N_主是N_客的N_{关系}”,可表示为:模式1【N_单】①VP关系说明,②关系构式(N_主+是+N_客+的+N_单)。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为了释文简洁,词典释义会在此基础上进行简略。例如:

【男友】指恋爱对象中的男方。

【女友】指恋爱对象中的女方。

【姐姐】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子。

【哥哥】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而年纪比自己大的男子。

“男友、女友、姐姐、哥哥”的释义省略了关系客体对象,但不影响对词义的理解,我们仍旧能够靠自己的生活经验或知识补出来,将这类释义还原为典型释义模式。例如:

【男友】恋爱对象中的男方是女方的男友。

【女友】恋爱对象中的女方是男方的女友。

【姐姐】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其中年纪大的女子是年纪小的姐姐。

【哥哥】同父母(或只同父、只同母),其中年纪大的男子是年纪小的哥哥。

2. 间接单向关系名词及其释义模式。间接单向关系名词是指关系名词通过叠加其他关系而产生新的关系。例如:“孙子”是通过“儿子”叠加“儿子”这层关系产生的;“曾孙子”是通过“儿子”叠加“孙子”的关系产生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曾孙子”是“儿子”叠加“儿子”再叠加“儿子”产生的。

在汉语的亲属关系名词中,表示旁系亲属或隔代亲属关系的名词是间接单向关系名词,包括“伯父、伯母、叔叔、姑姑、孙子、孙女、重孙”等,部分社会交往关系也是间接的,如“师母”等。有的间接单向关系名词从构词中就可以看出,属于单层间接关系名词,如“姐夫”(姐姐的丈夫);有的属于多层间接关系名词,如“姑父”(父亲的姐妹的丈夫)。有的词虽然从构词中不能体现,但实际的意义也是间接的,如“姑姑”(父亲的姐妹)、“嫂子”(哥哥的妻子)。

正是由于间接单向关系名词需要通过其他人才发生关系,因此其释义可以通过直接单向关系名词的意义来表达。例如:

【孙子】儿子的儿子。

【重孙】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

【祖父】父亲的父亲。

【曾祖父】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父亲。

因此,间接单向关系名词的释义模式可以记为:模式2【N_单】N_单的N_单。

(二)双向关系名词的分类与释义模式

双向关系名词是集合名词,包含两个或多个关系对象,关系内部的语义指向是相互的。根据语义指向方式又可以细分为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和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

1. 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及其释义模式。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N_{双1})包含多个关系对象,且关系对象之间的关系平等。以“朋友”为例,“朋友”是指有交情的人之间的称呼,“朋友”至少包含两个关系对象(A和B),“朋友”的语义主要可分为两条路线:路线 I 说明形成朋友的原因是有交情;路线 II 说明 A 和 B 的关系是平等相互的,即 A 是 B 的朋友,B 也是 A 的朋友。当“朋友”包含多个关系对象时,即关系对象为 A、B、C,“朋友”内部语义则可分为多组路线 I 和路线 II,关系对象之间是平等的,A、B、C 的语义都指向“朋友”。由于这类关系名词中关系对象之间是交互的且语义指向是双向的,我们将其称为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

和单向关系名词不同的是,这类关系名词包含多个关系对象,关系对象之间是相互对待、相互平等的,语义关系是双向可逆的,这种关系构式不仅可以用“的”,还可以用并列连词“和、与”等,以及复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等组成,从形式上可以归纳为“A是B、C的 $N_{双1}$,B是A、C的 $N_{双1}$,C是A、B的 $N_{双1}$,A、B和C是 $N_{双1}$,我们是 $N_{双1}$ ”。这类关系名词包括“同伴、同学、老乡、知己、亲戚、弟兄、对家、宿敌、死党、亲人、闺蜜、搭档、朋友、伴侣、老伴、恋人、邻居、仇敌”等。

从语义上看,交互型关系名词主要指具有相互联系的人,因此关系对象是人。在释义中运用关系副词、关系动词说明其内部关系是如何建立、发生的。例如:

【同伴】在一起工作、生活或从事某项活动的人。

【同学】同在一个学校学习的人。

【邻居】住家接近的人或人家。

【仇人】因有仇恨而敌视的人。

【情敌】因追求同一异性而彼此发生矛盾的人。

【知己】^②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谊深切的人。

“同伴、同学、邻居、仇人、情敌、知己”的释义中都运用“彼此、共同”等表示交互意义的修饰语来说明关系的建立和产生方式。因此,可以将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的释义模式归纳为:模式3【 $N_{双1}$ 】关系说明(“彼此/相互/共同”等VP)+的人。

2. 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及其释义模式。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N_{双2}$)是由两个关系名词构成,一般是从两个单向关系名词($N_{单}$)各提取一个语素构成的,例如“父女”,“父女”就是指父亲和女儿。这类关系名词语义既不单独指向关系对象(A),也不单独指向关系对象(B),关系对象之间语义不平等,也不能受“彼此、互为”修饰,如不能说“他们彼此是父女、他们互为父女”,但关系对象可以用连词“和”引入,以及复数代词构词说明。从形式上可以归纳为:A是B的 $N_{单1}$,B是A的 $N_{单2}$,A和B是 $N_{单1+单2}$,复数代词是 $N_{双2}$ 。涉及关系对象就是父亲(A)、女儿(B),其语义包括三条路线:路线I说明A是B的父亲;路线II说明B是A的女儿;路线III说明A和B是“父女”,或者说他们是“父女”。

这类关系名词是由关系对象A、B加合之后形成新关系,A、B之间的语义指向是双向的,因此可称为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这类关系名词包括“夫

妻、夫妇、母女、母子、父子、父女”等。需要注意的是,“父母”在构词上看似像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但只能构成“他们是我的父母”而不能构成“他们是父母”。从句法上来说“父母”是由两个并不表示彼此关系的单向关系名词构成,仍属于单向关系名词,类似的还有“子女、哥嫂”等。

根据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的特点,在释义中可以采用拆字释义法释义,即将所提取的语素还原成复合词,再用“和”将这两个单向关系名词连在一起,例如:

【夫妻】丈夫和妻子。

【母女】母亲和女儿。

这类关系名词的释义模式可以归纳为:模式4【 $N_{双2}$ 】 $N_{单}$ 和 $N_{单}$ 。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关系名词的内部语义关系、所包含的关系对象、语义指向各有不同,单向关系名词主要依靠“的”构成关系,双向关系名词还可以使用连词、副词、代词等多种手段构成关系。由于每一种关系的体现方式不同,其释义模式也不同,在词典中呈现出一定的代表性和规律性,见表1。

四、关系名词的释义修改列举

根据上文的分析,关系名词是汉语名词中较有特点的一类。这一点可能被一些词典编纂者觉察到了,因此在词典编修的过程中做了修改。例如“前夫、前妻”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第7版中的对比:

【前夫】死去的或离了婚的丈夫(区别于现在的丈夫)。(《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9]1088}

【前妻】死去的或离了婚的妻子(区别于现在的妻子)。(《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9]1088}

【前夫】男女离婚后,男子是女子的前夫。也指死去的丈夫(对现在的丈夫而言)。

【前妻】男女离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前妻。也指死去的妻子(对现在的妻子而言)。

改后的释义更加完善,既释出了词语的属性质也体现了关系义。这说明《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高质量辞书,能够根据词语的特征对释义进行改进,反映词语的意义。然而还有个别单向关系名词的释义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缺少关系背景说明、关系构式说明不充分、关

表1 关系名词分类表

类型名称	单向关系名词		双向关系名词	
	直接单向 关系名词	间接受单向 关系名词	交互型双向 关系名词	加合型双向 关系名词
语法形式	A是B的N _单		A是B的N _{双1} B是A的N _{双1} A和B是N _{双1} 复数代词是N _{双1}	A和B是N _{双2} (即A是B 的N _{单1} ,B是A的N _{单2}) 复数代词是N _{双2}
语义方向	可逆[-]		可逆[+]	可逆[-]
关系对象之间	平等[-]		平等[+]	平等[-]
释义模式	【N _单 】关系说明,关系 构式(N _主 +是+N _客 +的 +N _单)	【N _单 】N _单 的N _单	【N _{双1} 】关系说明(“彼 此/相互/共同”等VP)+ 的人	【N _{双2} 】N _单 和N _单
例词	丈夫、妻子、 哥哥、姐姐	姑姑、叔叔、 侄子、孙子	朋友、同学、 校友、爱人	夫妻、母女、 父子、姐妹

系背景范围狭隘、对关系对象的界定不准确、关系副词运用不当、关系对象描述不当,现根据上文归纳出的释义模式,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内部分关系名词释义提出修改建议。

(一)缺少关系背景说明,以“孩子”词条为例

词典释义中,为了避免释义的繁复,往往会采用以词释词的释义方式,例如:

【子女】儿子和女儿。

【儿子】男孩子(对父母而言)。

【女儿】女孩子(对父母而言)。

【孩子】①儿童:小~|男~。②子女:她有两个~。

“子女、儿子、女儿、孩子①”都是关系名词,用“儿子和女儿”解释“子女”、用“男/女孩子”解释“儿子和女儿”、再用“子女”解释“孩子”,即子女→男/女孩子→儿子和女儿→子女,这样这四个词之间形成了循环释义,未解决释义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的第78条中指出:“几个同义词中尽可能选一个作基本,作较详的注,其余的与此比较,有分别则注明,难分别的即以第一个作注。”^[10]109 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就要像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选择其中一个作为基础词进行详细的解释。通过比较,我们认为可以将“孩子”词条的义项②作为基础词,在释义中增加关系动词,将关系背景说明清楚,可将其修改为:

【孩子】男/女生养的人是他们的孩子(不限年龄):这对年轻夫妻的~还在上幼儿园|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的~也都进入了老年。

“孩子”的释义详注后,“儿子、女儿、子女”的词义也就有了着落,读者可以通过“孩子”的释义比较好地理解“儿子、女儿、子女”的词义。

(二)关系构式说明不充分,以“上家、下家”词条为例

“上家、下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

【上家】几个人打牌、掷色子、行酒令等的时候,如轮流的次序是甲乙丙丁……,乙是甲的下家、丙的上家,丙是乙的下家、丁的上家。

【下家】几个人打牌、掷色子、行酒令等的时候下一个轮到的人。

“上家”是单向关系名词,主要关系对象包括“甲、乙、丙、丁”,原释义只说明了“乙相对于甲、丙的关系”“丙相对于乙、丁的关系”,但未说明“丁相对于甲、丙的关系”“甲相对于乙、丁的关系”,释义

并不完整。此外,“上家、下家”属于同类词,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的第85条中指出:“同属一类的条目,注解措辞须一致。”^[10]^[11]“上家、下家”的释义也不符合这一原则。同时,“上家”的释义中解释了“下家”,因此“下家”释义不需再重复。可以根据关系名词的释义模式1对“上家”详注,对“下家”略注,将释义改为:

【上家】打牌、掷色子、行酒令等的时候,按次序排列,若轮流次序为甲乙丙丁……,则甲是丁的下家、乙的上家,乙是甲的下家、丙的上家,丙是乙的下家、丁的上家,丁是甲的上家、丙的下家。

【下家】见×××页【上家】。

修改后,“打牌、掷色子、行酒令等的时候,按次序排列,若轮流次序为甲乙丙丁……”是关系说明,“甲是丁的下家、乙的上家,乙是甲的下家、丙的上家,丙是乙的下家、丁的上家,丁是甲的上家、丙的下家”是关系构式。“上家”释义关系对象增补后更为全面,将相对的“下家”也引入释义中,则对“上家”的意义说明更加具体和清晰,同时也解释了“下家”的词义。为了避免释义的重复性,“下家”可简单地注为:见×××页【上家】。这是一种简便的释义方法,在词典释义中也经常使用。例如:

【合成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构成的词(区别于“单纯词”)。合成词可以分为两类:a)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根合成的,如“朋友、庆祝、火车、立正、照相机、人行道”;b)由词根加词缀构成的,如“桌子、瘦子、花儿、木头、甜头、阿姨”。前一类也叫复合词,后一类也叫派生词。

【复合词】见523页【合成词】。

【派生词】见523页【合成词】。

(三)关系背景范围狭隘,以“恩人”词条为例

“恩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

【恩人】对自己有大恩的人:救命~。

实际语料中我们采集到不少“恩人”的用例,如:

例3:一位名叫秦建萍的农村妇女,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何贤志走了几十公里山路,为了看一眼娘儿俩的救命恩人——参加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的马少华医生。(《人民日报》2002-09-15)

例4:对乌木提汗和丈夫沙里木而言,孙建坤是恩人,也如同孩子一般亲切。(人民网 2019-12-24)

例3中的“恩人”是相对于“秦建萍和她的孩子”而言的,例4中的“恩人”是相对于“乌木提汗和

丈夫沙里木”而言的,这说明“恩人”不仅可以表示“对自己有恩的人”,还可以表示“对他人有恩的人”。原释义“对自己有大恩”中的“自己”语义偏窄,不能涵盖“恩人”的实际用例,将原释义中的“自己”改为“某人”则扩大了语义范围,不仅包括了“自己”也包括了“他人”,这样释义就更加全面了,因此我们建议将“恩人”词条修改为:

【恩人】对某人有大恩的人,是某人的恩人。

(四)对关系对象的界定不准确,以“家属”词条为例

“家属”词条的释义在《现代汉语词典》的不同版本中修改过多次,以下选取改变明显的版本释义。例如:

【家属】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11]

【家属】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也指职工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12]

【家属】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也指某人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

“家属”在《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中解释为“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这个释义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释出基本义;二是“本人”意义很概括,究竟指谁不容易理解。这一点在《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中得到修改和补充,“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是基本义,另外还在“本人”前加上了修饰语“职工”,然而这样又太具体了,不能涵盖一些其他实际用法,如“病人家属、烈士家属”等。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家属”的释义又进一步修改,将“职工”修改为“某人”,修改后释义就能够涵盖以上的用法。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每一次修改都有进步,但如果认真考察,会发现这样的释义仍有问题。在实际使用中“家属”是单向关系名词,不能独立成句,需要有其他名词+“的”做定语,引进客体对象,构成“XX(的)家属”,如患者(的)家属、受害人(的)家属,军人(的)家属等。

从中可以看出修饰“家属”的定语在语义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指当事人;二是指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使用“某人”释义又过于宽泛了,可以释得具体一些。根据已归纳出的单向关系名词释义模式,可将“家属”的释义修改为:

【家属】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是户主的

家属;当事人或某种身份的人,他本人以外的家庭成员是他的家属。

(五)关系副词运用不当,以“同事、同人、同僚”词条为例

“同事”和“同学”的意义相近,都是交互型关系名词。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在讨论“同事”之前,我们先讨论“同学”。“同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经历过修改:

【同学】在同一个学校一起学习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13]

【同学】同在一个学校一起学习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9]1368}

第3版释义中的“同”修饰名词,是“相同”的意思。第5版释义中的“同”修饰动词,是“一同”的意思,表示同时同地(做某件事情)。“同学”不仅是在相同的学校学习,而且要同一个时间段在相同的学校学习。例如:

例5:甄计兜是保定学院2002届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学生,当年他和同班的另一名同学就是听了政教系苏普奔赴且末的报告会,萌生了支边的决心。(中国青年网 2020-05-07)

例6:罗云笑道,这并不是夫妻俩在医学方面的第一次合作,两人是武汉大学的同学,毕业后一同进入中南医院,虽然在不同科室,平时也经常会有一些合作交流的机会。(人民网 2020-04-30)

例5中的“同学”是指2002届的同在一起学习的学生。例6中的“同学”是指在同一级别都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人。这说明只有同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学校一起学习的人才能被称为“同学”。因此第3版的释义是不够严谨的,这样的释义容易跟“校友”相混。跟“校友”释义作对比更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校友】学校的师生称曾在本校就读或担任教职员的人,也用作在同一学校学习或工作过的人的互称。

“校友”释义中的“在同一学校学习……”是可以指在不同时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过的人。“同学”中的“同”则是表示同一段时间、同一学校。因此第5版的修改是正确的。

再讨论“同事、同人、同僚”,它们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释义如下:

【同事】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人。

【同人】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或同行业的人。

【同僚】旧时指在同一个官署任职的官吏。

“同事、同人、同僚”和“同学”属于同类词,其中的“同”所表示的意义也应当是“一同”而不是“相同”。所以可以将这三个词的释义作如下的修改:

【同事】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

【同人】同在一单位工作的人或同行业的人。

【同僚】旧时指同在一个官署任职的官吏。

(六)关系对象描述不当,以“恋人、情人、爱人、配偶”词条为例

《现代汉语词典》对“恋人、情人、爱人、配偶”词条的释义如下:

【恋人】恋爱中的男女的一方。

【情人】①相爱中的男女的一方。②特指情夫或情妇。

【爱人】指丈夫或妻子。指恋爱中男女的一方。

【配偶】指丈夫或妻子。

以上释义只指出了婚恋中的一方,但是实际上这几个关系名词不仅指一方,也可以指双方。例如:

例7:唐时珺和屈永贵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人民日报》2015-11-24)

例8:他们是一对情人。(《人民日报》1982-09-10)

例9:旧时代里,为什么爱情总是以悲剧作为结局,隔离开一对爱人的原因往往不在于挚爱着的双方,社会的原因总是起着决定的作用。(《人民日报》1957-08-29)

例10:众所周知他们是夫妻,但没有结婚证,他们是配偶吗?法律怎样认定?(百度网 2023-04-06)

例7~例10中的“恋人、情人、爱人、配偶”都是指双方,且可以构成“他们俩是恋人/情人/爱人/配偶”,还可以受“一对”修饰,构成“一对恋人/情人/爱人/配偶”,说明这些词还能够指双方,现有释义只释出了一方,还不够完善。因此,可将“恋人”等词的释义修改为:

【恋人】恋爱中的男女双方或其中的一方。

【情人】①相爱中的男女双方或其中一方。②特指情夫和情妇双方或其中一方。

【爱人】指夫妻双方或其中的一方。也指恋爱中男女双方或其中的一方。

【配偶】夫妻双方或其中的一方(多用于法律文件)。

除了上述有些问题的词条,还有一些单向关系名词如“学弟、学妹、学姐”和意义类似的“师弟、

师妹、师姐”,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如“姑嫂、叔侄、兄妹、姐弟”等,也可以根据使用频率酌情在词典中增补。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关系名词分类的主要因素是所包含关系对象以及关系对象之间的语义指向,由此我们对关系名词做了层次性区分,包括:单向关系名词和双向关系名词。单向关系名词又分为直接单向关系名词和间接单向关系名词,双向关系名词又可分为交互型双向关系名词和加合型双向关系名词。

正是因为关系名词语义有特殊性,在释义中才应有体现。对关系名词的释义应包含两层:第一层是属性义,即说明关系名词作为名词所具有的特征或属性;第二层是关系义,即说明关系名词所涉及的关系对象及其内在关系。第二层意义是关系名词区别于普通名词的核心意义。词典对关系名词的释义也可以总结为两种:一是通过动词小句建立关系进行说明,利用关系句式、关系副词等方式说明关系;二是通过关系名词来释义关系名词。第一种是关系名词释义的典型方式,也是体现其关系义的主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6-67.
- [2]周国光.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2):41-47.
- [3]刘丹青.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J].语文研究,1983(4):16-22.
- [4]杨红.现代汉语关系名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 [5]陈振宇,袁毓林.汉语亲属关系的语义表示和自动推理[J].中国语文,2010(1):44-56.
- [6]张秀松,袁毓林,陈振宇,等.基于情境网络的汉语亲属名词的语义描写体系[J].世界汉语教学,2011(3):318-333.
- [7]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繁体版[M].田小琳,李斐,马毛朋,修订.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405.
- [8]商务国际辞书编辑部.现代汉语词典:实用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8:242.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0]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S]//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1]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57.
- [12]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482.
-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53.

Semantic Analysis and Dic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ouns

Gao C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ouns are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nouns, whose semantics are not self-sufficient and require the co-occurrence of the possessive attribute in the sentence.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m into unidirectional and bidirectional relational nouns based on the semantic types and syntactic features, while combines examples from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four interpretation modes: direct unidirectional relational nouns, indirect unidirectional relational nouns, interactive bidirectional relational nouns, and additive bidirectional relational nouns.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modification and supplement of relational noun terms in the dictionary such as "children, benefactors, family members, colleagues, and lovers" indicating that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is becoming more perfect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exical theory.

Keywor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ouns; semantic analysis; un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interpretive mode

论英剧《天堂一刻》对左拉小说《妇女乐园》的 松散改编

王欣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英剧《天堂一刻》从左拉小说《妇女乐园》中获取灵感,以松散改编的手法再现了19世纪中后期现代零售业诞生之后的社会变革。在保留小说《妇女乐园》基本情节和人物的同时,英剧《天堂一刻》借助肥皂剧元素和“小妞电影”创作技巧对小说内容进行了重新“编码”。英剧《天堂一刻》在改编过程中为迎合当代观众,遮蔽了左拉小说中以欲望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成分,突出了对“美好的旧时光”的怀念主题。

关键词:《天堂一刻》;《妇女乐园》;英剧;小说;松散改编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09

在1883年出版的小说《妇女乐园》中,左拉以文坛开拓者的姿态,将触角伸向前人从未涉及的现代生活领域,表现了19世纪中后期法国社会现代零售业诞生之后这个“行动、胜利、各方面努力的时代”^{[1]491}。一个多世纪之后,正如左拉所预料的那样,《妇女乐园》不仅成为“一篇吟咏现代事业的诗歌”^{[1]491},而且展现出在商业自然进化中各阶层的拼搏、倾轧以及生存状态。基于《妇女乐园》在小说史和消费文化史上的双重地位,同时具有音乐性和电影性的特点,它的影视改编版本为“女人们究竟想要什么”的时代之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阐释可能性。继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和安德烈·卡耶特(André Cayatte)在1930年与1943年两个电影改编版本之后,2012—2013年由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电视连续剧《天堂一刻》(The Paradise)^①用一种松散改编^②方式将左拉小说转换成全新的商业年代剧。在两季16集的篇幅中以“美好的旧时光”的论调来讲述百货商店“过热的空气中间,女人们统治着一切”^{[2]231}的“浪漫、刺激而性感”^{[3]130}的故事。在改编过程中,电视剧只是从小说获取灵感,并没有试图去还原左拉笔下

的巴黎世相以及“妇女乐园”百货公司作为经济“怪物”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在遮蔽小说自然主义成分的同时,借助于浪漫气氛的书写与商业纠葛的“转向”,与原著小说在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性,从而凸显出不同时代不同媒介对于小说文本及其文化内涵的不同理解。

一、“吟咏现代事业的诗歌”

作为《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第11部作品,《妇女乐园》被认为是对商业资本垄断发展的庆祝,它讲述的是创办一家卖时兴服饰用品的

① 左拉小说《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常见英译名为The Ladies' Paradise。英国电视剧《天堂一刻》(The Paradise),常见译名还包括《天堂百货》《彼岸是天堂》《购物天堂》《女人天堂》等。

② 松散改编(loose adaptation)的提法来自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Louis Giannetti)在《认识电影》(Understanding Movies)中对改编的分类,即忠实改编(faithful)、无修饰改编(literal)以及松散改编(loose)。其中,“松散改编”只保留了原著的意念、状况或某个角色,然后再独立发展成新的作品。可参见贾内梯:《认识电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07页。

大型百货商店的故事,就像“蓬马谢”或“卢浮宫”商店那样,它们曾使我们的商业动荡不安和为之翻新^{[4]346}。在这部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小说的开篇,左拉迫不及待地有关“庞大的巴黎”、大型百货商店、人的欲望等内容的描写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经历一夜火车旅行的主人公黛妮丝在“非常疲劳”的状态中,“惊惊慌慌又茫然不知去向,抬起头向各店家观望”^{[2]1},借助于黛妮丝的视角,现代都市巴黎和“妇女乐园”的第一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当位于米肖狄埃街和圣奥古斯丹街转角的这家店铺出现在黛妮丝和她的两个弟弟眼前时,它“真是大得无边”“生意兴隆,朝气蓬勃”^{[2]2},甚至让黛妮丝“惊奇得走不动了”^{[2]2},她“恋恋不舍,把别的事都忘记了”^{[2]2}。通过这种方式,左拉的小说以巴黎新型百货公司这个“怪物”的发展壮大过程反映商业资本不断集中和垄断组织逐渐兴起的历史场景,“显现出它那暴发户的面孔向着新巴黎阳光辉煌”^{[2]340}。

电视剧《天堂一刻》在改编过程中选取了左拉原著的主要故事情节以及核心人物,并将故事地点从巴黎转移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座英格兰北部城市。与小说开篇一样,聪明而雄心勃勃的黛妮丝从皮布尔斯来到这里,希望能在她叔叔埃德蒙的成衣店工作。但是因为街对面一家大型商店“天堂百货”的开业导致成衣店的生意大受影响,根本雇不起她。于是,黛妮丝穿过马路来到天堂百货女装部,在令人敬畏的部门负责人奥黛丽小姐监督下开始工作,并经受着初入职场时的一切痛苦。迷人的天堂百货经历让黛妮丝大开眼界,在与商店老板慕雷的多次接触中,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女性逐渐显露出在商业方面的才华,并且以女店员的身份成为“商品资本主义有力的象征”^[5]。

电视剧在改编过程中除了延续左拉所搭建的情节框架,还呈现出小说家所要描绘的对抗。就像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作为一名敢于冒险的资本家,慕雷认为女性的弱点必须被利用来获得商业利益,“女人注定是要被征服的,首先情不自禁买一些家庭实用的东西,然后受了精美物品的吸引,然后是完全忘了自己”^{[2]65}。他用殷勤的款待让“女人在店铺里是一个皇后,弱点外露,受人崇拜,受人阿谀”^{[2]65},最终在“倒空了她的钱包、损害了她的神经的时候,他就对她满怀秘密的轻蔑”^{[2]65}。为了呈现这种对抗,黛妮丝被左拉塑造成为一名“要为所有妇女复仇的小姑娘”^{[4]346},她身上既保留着

初入城市的乡村少女的胆怯与聪颖,同时她作为职业女性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又有着对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渴求,努力和男人一样自食其力。作为这场对抗的结果,黛妮丝成功地吸引了慕雷的注意,并最终以自己的淳朴和诚实战胜了慕雷,这种胜利在小说结尾更像是一种社会和解的象征,它联结了社区与商业、道德与金钱、大公司与小商家。

在描写这种对抗时,为了使小说具有传奇性,左拉采用了命运决定论的思想,这是这部小说的基础^[6]。这种命运决定论的思想在左拉描写当时大商业的风气时同样有所体现。随着“妇女乐园”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赚取的利润越来越高,商业垄断资本所形成的强大的竞争力对中小型商家威胁巨大。左拉提道:“我表现它和小商店的斗争以及逐步吞并小商店的过程,为此我安排了一家和它对立的商店,一家体现古代风俗的老字号。这家老店被大百货商店逼上绝路,由此导致了一场家庭悲剧。此外还有几个比较次要的情节,以及本区的其他店铺。不过这只是生意方面。”^{[4]346}左拉通过小说告诉读者,在这种压力下,那些经营单一品种的旧式专业化小商店,最终都无法摆脱彻底破产的命运。“妇女乐园每次创设新的部门,周围的小店家便是一次新的崩溃。灾难扩大了,人们听见老的店家轧轧欲坠的响声。”^{[2]190}电视剧同样保留了天堂百货周边一些小商店店主的困境、不满和无奈。以埃德蒙和他的成衣店为代表,这些有着旧式商业观念的小店主在竞争漩涡中与慕雷控制的商业垄断资本进行顽强而又徒劳无益的抵抗。为了生存,为了不致覆灭,他们尝试着用最后的资金来装饰店面,以互利联营的方式进行价格抗争,甚至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进行竞争,但无论这些商家们采用怎样的手段,无论短期离开天堂百货的黛妮丝怎样给他们出谋划策,同实力雄厚的天堂百货进行竞争,结果都是不自量力的失败。“这是商业的一种自然的进化,事情必然要走的路,人们阻止它去走,也是不可能的,那时,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大家都得这么去做。”^{[2]168-169}与小说中选取布拉、鲍克、罗比诺等三类商人在垄断资本冲击下酿成的悲剧类似的是,电视剧以埃德蒙·洛维特及其成衣店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濒临破产的小商家代表,流露了对被垄断资本吞噬的小商人的深切同情。

可见,左拉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物理力量的世界,它运转在一定的物理限度之内,并且如果谁得

到多于他自己的那一份,那么另一个人的所得就必定会减少。左拉从根本上认为这一系统既是剥削性的又是破坏性的^[7]。19世纪中期成长起来的百货商店顺应了时代发展变化,给人们带来快活、消遣,以及娱乐的日常乐趣。小说着力描绘的“妇女乐园”是逐渐形成的垄断资本的典型;在电视剧《天堂一刻》中,作为叙事空间的百货公司提供了一种通俗易懂的世俗奢华景象^{[3]131},将19世纪中后期新型百货商店的经营模式,还有橱窗中不断更换的陈设商品,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借助于女店员黛妮丝的职业经历,一段历史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新兴的百货公司仿佛“给女人造了一座庙堂,用一大群店员向她焚香礼拜,创造出一种的宗教仪式”^{[2]65}。

二、“女人们究竟想要什么”

在情节构建与叙事强度方面,“喜欢从小处着手”^[8]的电视编剧比尔·加拉格尔(Bill Gallagher)拥有这样一种天赋,能够围绕源文本中暗示的一些小事件来创作整部剧集,从过往的描述中塑造常设角色^{[9]69}。《天堂一刻》这部改编作品注重对文学素材进行选择性的鉴别、审查、校正和虚构,以满足电视语境在人物、情节、时间和氛围等方面的特定戏剧性需要^[10];在进行大幅扩展的同时融入肥皂剧元素,使其呈现出一种更接近于职场剧和消费文化特色的电视剧风格,并以此弥补地理背景从巴黎到英格兰北部无名城市的转变,引起当代观众对他们所熟悉的正在逐渐消失的商业街和无休止的网购的共鸣^{[3]130}。因此,除了在整个情节设计方面注重曲折性之外,故事化表现手段特别注重在细节上着墨,以增强情节的吸引力,这一手法起到了强化关键要素和情节效果的作用。

电视剧《天堂一刻》的故事性从头到尾都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同时还有周期性的小高潮,这主要通过三个核心人物来实现,即女店员黛妮丝、商店老板慕雷和凯瑟琳·格伦丹宁小姐。其中,与黛妮丝相关的情节线索最为丰富。她是一名女店员(shop girl)、女售货员(saleswoman)或“工作女孩”(working girl),除了商店销售及商业化拓展的基本内容,她与奥黛丽小姐、克拉哈等店内人员的复杂关系可以从工作时间延伸至工作以外,与埃德蒙的关系可以将中小型店家与天堂百货商店的矛

盾竞争加以充分表现。与小说中一样,慕雷被塑造成“一个诡计多端的汉子,一个不顾前后的危险人物”^{[2]118}。不同的是,慕雷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凯瑟琳的银行家父亲,而不是像小说中来自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这一差别直接影响了电视剧第二季的剧情。凯瑟琳是慕雷的恋人,同时也是商店内出现频率最高的顾客。用凯瑟琳小姐来替代小说中的戴佛日夫人是电视剧改编的一处创新,她与父亲之间围绕慕雷的争执是小说中戴佛日夫人和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哈特曼男爵之间关系更为亲情化的一种转变。电视剧的主要角色构成了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主线。在电视剧第一季中,慕雷确立了与凯瑟琳的恋人乃至订婚关系,这也为他获得资金来源提供了保障。而当黛妮丝慢慢在慕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时,慕雷与凯瑟琳之间的恋情出现危机,即慕雷因为商店扩大经营无暇顾及恋情与凯瑟琳的任性性格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和第二季中类似的冲突都为电视剧剧情提供了细致、丰富且有区分度的节奏感。电视剧在改编过程中刻意强调了三位核心人物之间的相互呼应,在情节设计方面则加强了故事化处理,以此摆脱了原著中作为道德家和社会学家的左拉以他自己的方式,不带任何说教地充当不可替代的历史见证人^[11]的种种尝试,并且从真实故事的行进逻辑中,挖掘相关的冲突点。如埃德蒙与奥黛丽小姐的往日恋情、克拉哈对黛妮丝的嫉妒与仇恨、稽查乔纳斯对已故女主人的感激之情等,均通过重新编排获得不一样的叙事效果。其时代背景和反复出现的人物危机时刻,模仿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主线^{[9]71},在电视剧尤其是第一季中,这种改编的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也正是通过这一方式,电视剧相比原著小说更具有生活化的倾向:初入职场打拼的年轻女子,对亡妻念念不忘、雄心勃勃的商店掌舵人及其受到冷遇的恋人,这些俗套而不乏感情渲染的情节更容易打动电视观众。

对人物的增删及性格的切削也是电视剧改编中的特点之一。小说《妇女乐园》的主题是黛妮丝身上所表现的一个女子必须忠贞不渝的责任感以及对老板慕雷的热恋之间的对抗,而在《天堂一刻》中,重点是个人的能动性与选择^{[9]75}。因此,恋情故事始终处于电视剧情节的核心,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如埃德蒙与奥黛丽小姐的旧情、克拉哈对慕雷的依恋、波琳与山姆之间的微妙关系,

均被视为恋爱的插曲随时跟进,从而使得核心情节得以确立和变化。编剧在对原著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细节使整部作品一气呵成,很少出现不必要的停顿或间隔。角色被认为是故事情节中各类矛盾冲突的代表,电视剧中充塞着形形色色为编剧的“编码”意图所构建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不约而同地具有“悬念式”设计的效果,由他们所构建的部分剧情则放缓了故事的节奏。如作为商店经理的达德利、店内稽查乔纳斯,还有年轻的阿瑟,这些轮廓分明、有着鲜明性格的人物都和原著小说没有直接联系,但他们的出现为核心故事添枝加叶。此外,出于还原历史真实的目的,电视剧制作者们努力把人物放置在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市井画面中,突出年代特色。以剧中女性服饰为例,在天堂百货里所有女店员都身穿黑色连衣裙,同时配上短款黑色锦缎背心,脖子上饰有白色小领圈,部门负责人奥黛丽小姐的服饰则是深紫色。与这种朴素但得体的职业服装相比,天堂百货的顾客们,尤其是来自上流社会的贵妇小姐们的服装色调则相对较浅,色彩更鲜艳也更华丽,配饰也更丰富。这种凸显女性人物身份差异的服装设计与餐厅里的座位一样,时刻提醒观众留意时代的特点。

相比小说中以百货公司与数家旧式小商店为主要活动舞台,电视剧《天堂一刻》弱化了他们之间的各种矛盾,那些为增加企业实力、垄断市场、挤垮竞争对手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几乎都被舍弃,只增加了一些隐形的、颇为温和的商业竞争,同时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时代特点与发展风貌。此外,电视剧还利用故事化的情节构建形式,将人物日常经历涉及的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家庭与社会等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通过“住在里面”让工作和家庭不断重叠,通过不同角色的观点呈现“多重认同”,让肥皂剧主要特征即“对人际关系、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强调”与职场剧共存^{[9]168}。这部表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北部城市生活的电视剧同样涉及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兴趣。《天堂一刻》的制片人西蒙·刘易斯(Simon Lewis)在被问及该剧与其他古装剧相比有何“优势”时提道:“我认为很多价值观都相当现代。我们为它打造了一个非常奢华的布景,但实际上角色们所面临的很多动态都非常现代。”^[12]显然,电视剧《天堂一刻》更愿意讲述那些容易让观众们产生共鸣或认同感的文化与社会问题,如

消费文化悄然兴起之时的社会发展状态、金钱关系、性别问题、社会矛盾等。

三、“美好的旧时光”

尽管电视剧《天堂一刻》在播放之初收获了不少好评,但也有一些左拉小说的忠实读者对改编电视剧表达了“控诉”与失望,他们无法认同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剧本经过编剧的大量增删,而是它迎合当代观众的种种尝试。《天堂一刻》的制作明显受到《塞尔福里奇先生》(*Mr. Selfridge*)播出的影响。在同一时间段内出现在英国电视上的两部古装剧,都提供了传统百货公司作为一种不寻常的壮观景象类型,是值得注意的^{[3]130}。随后,在《天堂一刻》第二季中,天堂百货内部过多的权力争斗的描写渐渐拉远了电视剧与左拉原著的距离。随着创作的推进,编剧完全抛弃了小说原有的那些带有自然主义特色的部分,从而进入一个属于电视剧的别样世界。

左拉有一种把法国生活的最根本方面深刻而生动地描写出来的伟大本领,小说《妇女乐园》是一部由许多细节和60来个人物的活动构成的^{[4]346}作品。因此,虽然电视剧《天堂一刻》以松散改编的手法改变了小说《妇女乐园》的基调,但电视剧中的情节与人物形象还是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13]。《天堂一刻》针对的是观众们更感兴趣的对“美好的旧时光”的怀念,尤其是在当今数字化背景下的零售业转型时期。观众们在某种程度上跟黛妮丝一样,“感觉到自己被投入了一股势不可挡且不断加速的洪流之中”^{[14]169},只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经济“怪物”如今走到了穷途末路。因此,在电视剧中所表现出来的怀旧冲动,表面上看起来无外乎维多利亚时代服饰下的爱情与争斗情节,其核心思想是将现下描写为往昔一度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腐朽崩坏的时代^{[14]169}。从实质上看,具有这类节目观剧习惯的观众很容易被卷入剧情,与此同时连续剧为观众建构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提供了巨大空间,而且足够符合观众的接受形式,使他们能接受那些常常是非常规内容的节目信息^[15]。

比较左拉小说与电视剧中有关角色编码的差异性,可以发现电视文本构建的矛盾冲突主线更

贴近道德生活,这一点会很容易影响到观众们对这些角色的理解。这部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电视剧除了肥皂剧元素外,还借鉴了“小姐电影”(chick flicks)类型风格作品,并且有意识地针对道德与社会问题。“小姐电影”及其相关的“小姐文化”是一种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象,这一现象既反映又促进了女性在流行文化中的新视野^{[16]2}。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小姐电影”说明、反映和展现了与后女性主义美学相关的所有文化特征:女性气质回归、浪漫爱恋至上、女孩权力、关注女性的快乐以及乐趣,还包括消费文化和少女商品的价值^{[16]4};同时在这类轻松浪漫的电影中,男性往往充当配角。进入21世纪之后,“小姐电影”的影响力依然不减,时常会以女性都市时尚爱情故事的面貌出现在电影电视作品中。电视剧《天堂一刻》并未像一般的“小姐电影”一样呈现出女性主义特色,但与左拉小说一样,强调了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时代女性可以和男性平起平坐。小说主人公黛妮丝独立自强,同时追求自由爱情,这个富有想象力、讨人喜欢、有同情心的人物非常符合当今世界女性平权思潮和独立自主的女性审美趋势下的独立女性形象。黛妮丝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获得的成功,包括在职场和爱情两方面的欢喜结局,很容易让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在角色代入中获得想象性满足。除了核心人物黛妮丝之外,在角色设置上,电视剧还借鉴“小姐电影”中时常出现的对应性角色,如开朗的波琳或是有嫉妒心与算计心的克拉哈,她们的配角形象有效填充了电视剧中女主角人物塑造的单一性,全面展示天堂百货女店员身上的都市女性特质,从而引起不同观众的关注与共鸣,达到对目标观众尽量全面覆盖的目的。

与“小姐电影”中女性理想化角色不同的是,男性角色常常被塑造为外表光鲜亮丽实则有缺陷的形象,并逐渐成为女性角色的陪衬、被“凝视”的客体或亟待女主角拯救的对象。在左拉小说中,黛妮丝从来就不是主人公慕雷的附庸、被物化的“他者”,在电视剧中则成为更为重要的主体,同时成为时代图景和消费文化勃兴的代言人,给电视观众带来观赏的愉悦感。与之相对应的是,电视剧中几乎所有重要男性角色都有严重的缺陷,他们的不良行为在故事中被容忍,而聪明、可爱的女人则超越了这些。按照左拉的描述,慕雷应该有行政管理的天赋、征服者的冷静,“像一个诗人一样钻到

投机里面去,他那么好虚荣,那么急于扩张,以致他脚下的一切似乎都动摇起来”^{[2]28}。但是在改编电视剧中,他从一开始就在对凯瑟琳的爱恋态度中表现出暧昧与自私的一面,这与他在小说中的对待女人的“假装迷恋”“轻蔑”和“渺小感”都相去甚远。此外,电视剧第二季中出现的凯瑟琳的丈夫退役军官姆·韦斯顿,被有意刻画成冷酷专横、情绪压抑,甚至有些残忍的形象,属于亟待拯救的男性角色类型。唯一的例外是已婚的商店经理达德利,他的温和善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即便如此,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胆怯与恐惧同样使其形象大打折扣。

作为一部经典小说改编与肥皂剧的混合作品^{[9]67},《天堂一刻》在保留某些全景式视野和历史背景的同时,在改编过程中有意识地遮蔽了左拉原著小说中自然主义成分,尤其是在表现欲望主题的内容方面,而这恰是左拉作品的显著特征。小说《妇女乐园》中写了左拉想写的东西:赞美力量、斗争,甚至是冷酷,淹没了他自身极度的焦虑,在文学的虚构中他安放了这些时不时受到压抑的幻想和欲望^{[17]424}。左拉给他的百货公司取的名字证明了这种看似理性的商业交易背后的情欲本质,但左拉在小说中想要表现的欲望主题并不仅限于此,它会延伸到店员们的业余生活、地下室的轮班就餐,还有在升迁与裁员压力之下的明争暗斗等。对诱惑的描写盘旋于《妇女乐园》中:观点是诱人的,甚至销售价格、广告和表演都是诱人的,重要的是,慕雷在这些方面是公认的大师^{[17]425}。对于这一类带有视觉刺激的内容,爱森斯坦曾经引用小说《妇女乐园》中“白布料展销”的场面作为文学方面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声画交响乐的范例^{[18]526}，“在这种像是从裂开的盒子偶然落出来的显然无秩序的织物中间,是有一种谐和的节奏,白色在它的一切调子里追随着发展着,它随同一个大师的遁走曲的复杂演奏法降生了”^{[2]346}。这一惊人的、具有深刻音乐性和电影性的特点^{[18]528},确实很难在影视改编中加以表现,但在《天堂一刻》中,几乎所有在小说中以节奏、速度、色彩、质地和声音而引人入胜的惊人交响乐都被收进电视剧的片头:在音乐声中,各种身体特写与时尚配饰呈现在观众面前,孔雀羽毛的装饰、琳琅满目的珠宝、手腕上的袖扣、戴上精致项链的脖颈、颈背镜子里的眼睛、喷着香水的手、丝绸连衣裙与盘好的发髻,同时还有各色礼帽、掏出的怀表以及孔雀图案的彩色玻璃

窗等等。而当电视剧正式开场时,这一切似乎消失不见了,只有在某些有限的场景下,通过跟拍镜头对天堂百货的货品、陈列或布料进行细节展示。取而代之的多余情节就像是迎合观众而刻意编造的,如暗流涌动而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商战、第二季中热门侦探连载小说与商业的结合、过于喧嚣而做作的餐厅,以及为追求感官刺激而故意营造出来的视觉效果等。这样一来,左拉原著中洋溢着的热情和颤栗、痴迷和抒情^{[18]584}在改编中被彻底替代了。

结 语

把文学作品转换成视觉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真情实感与引人振奋的活动,而且也是一种艺术冒险。当改编者尊重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度与复杂性,而且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渗透进作者的意图中,甚至把自己的理解评注寓于这部作品时,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颖独特的艺术品^[19]。然而,对左拉长篇小说的改编则需要一个更复杂,有时甚至是十分棘手的布局计谋。阿纳托尔·法朗士曾经评价左拉在创作过程中以“艺术家苍蝇般的复眼产生出极为荒诞的印象;由于这个特征,一切事物在他眼里都增多了,仿佛他是透过多棱水晶看的”^{[20]241}。《妇女乐园》中有很多成为小说家创造巴黎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印象描写:大雨中黑暗而又静寂的城市、早晨和晚间成千职工在盖容广场上列成长长的一排出出进进、冬夏季商品大倾销的光彩场景,还有妇女乐园新店揭幕前月光照耀下黑影憧憧的工作情景和工人們的喧哗声等。这些描写往往吸引读者却有碍情节的发展,诸多细枝末节的描述则让叙事节奏显得拖沓累赘。在左拉看来,这些描写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他努力通过这些描写来反映生活的真实内容,反映日常生活的特点和特征以及说明社会进程的事实和事件。他想成为而且确实成了这个社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20]241}。但在电视剧中,导演和编剧极力尝试把小说家那些基本是内省般的体察转换成画面,结果有些视觉上撩拨人心的东西却缺乏作为小说生命的理性方面的深刻程度^[21]。因此,电视剧《天堂一刻》并不是对左拉小说的忠实改编——这一点从该剧的第一集就很清楚了^{[3]132},而是把激发其灵感的故事情节及人物以观众最熟悉的方式重新编

码,形成一个混合了戏剧性、浪漫张力和时代特征的故事。虽然《天堂一刻》只播放了两季,最终以一个颇为平淡的音符结束,但它带着对左拉小说富于英国特色的改编构思,满足了电视观众在荧屏上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也引起了当代人的共鸣。

参考文献:

- [1] BROWN F. Zola: a life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5: 491.
- [2] 左拉. 妇女乐园 [M]. 侍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3] GRACE T, JAMIESON G. Curdled milk for the masses: The Paradise, Mr Selfridge and the seductive spectacle of the department store [J]. Film, Fashion & Consumption, 2014, 3(2).
- [4] 左拉. 左拉文学书简 [M]. 吴岳添,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 [5] COX P. Shop girls, social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J]. Revista Brasileira de História, 2017, 37(75): 10.
- [6] 拉努. 左拉 [M]. 马中林, 译. 郑州: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 276.
- [7] 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M]. 2版. 吴子枫,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77.
- [8] TELEVISIONARY. Alpha and omega: writer Bill Gallagher discusses the end of AMC's "The Prisoner" [EB/OL]. (2009-11-18) [2024-01-03]. <http://www.televisionaryblog.com/2009/11/prisoner-alpha-and-omega.html>.
- [9] POORE B. Never-ending stories? The Paradise and the period drama series [C] // LEGGOTT J, TADDEO J A.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British costume drama television from The Forsyte saga to Downton Abbe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 [10] HOGG C. Adapting television drama: theory and industr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116.
- [11] 维诺克. 自由的声音 [M]. 吕一民, 沈衡, 顾杭,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9: 660.
- [12] WRIGHT A. This wonderful commercial machine: gender, class, and the pleasures and spectacle of shopping in The Paradise and Mr. Selfridge [C] // LEGGOTT J, TADDEO J A.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British costume drama television from The Forsyte saga to Downton Abbe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237.
- [13] 霍尔. 编码, 解码 [M]. 王广州, 译 // 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47.
- [14] 史莱. 怀旧 4.0? 现代化、落伍及回顾往昔 [C]. 郭婧, 译 // 郑春荣, 豪斯泰因.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数字化进程.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
- [15] 利文斯通. 理解电视: 受众解读的心理学 [M]. 2版. 龙耘,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175.
- [16] FERRISS S, YOUNG M. Chick flicks: contemporary women at the movi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7]盖伊·布尔乔亚经验2:黑衣爱神[M].赵勇,李霞,周定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18]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19]奥茨.从文学作品到电视屏幕[J].张讴,摘译.电视文艺,1983

(10):61-63.

[20]苏奇科夫.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M].傅仲选,徐继忠,袁振武,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

[21]赛尔夫.电视剧导论:类型与媒介[J].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3(4):90-127.

On British TV Series *The Paradise's* Loose Adaptation of Zola's *Au Bonheur des Dames*

W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TV series *The Paradise* (2012—2013) draws inspiration from Émile Zola's novel *Au Bonheur des Dames* and reappears the era that emerged in the mid- and late 19th century after the birth of modern retailing in loose adaptation. *The Paradise* retains the basic plot and characters from Zola's novel and "recodes" the stories by virtue of the soap-opera elements and the "chick movie" techniqu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The Paradise* caters to the contemporary audience and consciously conceals the elements of naturalism in Zola's original work, particularly in the portrayal of desire, which highlights the theme of nostalgia for the "good old days".

Keywords: *The Paradise*; *Au Bonheur des Dames*; British TV series; novel; loose adaptation

(上接第39页)

A Study on the Global Transmission of Hanshan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omics

Zhou 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poetry of Hanshan serves as a successful paradigm for Chinese culture to go global. The harmony cultural values embodied in Hanshan's poetry is the spiritual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moting the global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the use of Culturomics perspectives and corpus colloc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impact of Hanshan culture globally. By analyzing high-frequency collocates of "Hanshan" in Web Corp corpus, delving into the text context and mining the discourse patter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lobal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Hanshan culture while identifying effective ways for promoting it, thus helping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lobally.

Keywords: Hanshan culture; global transmission; Culturomics; corpus

何为“诗的内容”？

——雅各布森隐喻和转喻理论视野下的废名诗论探析

徐旭敏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废名提出新诗成立的立足点是“诗的内容”。借用雅各布森隐喻和转喻理论来阐释,“诗的内容”即是在诗歌的意义展开方式上以隐喻性原则为主导,令诗歌内涵呈现多义性和含混性特征,由此来达成诗意。废名还梳理和反思了旧诗传统,认为旧诗成立的理据是“诗的文字”,“诗的文字”指旧诗的格律形式。至于旧诗的内容,废名认为是散文的,即旧诗的意义展开方式是转喻式的,符合逻辑和叙事的连贯性,可以改写成散文。在新诗讲义中,废名把以“诗的内容”为新诗成立理据的观念,广泛地运用到新诗批评活动中。

关键词:废名;新诗;诗的内容;雅各布森;隐喻;转喻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10

1936年废名在北大讲授新诗,讲到《沫若诗集》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废名回黄梅故乡而中断。废名新诗讲义经黄雨整理、周作人写序,以《谈新诗》的名称于1944年11月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1940年秋至1941年春,废名好友朱英诞在北平沦陷区接续废名讲新诗,使用废名留下的讲义并继续撰写新诗讲义20篇。1946年废名回到北平,又续写了4篇新诗评论。废名的新诗讲义和朱英诞续写的讲义,加上废名1946年回北平后写的4篇新诗评论,经由陈均编订,以《新诗讲稿》的名字正式出版,涵纳了废名最主要的新诗理论和批评成果。

废名对新诗十分重视,他曾说过:“非得真我们的新诗出现,我们的新文学才最有意义。”^[1]可见他对新诗的关注不单是出于爱好,更是将新诗探索视为厘清新文学基质的重要工作。新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确实很特殊,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尝试”是从新诗入手的,“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也大多在新诗领域“敲过边鼓”。同时新诗也是新文学中争议最大,在学习传统和学习西方间纠

葛最多的文体。新诗的成功与否关涉到在诗的国度中新文学能否自立的问题。从西方文艺理论来看,诗占据着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将作品视为文学本体的“新批评”派,他们的文学探讨几乎等于诗的探讨,并认为处于诗对立面文体是散文。赵毅衡认为,这是因为在“新批评”派看来诗是“文学特异性”最完备的体裁,“文学文体和科学文体实际上没有明确分界,有各种中介文类,组成一条连续的光谱,诗处于文学性最强的这一端。因此无论诗辩的对立面是科学文体还是所有的散文,辩护对象依然是文学特异性”^[2]。这个观点似乎也能说明新诗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新诗尽管不是新文学中成绩最大的,但确实是“文学特异性”最强、最能表征新文学的文学基质的体裁。所以,废名对新诗的重视是很有见地的,其新诗理论既是在新诗领域的思考成果,也关系到新文学发展道路的整体构想。

一、“真的新诗”在于“诗的内容”

废名对新诗的探讨,从何为“真的新诗”入手

思考,提出了新诗立足的合法性基础在于“诗的内容”:“我们的新诗首先要看我们的新诗的内容,形式问题还在其次。”^{[1]6}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最大的区别是新诗成立的理据改变了,新诗的合法性落在“诗的内容”上,语言则要变成“散文的文字”。旧诗在废名看来是“诗的文字”搭配“散文的内容”,其成立的根据是落在“诗的文字”上:“如果要作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3]12}“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而其文字则是诗的文字,旧诗之诗的价值便在这两层关系。”^{[3]14}“我尝想,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4]27}新诗成立的依据是“诗的内容”,相较而言旧诗的立足点是“诗的文字”,所以厘清“诗的内容”和“诗的文字”的概念内涵是理解废名诗论的关键,特别是理解何为“诗的内容”,是把握废名的新诗理念以及对新诗建构道路的设想的核心。不过废名虽然提出“诗的内容”,但并未直接定义过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是将关于“诗的内容”的思考分散在具体的新诗批评中。以往的研究对废名“诗的内容”的观点有过探讨,但因为废名本人说法的模糊性,学者的解释也大多从感觉、情感、意象等解诗的一般维度入手,依旧是相对含混的。以“新批评”派的视角看,“诗的内容”是属于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中的作品层面的,所以还是要在文本维度对废名“诗的内容”的内核加以更精确的定义。引入西方符号学理论里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双轴理论,把废名诗论里的闪光点 and 创造性从模糊和即兴的表达中挖掘出来,用理论将它们更清楚地表述出来,这样就能够在更积极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废名的诗论。

雅各布森在论文《语言的两面性和两种失语症》中提出语言的两种最基本的结构模式,即“选择”与“组合”。“选择”是言语在其位置上的相似性,或者说可替换性,在语义轴上某个语词的使用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有其他相似的语词可以替换,构成这一位置上潜在的语词库。“组合”是根据“邻近性”原则对语词加以排序组合,组织成可以理解的话语。“选择”即“相似性”原则体现了语言的隐喻性功能;“组合”即“邻近性”原则体现了语言的转喻性功能。隐喻和转喻构成语言的两

极,话语展开是沿着隐喻轴和转喻轴推进的。在话语中隐喻和转喻功能同时起作用,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中的其中一种会取得优先级^[5]。雅各布森在《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进一步分析语言的诗式功能,指出语言的诗式功能是语言指向本身即符号自指,而语言诗式功能的获得则是通过把相似性(隐喻性)原则从选择轴的构造活动,投射或扩大到组合轴的构造活动中,也就是说,原本以邻近性(转喻性)为原则的组合轴的语言构造,也变成了依照相似性(隐喻性)原则来组合,相似性(隐喻性)成为诗歌文本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语言结构方式^[6]。雅各布森举的实例是诗歌的音韵、语调、词序等层面,这些方面构成了西洋诗的格律,雅各布森认为诗歌的格律正好能说明诗歌语言是以相似性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旧诗也是如此,废名指出旧诗成立的理据在于“诗的文字”。何为“诗的文字”?在废名那里“诗的文字”和“散文的文字”是相对照的一组概念。新诗要用“散文的文字”,也就是新诗是自由诗:“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3]13}在这一点上废名认同胡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的“诗体大解放”理念^{[3]12-13}。由新诗的“散文的文字”可推出废名认为的旧诗的“诗的文字”就是指旧诗有格律、平仄、对偶、长短等规则的诗体形式。旧诗的语言就是在符合一定的格律、平仄、对偶等原则的语词库中,选择合适的语词来组成语句,最终形成一首旧诗。借用雅各布森的理论来表述,这正是一种以相似性或者说可替换性原则来组织语词的模式。比如对偶,是把具有相似特征的语词在相应的位置上对举,来形成对照关系;比如押韵,押韵的语词是在一定的用韵规则下,在某一韵的固定的语词库中进行选择,并且该语词可以和同一韵中的其他语词相互替换。所以旧诗的形式体现雅各布森认为的语言诗式功能,即相似性(隐喻性)原则在诗歌语言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废名用“诗的文字”来描述旧诗的格律形式,和雅各布森用语言的诗式功能来作相应描述,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与旧诗“诗的文字”相对,废名认为新诗要变成“散文的文字”,也就是说新诗要跳出形式的束缚。一首新诗全然是诗意的产物,没有勉强为之的痕迹,这样的新诗就是整个的、完全的。所以废名主张新诗要是自由诗,不能再进入旧诗那样的形

式拘束中。除了“分行”，废名认为新诗形式上别无规定，此乃新诗最大的自由。用雅各布森的理论来表述，新诗从格律形式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在新诗语言的组合方式上放弃相似性（隐喻性）原则，即新诗语言的诗式功能不再通过把相似性（隐喻性）原则投射到语词在组合轴上的构造活动来达成。如此新诗就要从别处去寻求诗式功能的达成，而废名的理论重点正是在于将新诗成立的理据从“诗的文字”转移到“诗的内容”上，就是说新诗要以“诗的内容”取代“诗的文字”来获得诗式功能的达成。根据雅各布森的理论，语言的诗式功能表现为相似性（隐喻性）原则在语义轴上占有主导地位，而这个原则落在“诗的内容”即诗歌的情感表现、意义展开等层面上。这就可以理解为废名理想中的具有“诗的内容”的新诗是在诗歌的意义展开方式上以相似性（隐喻性）原则为主导来达成语言的诗式功能（诗歌的诗意），而旧诗是通过在语词组合方式上以相似性（隐喻性）原则为主导来达成语言的诗式功能（诗的文字）。所以废名认为“诗的内容”是新诗成立的理据，“诗的文字”是旧诗成立的理据。进一步说，废名理想中的具有“诗的内容”的新诗，在意义展开方式上体现出相似性（隐喻性）原则，即体现出语义的相似性和多重性的隐喻功能。这可以解释为新诗的意义展开具有潜在的多义性（具有相似性的多重意义在可能性上并存）和含混性（因多种相似性的意义并存以及相互交织带来表达的含混）特征，这些特征令新诗语言的诗式功能得以达成。

二、“诗的内容”与“散文的内容”的区别

废名认为“诗的内容”是新诗成立的理据，而旧诗成立的理据是“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在雅各布森的理论中，“散文”是倾向于以“邻近性”原则为主导把语词组合起来的文体，邻近性原则意指按逻辑次序对语词加以排序组合，构造成可以理解的话语，体现出语言的转喻性功能。废名认为旧诗是“散文的内容”，意为旧诗在意义展开方式上是有逻辑的、可清晰理解的。对此废名以《枫桥夜泊》中诗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为例，废名认为这两句之所以为诗，只因为在文法上和散文不一样而已，也就是其“诗的文字”

令读者仿佛进入旧诗境界里去了，其内容则完全可以用散文的文法另外写出来^{[3]13}。运用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来分析这个诗例，“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城外”是“寒山寺”的方位定语，“寒山寺”是“钟声”的发出方，“夜半”表明时间，而“钟声”的接收方是“客船”。时间、地点、动作、动作发出方和接收方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两句诗除了语法上确实和散文不同，表达的意义完全符合逻辑和叙事的连贯性，体现出以邻近性（转喻性）原则为主导的特征，也就是将围绕事件展开的相邻语词在组合轴上组织起来，构成意义明晰的逻辑性的表达。《枫桥夜泊》的意境和经验世界是融洽无间的，贴近传统“得意忘言”的诗学理想。在这种诗学理想中，读者领会到诗人传达的意境后，“言”就不再受到关注，或者说“言”完全融入“意”中而被自然忘却，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由此可知废名认为旧诗是“散文的内容”，是在旧诗的美学理想层面谈的，理想的旧诗呈现与经验世界融洽无间的自然境界，诗歌意义的展开通常合于逻辑和叙事连贯性。用雅各布森的理论来表述，这正是体现了语言转喻性功能的散文倾向。

废名提出的“诗的内容”概念，借用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可以大体理解为诗歌的意义展开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特征。废名认为这是新诗成立的理据，同时废名也指出，旧诗中有少数具有“诗的内容”的诗，在旧诗中比较另类，比如李商隐诗。在此把李商隐诗《东南》和《枫桥夜泊》作比较，分析在“诗的文字”的相同条件下“诗的内容”和“散文的内容”有何差异。废名列举分析过李商隐的《东南》一诗：“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废名解读此诗说：“这首诗是即景生情，望着远远的太阳想到什么人去了，大约真是天涯一望断人肠，于是诗人就做起诗来。诗意是说，追太阳去是不行的，——这是望了今天的太阳而逗起的心事，于是又想到明天早晨‘日出东南隅’，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儿，太阳每天早晨都照着她罢！这首诗简直是由一个夕阳而变为一个朝阳，最不可及，然而读者容易当作胡乱用典故的旧诗，这样的诗的内容旧诗实在装不下，结果这首旧诗好像文胜质，其实它的质很重。”^{[4]28}依照废名的理解，诗人当时望着天上的太阳而触发对远方某个人（爱人）的思念，诗人又由此联想到《陌上桑》中的“日出东南隅”，于是借用《陌上桑》的典故，以“罗敷”喻指自己心中

思念的那个人。通过分析可知诗人的诗思经由当下情境触发,过程中有好几道联想,压缩在这简短的四句中。“乌”无疑是全诗中心意象,在此有几重内涵:首先“乌”喻指太阳,是用了古代神话相传日中有三足乌的典故,并进一步联想到古代神话中御日的羲和;其次,诗人联想到《陌上桑》中的“日出东南隅”,即由眼前的“乌”联想到诗歌文化历史中的“乌”,不过经由诗人想象,《陌上桑》的典故又被“还原”为字面意义上的太阳从东南方升起的具体场景,诗人用《陌上桑》中的罗敷来意指心中思念的人。在诗人的想象中,每天早晨太阳从东南方升起,照着他心中思念的人,于是“乌”又成为寄托诗人思念的情感意象。相较于《枫桥夜泊》中意义是以转喻方式连贯地展开的,《东南》一诗里意义结构方式则是围绕着核心意象“乌”。诗人赋予“乌”这一意象多重含义,在不同含义之间转换而生成诗意,这是典型的遵循相似性原则的隐喻性结构方式,诗歌意义体现出多义性和含混性,符合废名认为的“诗的内容”。然而废名指出,李商隐这类诗其“诗的内容”包裹在旧诗的形式里反而不相称,“读之反觉其文胜质,他的内容失掉了”^[17]。比如《东南》这首诗因为包裹在旧诗形式中,难以让读者理解到诗中的用典实际是诗人想象的一种展开方式,而是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用典,并且因为这首诗的内容被压缩到绝句形式中,诗意装不下,显出一种阻滞感,反而会被读者归到胡乱用典造成意义晦涩的坏诗中去。所以废名认为旧诗的形式(“诗的文字”)是与“诗的内容”相违碍的,旧诗形式束缚了“诗的内容”,在旧诗形式下反而应该是“散文的内容”,才构成旧诗美学理想中的好诗。与之相对,“真的新诗”立足于“诗的内容”,就势必要从格律形式(“诗的文字”)中解放出来,变成自由诗即“散文的文字”,才能与“诗的内容”匹配。综上所述,通过梳理和反思旧诗传统,废名建构起以“诗的内容”为理据的新诗理念,在新诗讲义中,他广泛地运用这一原则来展开新诗批评活动。

三、“诗的内容”理念下的 新诗批评活动

废名将其“诗的内容”的新诗理念融入对新诗作品的具体批评中。新诗创作的开端是《尝试集》,而废名从中选的诗就是胡适那首著名的也广受争

议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废名说第一次接触《蝴蝶》这首诗,还是在武昌读书时期。他的语文教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师从黄侃,反对新文学,故而将这首诗作为反面例子提出来,同时对“枯藤老树昏鸦”等旧诗(曲)大加称赞。这应该是废名初次接触到新文学,待到他写新诗讲稿再来回忆这件事时,认为《蝴蝶》“算得一首新诗,而‘枯藤老树’是旧诗的滥调而已”,原因是废名认为“枯藤老树”里除了调子以外不见作者的性情,而《蝴蝶》里则有“诗的内容”,仿佛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4]25-26}。胡适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里记录写《蝴蝶》这首诗时的心境,当时因提倡白话文学而不被同伴们理解,颇有点寂寞感,某一日看到一对黄蝴蝶飞舞的情景,引动这一点感触,写下了这首白话小诗^[7]。废名结合胡适的自述进一步解释说:“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4]27}如果结合废名讲的李商隐诗《东南》,就可以发现两首诗都因一个偶然的情景(偶然看见太阳或蝴蝶)引动诗人写诗的情绪,诗人的创作情绪都是当下产生的,诗歌意义则都是围绕一个核心意象(“乌”或“蝴蝶”)展开。而二者的区别是,《东南》压缩在旧诗形式里,诗人的想象和联想还要借由典故来完成;《蝴蝶》是白话诗,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旧诗形式,但在体制和语言上都比前者有更大自由,无须借用典故就能直接抒写诗人当下的联想和感触。故而《东南》在一般读旧诗的读者那里,反而会被误以为是胡乱用典的晦涩诗,《蝴蝶》则是诗的情绪和诗的形式解放。所以废名认为在旧诗形式里装不下的“诗的内容”在新诗里则装得下,这就要求新诗从格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废名理想中的新诗形式上应是“散文的文字”,也即是自由体诗。

再以冰心的诗为例,她的诗属于废名所认为的新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新诗已经为大家普遍承认。“天下的诗人已经是要作诗就作新诗了,

于是旧诗也换掉了他的敌人面目,反而与新诗有了交情了,这一来做新诗的人乃更是自由,他们固然不做旧诗,但他们做新诗的时候却尽管采用旧诗的词句了。”^{[8]114}废名认为冰心的诗就是如此,诗人的古典修养不自觉地进入她的新诗而并不妨碍这些诗依旧是新诗,因为里面本有“诗”在。相反初期白话新诗中“诗的内容”尚未站住脚跟,尽管那时的诗人花很大力气用白话作诗,但作出来的大多是白话韵文。废名分析了冰心《春水》中的第一五五首:

病后的树阴
也比从前浓郁了,
开花的枝头,
却有小小的果儿结着。
我们只是改个庞儿相见呵!

他分析这首诗里的诗情,大约是女诗人看见什么果树,从前看的时候还盛开着花,后来诗人病了,有好久不见,等病好了再出来看见树,树叶子都很茂盛,而花儿也已经是“小小的果儿”了,于是当下诗人很喜悦,说:“我们只是改个庞儿相见呵!”废名认为“这首诗实在是相见之下很快的得着了一首好诗”^{[8]116-117}。从废名举例的几首诗可以看出,废名欣赏一种当下直感式的诗情,并以自由的形式将这种诗的情绪捕捉住,来完成一首诗。然而旧诗里即兴式的感悟也很多,这样说来,此类新诗与旧诗的区别何在?废名接下来就举了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废名认为冰心的诗是新诗,李清照则是旧诗写法,因为“绿肥红瘦”四个字好像与读者隔了好些距离,而冰心的诗则如当下相见。废名称“旧诗大约是由平常格物来的,新诗每每来自意料之外,即是说当下观物”,而两首诗里“新诗与旧诗的性质之不同又在同一个题材上面分别出来了,又是一件有趣的事”^{[8]117}。这里两首小诗的比较很有意义,李清照和冰心的诗情都是即兴式的,诗情上是“偶合”了,但因为写法的不同而有旧诗和新诗的区别,也即是废名认为有“散文的内容”和“诗的内容”的区别。“绿肥红瘦”表现的是雨后花残叶肥这一大自然的普遍性规律,即废名说和读者隔了距离,是“格物”,并不一定是当下诗人的直感。没有此情此景,诗人也可以这么写,而表现事物普遍之现象规律正是倾向于逻辑性和连贯性的转喻形式。冰心的小诗则保留了诗人当下的一种原初直感。这种直感是前逻辑的、非连贯性的,是尚未上

升到普遍规律层面的私人感觉。这令人联想到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作家的私人感觉和经验受某件事物、某处细节触发而被唤起,在这最初的启动中,外部情境和作家的私人感觉、经验之间构成一种平行的隐喻性关系^[9]。冰心的这首小诗也是如此。

废名在1946年回北平以后续写的4篇新诗评论里,最后是以讲解自己的新诗来收束的。这表明了其对自己的新诗理论和创作的一种认可和自信,认为自己的新诗可以代表新诗写法里一条光明道路。例如废名谈到《海》这首诗: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废名说“拙作恰是新诗的境界,海与花会联在一起,一个大海,一朵花,仿佛池塘生春草似的”^[10]。此诗有意打破了日常的事理和秩序,而指向意念和想象层面,在想象的世界中“花”可以生长在“海”里。废名将之与“池塘生春草”比较,“春草”并不是真的由“池塘”“生”出来,但在诗人的感觉世界里大可以这么写。这样整首诗就展现了一种幻想境界,意象向我们直呈出来,但并非要指称或象征什么,“花”生长在“海”里是诗人想象的情境,带有明显的个人的“悟”的色彩。对于读者而言要准确理解其具体内涵是无法做到也并不必要的,在欣赏中只需要接收到诗人暗示的朦胧妙善的整体意境,获得一种审美的感受。在具体的解析中需要去分析的也不是这些意象背后的含义,而是这首诗在写法上如何模糊所指,阻止意义的连贯性,并通过将意象以纯粹幻想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有个人风格的意境。正如废名对李商隐的欣赏,李商隐的无题诗与废名这首《海》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模糊诗歌意义的明晰性,而以私人性想象选择和结构意象,创造出具有幻想意味的个人化意境。诗人的感觉、幻想与诗歌意境之间就构成了整体上的隐喻关系,这是典型的以隐喻原则为主导的结构方式。废名称《海》所表现的“恰是新诗的境界”,表明这并不是偶然为之的风格,而是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的。

依照“诗的内容”观点对新诗作整体性回顾和

批评,废名在挑选出他所肯定的具有“诗的内容”的新诗的同时,也讲了新诗创作中的反面例子。废名认为新诗的失败之作是在形式上虽然分行,实际还是在用白话作白话韵文,其本质还是尚未认清何为“诗的内容”。在《新诗讲稿》中废名批评了康白情《草儿》集里的纪游诗,认为纪游诗如果用旧诗写还可以成诗,康白情则是“滥用写白话文的自由,因此这些纪游诗完全失败了”^{[11]92}。废名指出纪游诗在旧诗里可以成立,新诗里则不成,“这个事实又有关于新诗的发展”^{[11]93}。纪游题材是属于散文性质的,而旧诗有“诗的文字”,有韵律和节奏,所以可以将纪游题材加以定型而成为诗;新诗应该是“散文的文字”,所以真正要有“诗的内容”才能成诗,以白话写纪游诗则既无“诗的文字”的长处,也取消了“诗的内容”,只能是非诗非文的失败品。废名更进一步表示欲向民间歌谣借鉴也是新诗上的“歧路”,因为歌谣也有韵律和节奏,和旧诗的“诗的文字”在性质上是接近的,其长处都在于“文字的音乐”,但这一长处不属于新诗,若在白话新诗里也想复现旧诗和歌谣里的音乐感,只能是取消了新诗本身^{[11]97}。

结 语

废名提出“诗的内容”是新诗成立理据,这一观点贯穿其新诗批评和新诗创作实践。本文用雅各布森隐喻和转喻理论来阐释废名诗论中“诗的

内容”的理论内核,借用“他山之石”,尝试将废名诗论中的闪光点和创造性从即兴和感性的表达中挖掘出来,在理论层面进行清晰表述,以期开拓废名新诗研究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废名.新诗问答[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引13.
- [3]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废名.尝试集[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5]JAKOBSON R.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language in literature[M].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9-110.
- [6]雅各布森.语言学与诗学[M]//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80-182.
- [7]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M]//何卓恩.胡适文集:自述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227.
- [8]废名.冰心诗集[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9]洛奇,陈先荣.现代小说的语言:隐喻与转喻[J].文艺理论研究,1986(4):78.
- [10]废名.《妆台》及其他[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1.
- [11]废名.草儿[M]//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What Is "Poetic Content"?

—Analyzing Fei Ming's Ideas of New Poetry in the Theory of Jakobson's Metaphor and Metonymy

Xu Xu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Poetic content" is the core of new poetry Fei Ming considered. By applying Jakobson's theory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we can know "poetic content" means letting metaphor dominate the content of poem to form the ambiguity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imagery of poem to get poetic quality. Fei Ming also reflects on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reckons the core of classical poetry is "poetic language". Poetic language refers to the rules and forms of classical poetry. In Fei Ming's opinion, classical poetry's content is prose, which means the content of classical poetry is dominated by metonymy. It is logical and coherent, and can be rewritten into prose. In Fei Ming's lecture notes of new poetry, he widely implements this opinion into his new poetry criticisms.

Keywords: Fei Ming; new poetry; poetic content; Jakobson; metaphor; metonymy

拉丁精神和身份构建

——罗多《爱丽儿》的美洲主义构想

陈义山, 马翔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乌拉圭现代主义作家罗多在其哲学散文《爱丽儿》中,基于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人物情节,重新塑造了爱丽儿的形象,为其注入哲学涵义,并融入了他的美洲主义构想。罗多的美洲主义侧重文化层面,旨在构建现代拉丁美洲的文化身份。他通过对拉丁美洲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构思了一种融合古典美学、基督教传统和现代性的“拉丁精神”,来应对当时拉丁美洲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危机。《爱丽儿》及其美洲主义构想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追求文化独立的历史必然,促进了拉丁美洲人对自我价值的重估,并为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蓬勃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美洲主义;罗多;《爱丽儿》;拉丁精神;现代性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11

1815年,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提出了建立拉丁美洲国家联盟的美洲主义(Americanismo)^①构想。但他的宏伟蓝图没有实现,仿效欧洲制度建立的新生共和国未能迎来长久的稳定和繁荣,反而在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动荡中陷入了发展停滞。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拉丁美洲四分五裂,美洲主义理想渐行渐远。与此同时,美国借着门罗主义大举扩张,将新殖民主义的触手伸向拉丁美洲。美国资本的输入引发社会剧变,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瓦解了传统基督教社会形态,一时间拉丁美洲陷入精神迷惘和社会撕裂。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丽儿》应运而生,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在作品中指出,拉丁美洲人要重新认识自身价值、恪守民族传统文化。在扑朔迷离的时代洪流中,罗多用他的美洲主义构想指出了一条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

一、诞生于危机的《爱丽儿》

19世纪是拉丁美洲的独立纪元,也是危机纪

元。独立战争让美洲诞生了一些新的共和国,但这并不算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内核仍旧是欧洲的。正如阿根廷政治家阿尔贝蒂(Juan B. Alberdi)所言,欧洲是美洲文明的源头,英法等国取代原来的殖民帝国西班牙,欧洲力量继续影响美洲^[1]。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已经获得政治独立,但它们依然追随欧洲文化的轨迹,充当欧洲思想的试验田,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

在众多欧洲输入拉丁美洲的思想中,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实证主义。拉丁美洲在19世纪中叶开始盛行实证主义,许多国家依靠它来推进现代化进程。阿根廷实证主义政治家萨米恩托(Domingo F. Sarmiento)制定了国家现代化的两个基本国策:一是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用现代实证科学取

^① 美洲主义又称泛美主义(Pan-Americanism),最初由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提出,他主张建立统一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学界也称这种美洲主义为“拉丁美洲主义”(Latinoamericanism),以区分美国的“美洲主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提及的“美洲主义”均指拉丁美洲的美洲主义。

代经验主义思维;二是采用激进的移民政策,吸纳欧洲劳动力来扩大工业基础。实证主义教育瓦解了传统基督教伦理,它用自然科学来替代宗教信仰,使得社会过度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个体的精神需求。同时,大量涌入的欧洲移民愈加巩固了欧洲文化的根基,这不利于本土文化的塑造。

除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实用主义的传播也加剧了拉丁美洲的精神危机。美国通过门罗主义进行领土扩张和经济剥削,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随即在拉丁美洲渗透开来。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人的工具属性被过分强调,行为动机被极致物化,社会文化出现精神物质化和审美功利化的趋势。实用主义的扩散阶段基本和实证主义重合,乌拉圭史学家阿尔达奥(Aturo Ardao)认为拉丁美洲实证主义运动的高潮大致在1870—1911年^[2],恰好和门罗主义入侵的高峰时期(1898—1930年)相契合。

因此,19世纪末的拉丁美洲实际处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交叉影响下,这是一个秩序和理性压倒一切的时代。罗多指出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功利精神的泛滥”,虽然这两种思想在促进工业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卓有成效,但它们在文化层面却极具破坏力:一个颠覆了宗教伦理,一个摧毁了道德和审美,让人们在精神上陷入困境。罗多对狭隘功利主义提出了控诉,讽刺人们对事物“有用性”的狂热追求:他们以物质利益为唯一取向……对一切不受利益驱动的自由活动不屑一顾,并抱有错误观念;对一切超出直接目的性限制的、不以实用为表述的事物漠不关心^{[3]519}。可见,随着拉丁美洲拥抱现代化,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愈发暴露出其满足不了人们内在精神需求的缺点。尽管法国巴纳斯派的“为艺术而艺术”对工业文明提出了美学抗议,试图弥合现代人的精神裂缝,其思想也被引入拉丁美洲,但并不足以消除社会性的精神危机。精神迷惘和道德堕落——这是拉丁美洲一味接受外来思想、忽视自身文化塑造的结果。

1898年,拉丁美洲的社会危机到达顶峰。随着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落败,这个古老的帝国愈发跟不上现代世界的潮流,拉丁美洲面临“保留伊比利亚传统”或是“效仿美国模式”的历史选择。美国的崛起和西班牙的衰落形成强烈对比,西班牙代表的拉丁文明在与撒克逊文明的对话中落于下风。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是更为优秀的文明,纷纷呼吁去拉丁化(delatinización),一种崇拜美国的“北

方狂热”(nordomanía)^①盛极一时。

拉丁美洲的精英们是有危机意识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尝试应对这些社会危机。首先是对帝国主义的回应。阿根廷总统培尼亚(Roque Sáenz Peña)在1889年华盛顿举办的泛美大会上用“人类的美洲”回应了门罗主义狂妄的“美国人的美洲”^{[4]137};紧接着古巴诗人何塞·马蒂在1891年提出“两个美洲”的思想,用“我们的美洲”和“另一个美洲”形容两种文明的对立,两者“所相同的只有人类的基本特征”^[5]。其次是对外来思想的回应,这是《爱丽儿》的使命。罗多用《暴风雨》中的精灵爱丽儿来象征崇尚古典美学和人文主义的拉丁文化,以卡列班象征物质至上和审美庸俗化的美国文化。他研究了法国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对《暴风雨》的解读,勒南在《卡列班》(1877)(*Caliban*)中认为,卡列班象征一种平庸的民主政治,借助实证主义的力量成为国家的主人;罗多也参考了鲁文·达里奥的观点,后者在文章《卡列班的胜利》(1898)(*El triunfo de Calibán*)中,将美国描述为“野蛮人”、庸俗的物质文明和“拉丁血统的反对者”^{[4]135}。作为对欧洲实证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回应,罗多用爱丽儿与卡列班来隐喻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他认为虽然爱丽儿和卡列班曾经都是被欧洲公爵普洛斯帕罗征服的对象,但他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中,爱丽儿无法同卡列班抗衡,就像曾经辉煌的人文主义在工业文明的物质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现代化让拉丁美洲走向了精神狭隘和信仰迷失,让本应团结在玻利瓦尔理想下的拉丁美洲国家身陷囹圄、各自为战,这令罗多痛心疾首。他形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生活在“痛苦的隔绝之中”^{[4]47},其根源是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空间。为此,他在《爱丽儿》中大量论述了古典美学、宗教伦理和人文主义,揭示了它们对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的主导和塑造作用,并将它们凝聚成爱丽儿的形象特征,他希望将这些特征塑造为拉丁美洲人共同的文化价值。

作为对危机的回应,罗多笔下的爱丽儿具有进步意义——她是“功利”和“舒适”的反对者,是拉丁美洲文化的化身。西班牙学者阿贝兰(José

① 罗多提出的概念,指一种“去拉丁化的美洲”的政治倾向和以北美为“典范”的社会心理。

Luis Abellán)认为《爱丽儿》的象征是20世纪拉丁美洲所有思想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它隐含了一种文化上的“美洲观念”,并通过拉丁美洲人的团结性和独特性来表达这种观念^[6]。罗多认为,拉丁美洲应该继承拉丁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是构建拉丁美洲现代文化的基石。他试图通过塑造“爱丽儿”来解决“什么是拉丁美洲文化”“如何塑造民族文化”的问题,只有先弄清楚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什么,才能抵御外来思想的侵蚀。因此《爱丽儿》不仅展现了一个时代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的缩影,更被认为是第一个关于拉丁美洲人身份问题的构想^[7]。

事实上,罗多的“美洲观念”建立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上,即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理想,虽然它已经中断数十年,但是放在20世纪初的语境下,尤其在多重外部压迫和内部矛盾下,重提美洲主义的条件比当年更加成熟。罗多是个坚定的美洲主义者,他很少提及自己乌拉圭人的身份,而是以美洲人自居,他曾公开表达自己对玻利瓦尔的崇敬和对美洲主义理想的信念:

我还想与北美的帝国主义作斗争:拉丁美洲并没有从西班牙帝国中解放出来,而是陷入了盎撒人的扩张主义;我们各国与华盛顿的世界观是不同的;捍卫我们的特质、我们的个性,就是捍卫我们的独立。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可怜的祖国怎样才能从帝国主义手中拯救自己呢?只有玻利瓦尔的旗帜,也就是西班牙语美洲的团结。^[8]

与玻利瓦尔的政治美洲主义有所不同,罗多更期盼拉丁美洲人在文化和精神气质上实现统一。他笔下的“爱丽儿”形象凝结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整体特质——他称之为“拉丁精神”(espíritu latino),这一种自然和谐的人文主义。他借《爱丽儿》中的人物普洛斯帕罗之口道出了塑造拉丁精神的三个途径:模仿真善美、以非功利的道德理想来塑造自我、施行人文主义教育。罗多提出的拉丁精神是对物质主义最好的回应,它帮助拉丁美洲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强化原本十分薄弱的文化认同感。

二、文学传统中的身份构建

罗多提出拉丁精神旨在帮助拉丁美洲构建民族身份、强化文化认同,《爱丽儿》并非这方面的首

次表述。早在1893年,他就在《国家文学与社会科学杂志》(*Revista Nacional de Literatura y Ciencias Sociales*)中提出了“统一的文学大家园”(una sola y gran patria literaria)构想,他将普拉塔河流域各族人民的文学视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从那时起,他的美洲主义和单一民族观就已形成。他预言:“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了,但只是萌芽阶段。未来二十年的工作就是发展、完善和完成这一构想。”^[9]《爱丽儿》的出版标志着这些观念的成熟。罗多始终坚信,拉丁美洲必须立足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形成文化的自我认同。

罗多认为,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根植于自己的文学传统。19世纪9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析美洲文学的发展历程,探寻埋藏在文学传统中的独创性(originalidad)。他认为,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拉丁美洲文学开始塑造自己的个性,这些个性成为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象征。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identidad latinoamericana)可追溯至16世纪,西班牙裔美洲人不满于半岛人的残酷剥削,开始强调自己美洲人的身份。但这种出于经济利益的发声不足以构建民族层面的身份认同,对于现代拉丁美洲来说,文化认同是最坚实的纽带。

罗多从文学传统中看到了拉丁美洲文化的特征。他否认了殖民文学之于美洲的“正统地位”,他反对一些文人从殖民历史中寻求身份认同的行为。在他看来,殖民文学缺乏独创性,未能反映美洲的社会文化,因为殖民地剥夺了选择思想和表达情感的自发性,而真正的文学独创性应当源于自主精神、民族文化和自我认同^{[3]788-789}。罗多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阿根廷学者埃米利奥·卡里亚(Emilio Carilla)指出:“19世纪以前的美洲文学无法回避殖民地的本质——终究是西班牙在大洋彼岸的延伸。”^[10]法国人罗伯特·巴赞(Robert Bazin)认为:“民族文学诞生于政治独立的拉丁美洲,它的起点是19世纪初。”^[11]有“第二位哥伦布”之称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断言:“在殖民地,民族记忆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佩拉约和熙德的荣耀甚至渗透到了美洲的山脉和森林中。”^{[3]790}上述表明,独立运动前的美洲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复制品,既缺乏独创性的表达,也不能帮助美洲人构建身份认同。因此,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不应根植于殖民历史,在后殖民时代,拉丁美洲文学和文化应当是本

土的而非外来的,是独创的而非继承的。同样地,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不是“进口的”,而要在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探寻。

19世纪初,拉丁美洲本土作家的身份意识开始增强。罗多认为两个标志事件开启了这一趋势。一是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在美洲广受欢迎。这部小说激发了美洲诗人的创作灵感,在他们头脑中催生出一种“自然情节”,即拉丁美洲人对其所处环境的独特思想和情感反应。这部展现美洲地域风貌的小说向拉丁美洲提供了新的文学表现方法,也为罗多的美洲主义构想提供了文学内容:因为《阿达拉》是第一部以美洲地域性为特色的叙事作品,大自然洋溢的诗意被翻译成了人类的语言,大自然同人类情感和宗教伦理之间的联结,展现了美洲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国作家笔下,欧洲不再是“文明”的,美洲也不再是“野蛮”的,这破除了以往文学中美洲人总是以野蛮形象出现的旧传统,美洲人的身份认同开始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让美洲人得以重新认识自身文明的价值。二是洪堡的南美之旅^①。这位德国科学家对美洲进行了第二次发现,他对美洲自然环境的考察研究激发了拉丁美洲人重新认识祖国的热情,他们中不乏像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这样的伟大作家^②。罗多认为,夏多布里昂和洪堡几乎同时将美洲的自然风光化为美洲诗人最生动、最原始的灵感来源。他对拉丁美洲文学中的这种“自然情节”给予高度评价:“在新生的美洲文学中,强大的灵感很快就有萌芽了,作为一种自发性感觉的自然形式,它取代了对传统主题和异国情调的模仿。”^{[3]796}自此,本土作家知道了如何将自然的声音转化为激情的语言,美洲自然风光那狂野不屈的形象跃然纸上:拉普拉塔河和潘帕斯草原独特的自然风光滋养了高乔人,吟唱诗人在天人合一中创造了一种优美的通俗诗歌;埃雷迪亚(José María Heredia)^③笔下的尼亚加拉瀑布,壮丽无比的自然奇观使灵魂获得洗涤,让人意识到自然环境是美洲得天独厚的遗产。当诗人们不再附庸风雅,开始观察脚下的土地,一种身为美洲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就在文学中悄然而生。

文学的地域性是身份构建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文学语言民主化”(la democratización del lenguaje literario)^{[3]794}。这指的是美洲作家远离欧洲模式,寻求更简洁、自然、通俗的表达方式,贴近本土的现实生活。他们追求语言自由,不再受旧有

规范和权威的束缚,而是根据真实的情感体验来自由选择表达方式;他们选择通俗、自然的语言来表现,不再执着于巴洛克式的修辞艺术。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地域主义和风俗主义文学都体现了这一特征。罗多认为语言自由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它能真正反映民族个性,而个性化是民族身份的根本,人们渴望文学能够表达民族的个性,正如风格能够表达个人的个性一样^{[3]793}。语言自由推动美洲文学真正走向了民族化和个性化,摆脱了欧洲文学的影子。自由语言突破了诗歌单一体裁的限制,扩展到民间故事、历史小说或风俗小说等形式。本土作家使用地方方言和美洲西班牙语,在作品中融入民俗和乡土元素,这些方式更适合展现拉丁美洲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罗多认为,只要不陷入庸俗主义或文体上的粗疏,这种文学传统就是积极的、丰富的,因为它鼓励作家们打破文化桎梏、张扬民族个性,推动拉丁美洲文学逐渐摆脱殖民地的历史包袱。

拉丁美洲文学在19世纪完成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地域性和语言自由的文学传统让本土文化具备了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已不再是某种新奇风格或是为差异而差异,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特性的真实表达、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罗多笔下的爱丽儿象征着拉丁美洲的独特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构建是一种精神统一,它能帮助拉丁美洲克服内部的差异和分裂:

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本质上是“一体”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都是细枝末节……直到我们的精神统一超越国家边界,并在政治现实中占上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阿根廷人是如何热切地关注墨西哥的不幸;哥伦比亚或古巴的克里奥尔人是如何以爱国的自豪感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伟大和繁荣;智利的山地人是如何从委内瑞拉的平原和巴拉圭的丛林中获得精神共鸣。^{[3]1290}

拉丁美洲的文化认同根植于上述文学传统,它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美洲文化取代西班牙文

① 洪堡在1799—1804年前往南美洲旅行探险,就当地自然环境进行科学研究,其考察成果对现代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30卷《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这激发了美洲人重新认识自己家园的热忱。

② 智利政治家、诗人,被誉为西语美洲第一位知识分子,曾与洪堡会晤于委内瑞拉。

③ 古巴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尼亚加拉瀑布颂》。

化的过程。然而到了19世纪末,西班牙殖民帝国已经成为历史,美国的功利精神和物质文化才是最大挑战。如同勒南笔下的卡列班对爱丽儿的“反叛”,美国用一种庸俗的物质主义和民主主义解构拉丁美洲人的文化传统,使个体沉浸在平等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中,淹没在个体“原子化”的混沌之中,这对拉丁美洲的精神统一极为不利。罗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趋势,他把古典精神、宗教伦理和人文主义融入爱丽儿的躯壳,使其成为拉丁美洲的文化象征。

罗多提出的身份建构的本质是文化独立,即建立拉丁美洲人自己的文化空间,这对一个后发文明来说是极为漫长的过程。虽然困难重重,但罗多是乐观的,他期望新世纪的美洲青年能传承和发扬19世纪的文学传统,以本土地域和语言为根基,以基督教理念、古典美学和人文主义代表的拉丁精神为文化内核,最终使拉丁美洲摆脱作为欧洲或美国的附庸,保持自身文明的独特性。

这就是罗多对拉丁美洲身份问题的回答。爱丽儿虽然曾经是普洛斯帕罗的殖民对象,但她终归自由高飞,她象征着拉丁文化的精神特质。作为拉丁美洲的文化内核,爱丽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哪怕被卡列班顽固的反叛击败了一千零一次,爱丽儿总能复原,重整青春和美丽^{[4]118-119}。罗多对拉丁美洲文化持有充分信心,他自豪于自己拉丁美洲人的身份,并且通过这部作品来告诉世人,虽然实现拉丁美洲政治统一的目标在当下遥不可及,但先行实现精神和文化的统一是可能的。这种根植于文学传统的身份建构,展现了拉丁美洲文化个性化和异质化的过程,也折射出以罗多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现代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获得政治独立,他们也在努力避免拉丁美洲沦为西方文化衍生的亚文明^①。

三、拥抱现代还是坚守传统?

在19世纪晚期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思潮中,罗多算是一股逆流,因为当大多数现代主义者都聚焦在反叛传统、迎接现代之时,他却主张回归传统。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一个古典、优雅、和谐的理想之美洲的向往,这些“崇古”思想成为他的美洲主义的显著特征。从《爱丽儿》中可以看出他对美洲主义构想提出的三重愿景。

1. 回归基督教信仰。罗多期望美洲青年借助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创造新的美洲文化,克服物质主义的局限。《爱丽儿》第三章提到了“‘善’的神性”的概念。它是一种超越物质与现实的精神境界,使人明辨是非善恶、走向崇高;它体现了对道德至善的实践、对自由和创造的热忱,以及对非功利价值理想的坚持。这种基督教神性是拉丁文化的灵魂,也是拉丁民族的精神气质。

2. 崇尚古典美学。罗多对古希腊文化中的古典之美大加赞赏:“对于人性的教养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古老理想之美,柏拉图之谓和谐美,雅典娜把生命之杯举到唇边的优雅动作……”^{[4]63}而美国文化中的庸俗化审美是对古典之美的破坏,这种审美在向拉丁美洲扩散。他直言美国把“泰坦巨人般的‘美’强加给所有人”,美国文化也仿若工业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产品,掉入了平庸和实用的陷阱。这一切皆因“美国精神”对“英国精神”选择性地继承——功利主义、重商主义、清教教义被保留下来,而人文主义、艺术之美、诗意情感等却被放弃,这样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功利化和庸俗化的社会文化^{[4]99}。与之相对,拉丁美洲文化则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优秀部分,既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受到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污染,并且还保留了美洲独有的“蛮荒”,这些特征是抵御庸俗化审美的天堑。

3. 施行人文主义教育。在罗多看来,只有人文主义教育可以使人们在现代社会中重获自由。按照他在书中的构想,美洲国家可以通过对青年的德育、智育和美育来重归信仰。他鼓励美洲新一代成为人文主义教育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非实用主义教育下的工具人和“对社会有用”的人。罗多批判了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专业化及其带来的后果,即单一方向的专业化或机械重复的劳动造成的“头脑的萎缩”;与之形成对比,在古希腊,雅典人同时是运动员、公民、雄辩家和思想家,他们不是“狭隘的”专家。

罗多的这三重愿景融合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美学传统、古罗马拉丁文化中的基督教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如何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避免本民

^① 有观点从历史、文化、语言等角度出发,认为拉丁美洲是一种亚文明,即欧洲文明的衍生。

族文化在诸多思潮的影响下流于同质化,成了一个挑战。在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迎接现代,实证主义者和北方狂热主义者属于这一派,他们主张以物质性和实用性作为国家发展的坐标;另一种是回归传统,这一派强调美洲文化的根本性和连续性,主张保持和恢复拉丁美洲的文化身份和价值,但他们畏惧现代化,害怕现代性会摧毁本土文化。

罗多的美洲主义思想和后一派很相似,但不能等同。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不局限于狭隘的本土主义和排外主义,他认为拉丁美洲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爱丽儿》第二章讲述了一个东方国王的故事:他的宫殿是人民的房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但在宫殿深处有一个围栏,除了国王之外任何人禁止进入。罗多接着解释道,宫殿代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它可以对世界上一切思想潮流都保持开放,但它必须有一个与世隔绝、不可侵犯的地方,专门用于“无私的冥想、理想的沉思、古老的闲暇”^{[4]53-57}。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外来思想就像是进出宫殿的人,而在拉丁美洲人的内心中必须留有一方净土作为拉丁民族文化传统的栖息地。因此,在拥护传统的同时,罗多并不反对现代化,二者应该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既不能像实证主义者一般全盘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也不能堕入地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狭隘性中。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美国的看法中得到佐证——他试图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美国。

美国曾是拉丁美洲的导师。在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泛美论”^①一度被奉为圭臬,美国文学也对拉丁美洲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这一切随着美国的南向扩张而彻底反转。有学者指出,泛美主义如同它背后的帝国,拒绝将伊比利亚美洲和前哥伦布时代的遗产带入“美洲”的历史和文学^[12],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泛美主义显现出新殖民主义的色调,美国意图抹去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再造一个符合美国价值的美洲,正如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却不允许它的邻居拥有拉丁传统。门罗主义者甚至宣称美利坚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②,而拉丁美洲是“旧世界在新世界的遗迹”,他们用代表“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将拉丁美洲“去拉丁化”(delatinization)。罗多对美国的文化同化政策展开强烈批判,并对其可能导致的结果表达担忧:

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进行了一种伦理上的征服,对她伟大力量的崇拜正大踏步地入侵我们领导阶层的灵魂深处……由此,一个略去征服战争自发去拉丁化、效颦美国的美洲形象,开始漂浮在许多真心为我们未来着想的国人的梦想上。^{[4]87}

罗多看到了“泛美”的本质,他否认南北美洲作为昔日殖民地拥有共同血脉,而是把“拉丁的”同“盎撒的”作区分,明确二者在种族构成、地域环境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两个美洲,如同“爱丽儿”和“卡列班”,虽然同属被外来者奴役的对象,但它们一个代表美学、艺术和智慧,另一个则象征野蛮、功利和粗俗。

虽然罗多列出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罪行,但他依然能保持理性去看待美国的其他方面。首先,罗多意图区分“拉丁精神”和“美国精神”,强调拉丁文化传统的保留,而非鼓励二者间的对抗。他认同美国曾经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示范作用,他把里瓦达维亚^③等解放运动的先驱称作拉丁美洲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13]。其次,他没有指责美国是精神荒芜的始作俑者,这些社会问题和精神危机更多的是人类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美国既不是起点也不会是终点。罗多在《爱丽儿》中批判的“卡列班”代表的是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美国恰好是这种社会的表现形式之一。最后,罗多对现代性的观感不是消极负面的,他不否认“美国精神”在物质性和实用性方面对国家现代化的正向作用,他感叹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取得的众多成果。事实上,罗多眼中的美国图景是这样的:

美国文化高度重视艺术的价值,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界的繁荣(如文豪惠特曼和爱伦·坡以及思想家爱默生),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只需想想19世纪末修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贯穿美国全境的城市火车站,它们将建筑之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仿若一座座现代教堂。^[14]

① “泛美论”包含美洲多元文化观、新伊甸园说和反欧洲主义等观点,曾经得到西语美洲知识分子的一致推崇,但伴随着美国的一系列扩张侵略行动,拉丁美洲人对泛美论的态度发生了转向。

② 19世纪美国的一种文化信条,该词由门罗主义者John O'Sullivan于1845年首次提出,后被用于合理化美墨战争、吞并德克萨斯、入侵古巴等一系列帝国主义扩张行为。

③ 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1780—1845),阿根廷共和国首任总统。

显然,现代化的美国成了拉丁美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其影响下,拉丁美洲从中世纪大步跨入现代世界。现代主义者罗多意识到,那个巴洛克主义的美洲已然远去,对于谋求长远发展的拉丁美洲来说,现代化是唯一出路。在此方面他认同实证主义者的主张,他肯定了实证主义对拉丁美洲思想启蒙的作用,正如在文集《普洛斯帕罗瞭望台》中所阐述的:

实证主义的启蒙给我们留下了对推论、实践和行动的强烈相对性意识;对世俗现实的公正思考;对批判精神的严谨和坚决;对绝对肯定的不信任……我们是新理想主义者,或者说试图成为新理想主义者。^{[3]521}

从这里可以看到,罗多对美国 and 实证主义都秉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他在《爱丽儿》第五章也有着同样辩证的表述:“我并不是想说他们的成就在我们称为‘灵魂意义’的方面一无是处。没有扫荡和建设的手,那支撑沉思者额头的手也不得安宁。”^{[4]105-106}他透视到事物的两面性,正如他对“美国精神”和实证主义的有限批判。

罗多是拉丁美洲最早思考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知识分子之一。现代主义是开创性的思潮,这种思潮的现代性在克服以往思想局限性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更是传统文化的颠覆者。罗多在试图消解现代性和传统的冲突,他将拉丁文化传统视为美洲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美洲主义的实现途径。因此他未全盘否定美国,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吸收美国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借鉴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经验。他十分赞赏“法兰西精神”,这点在《爱丽儿》中也有提及。在罗多看来,美洲需要一种和谐与共的新文明,兼具现代化的实体和拉丁传统的内核。作为跨越世纪的现代主义者,他的思想具有两面性,既有对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保守和反抗,也有对新时代和新思潮的开放和热情。罗多认为:“历史上伟大的革新、伟大的时代、人类发展进程中最光辉丰饶的时期,几乎总是两股不同的、并存的势力角逐的结果……现在美洲需要保持其构成中独特的双重性。”^{[4]66-67}这传递了一种辩证、调和的文化理念——避免任何“单边的效仿”,在二元对立下达到一种自然的和谐。因此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拉丁美洲文化的一部分,借用罗多自己的话:“美洲人既要礼敬过去、尊重传统,又要保持对未来的勇敢和冲动。”^{[4]117}

结 语

在《爱丽儿》中,美洲主义作为一种拉丁美洲民族精神和文化身份的塑造方式,深刻反映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化挑战时的抉择。罗多把拉丁美洲比作“爱丽儿”,这在今人看来或许有些浪漫和理想化,也因而引发一些争议,比如雷塔马尔就认为“卡列班”更能反映拉丁美洲的真实面貌。但无论如何,从罗多身上可以看到一种逆势而为的勇敢——同时期的现代主义者们都在抛弃传统,他却在坚守传统,他更是为数不多的能把拉丁美洲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结合起来辩证思考的人。《爱丽儿》继承了玻利瓦尔的美洲主义理想,也突破了政治理想的局限性。罗多用拉丁精神来构建现代拉丁美洲人的文化身份,呼吁拉丁美洲社会重视精神价值和文化遗产,这不仅缓和了拉丁美洲人的精神危机,也促进了他们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价值。因此,罗多不愧是乌拉圭“900一代”(generación del 900)^①作家群体的典型,他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努力让拉丁美洲在复杂、对立和分裂的历史环境中找到合适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韩琦. 论拉丁美洲现代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128-140.
- [2] NUC CETELLI S. 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n philosoph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94-95.
- [3] RODÓ J E. Obras completas[M]. Madrid: Aguilar, 1967.
- [4] 罗多. 爱丽儿[M]. 于施洋, 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21.
- [5] 马蒂·何塞·马蒂诗选[M]. 毛金里, 徐世澄,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30-38.
- [6] ABELLÁN J L. La idea de America: origen y evolución[M]. Madrid: Istmo, 1972: 97.
- [7] ECHEVERRÍA R G. The voice of the master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moder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17.
- [8] LAGO J. Juan María Lago: Abogado del 900[M]. Montevideo: Tall. Gráf. de la Comunidad del Sur, 1967: 89.
- [9] MONEGAL E R. El Americanismo, introducción general, obras completas[M]. Madrid: Aguilar, 1967: 100. (下转第81页)

① 活跃在1900年前后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探索现代化和民族认同等议题。这一代人对拉丁美洲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和身份构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诗学视域下“清风”到“林风”的分化

——以魏晋为源起

冯琪琪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4)

摘要:“清风”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的文化内涵的演变折射出魏晋玄风的兴起和回落的发展趋势,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在诗学史上被延续保留,并逐渐分化出“林风”这一意象以满足特定的书写需求。“林风”自唐代始现于诗歌之中,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却可溯源至魏晋时期。“林风”由“清风”分化而来,受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藻“林下风气”的影响,体现了诗人对松竹品性的精神寄托,切合“游而不居”的庄园山水欣赏模式。实际上,和“清风”相比,“林风”消解了魏晋玄学影响下本体论哲学关于“无”的抽象性质,更加强调“林”的景物特征,凸显“风”的自然属性,永恒地凝结着魏晋士人风流的时代精神,对后世诗人而言具有更加针对性的遥畅其怀、兴寄所托的书写功能。

关键词:“清风”;“林风”;魏晋南北朝;诗学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12

“清风”作为诗歌意象具有复杂的审美意蕴,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之形成流淌着古今以来华夏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生命精神。学界关于“清风”作为诗歌意象的研究实际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某位诗人如李白、苏轼笔下的“清风”意象的分析,缺少以中国诗歌精神的整体视野,对“清风”这一诗歌意象进行综合性考量。实际上,“清风”最早的记载即作为诗歌意象出现在《诗经》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时代为其灌注了不同的文化精神。其中,魏晋南北朝对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具有尤其深远的影响,使得“清风”逐渐缔结为中国诗歌文化中一种对潇洒、自由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一种对不拘于礼法、放任于天地间的“游”的精神境界的向往,这也影响了唐代开始由其分化而来的“林风”。故“林风”作为诗歌意象虽诞生于唐朝,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却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展现着后世诗人对魏晋风流及其时代精神的无限神往。

一、魏晋南北朝“清风”的审美意蕴

“清风”的文化内涵在魏晋南北朝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首先,在建安诗歌中,“清风”与“清气”的文化内涵逐渐发生分离,其宇宙论影响下的形而上属性有所消减,而更加偏向于哀情、悲情的抒发;其次,魏晋玄学思潮影响下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又将“清风”再度“玄化”,为其增添了“无”的自然属性,并与魏晋人物品藻关系密切;最后,东晋、南朝时期对“山水”的审美风潮进一步放大了“清风”的自然属性,赋予其超越时空、泯灭主客二分的文化内涵。

(一)建安情动之“悲”

在建安之前,“清风”与“清气”的内涵相近,都

收稿日期:2024-06-18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度项目“文化交流视野下的蜀汉文艺美学思想研究”(BSYB23-3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南朝文学批评方法研究”(21Y009)

作者简介:冯琪琪(2000—),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与宇宙论哲学下“道”之属性相关。“清风”一词最早出现于诗歌中,是《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毛传注曰:“清风,清微之风,化养万物者也。”^[1]可见,“清风”之“化养万物”的功能,与先民宇宙观中元气论所认为的“气”乃万物之根源是一致的。又《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2]庄子将“气”提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认为“风”与“气”有内在的共通性,将自然界之物质“风”也抽象化了。同时,《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3]“‘清’是‘道’的本体特征,更是‘道’的本体之美。”^[4]“风”的自然属性与形而上性质之“清”相结合,使得“清风”具有抽象化的涵义,与宇宙论关于“清气”的内涵是相一致的。“清风”的抽象化体现在其道德象征的功用上,其道德意义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论语·颜渊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5]此后,“清风”的道德意义一直得到保留。在两汉时期,“清风”与“清气”多用于表现人物之品德,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并在魏晋人物品藻中实现再度转化,即对人格美由道德功用性到审美性品评的转向。

“清气”与“清风”作为诗歌意象的意义分离愈发明显,这是强调“风”的自然属性而引发的。“气”是“道”的化身,屈原《九歌·大司命》:“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6]“清气”与“阴阳”直通于“天”,乘御“清气”是神明超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后世诗歌中,“清气”多用于表现形而上的感官不可感性,如曹丕《善哉行》:“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7]³⁹³又如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7]⁹⁹⁶,其无形、无色、无味之属性,正如宇宙本体寂然之“道”。此外,“清气”还有气味的意思,如曹丕《善哉行·有美一人》:“哀弦微妙,清气含芳。”^[7]³⁹¹元代王冕《墨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8]“清是一种跃升于天的气体。”^[9]作为气味的“清气”,与“乾坤”等具有形而上涵义的词共用,仍然含有通往“天”“道”的形而上属性。而随着“气”与“风”这两个范畴的使用逐渐分离,“清气”与“清风”的文化内涵也有所变化。“气”通向“天”,“风”生于“地”,后者作为“风”的自然属性是感官可感的,这将其与前者区别开来。究其原因,在汉代“天人感应”的认知模式下,主体对客体的感官感受往往会导向精神性的“与天同一”的抽象性精神体验,而士人群体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则引

发其对外物的审美性认知倾向,使其更加重视感官感受导向的情感体验。

因此,从建安时期的诗歌开始,“清风”作为“风”的自然属性较为突出,与“清气”的形而上属性实现了区分。如曹植《情诗》:“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7]⁴⁵⁹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三》:“明灯曜闺中,清风凄已寒。”^[7]³⁷⁰应玚《正情赋》:“清风厉于玄序,凉飏逝于中唐。”^[10]这些都凸显了“清风”作为自然物质的特征。此外,“清”毕竟源于“道”的本质属性“无”,“清风”用于抽象的道德性表述并未全然消失,而是与“风”的自然属性相互融合,使得“清风”作为诗歌意象具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如曹丕《让禅第三令》:“被服清风,沐浴玄德。”^[11]²²³用互文的手法表现了“清风”的双重属性:“清风”与“玄德”相对,“清风”仍带有道德性表述的倾向;“被服”与“沐浴”相对,则是以“清风”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引发感官感受,进而上升为情感体验。

此外,建安诗歌中的“清风”,还通常与“哀”“悲”的情感抒发相关,这是“清”在建安时期的美学涵义发生改变的体现。建安诗歌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曹氏父子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凄怆”“肃清”“霏霏”“萧瑟”“零落”“凄冷”等表述,其“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可见一斑,而“清”正是这一审美风尚的极致体现,在建安诗歌中,“清”近乎“悲”。“清”作为建安“以悲为美”审美风尚的表现,与自然物质“风”相结合形成的“清风”意象,往往具有从对“风”的感官感受延伸到对“悲”的情感体验的作用。如曹丕《鸢赋》:“托幽笼以栖息,厉清风而哀鸣。”^[11]¹³¹又如其《与吴质书》:“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11]²²³可见,建安诗歌中的“清风”意象被烙印上了“悲情”的痕迹。

(二) 魏晋本体论影响下的“无”

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本体论哲学的兴起使得“清风”有着回归“清气”的趋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形而上色彩,同时也受到魏晋人物品藻的影响,与竹林七贤“任诞”的精神境界相关。建安时期“清风”多体现“悲情”的用法,在魏晋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如阮籍《咏怀·其一》:“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7]⁴⁹⁶又其《咏怀诗十三首·其二》:“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嘯歌伤怀,独寐寤言。”^[7]⁴⁹⁴“清风”与诗人的情感状态密切联系。除了这类用法,“清风”作为诗歌意象多与人

物品藻的描述相关。

正始时期,在诗文中使用“清风”意象最多的是嵇康和阮籍,这一阶段“清风”常用于描述抽象性的人物品格,这是“清风”受玄学影响的再度“玄化”。随着东汉时期“清议”逐渐向魏晋“清谈”过渡,人物品藻也由道德功用性向审美性发展,“清”的美学涵义再度发生变化,“士人人格美由‘清正’的要求转变为了‘清通’”^[12]。如嵇康《原宪赞》:“弦歌自乐,体逸心冲,进应子贡,邈有清风。”^{[13]1346}“邈”本义指“距离遥远”,此处形容人物之高卓超远。又如阮籍《咏怀·其四十二》:“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7]504}赞颂远离纷争的善终之士的智慧明悟。在西晋时期,使用“清风”意象最多的是陆机、陆云兄弟。“清风”仍然多被用来表现抽象的人格品性,但其道德涵义的比重有所上升。如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庆云扶质,清风承景。嗟我怀人,其迈惟永。”^{[7]672}其《应嘉赋》:“怀前修之髣髴,覩幽人乎所过。抱玄景以独寐,含清风而寤语。”^{[13]2012}用以表现“傲世公子”之超俗品性。又如陆云《与陆典书》:“太伯清风,遁世立德。龙蛇东岳,三让天下。”^{[13]2048}借“清风”来赞颂其伯父的才行品德。

魏晋时期,“风”受玄学思潮的影响,用以形容人物的品格精神和人生境界,而后,“风”经由人物品藻又移用至文艺领域。如刘勰《文心雕龙》总结前代文艺思想提出的“风骨”一说。“文论之‘清’是魏晋自然人格的派生物。”^[14]这种使用趋向或许与“清风”的形而上属性对其自然属性的引申相关,其自然属性时常被玄化。

首先,“清风”的自然属性具有一定的空间性表现,如辛弃疾《和吴克明广文赋梅》:“十顷清风明月外”^[15],清风“十顷”这种空间规模是较为客观的。但同时,“清风”的形而上属性又能够将这种空间无限外扩,通往天地四方,如明代孟云浦《送陈莲幕解官归登州》:“千里清风卷葛衣”^[16]的清风“千里”,又如李白《游太山六首》:“万里清风来”^[17]的清风“万里”,实现超越性质的表达效果。这种超越性不仅体现在空间大小这一层次,还体现在词义引申的实现方式上,“清风”从自然物质引申为“道”之属性,再经由人物品藻的形容到文艺领域,这与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活动和生命意识密切相关。

其次,“清风”亦展现了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美之整体大观。《世说新语·容止》第二十五条

载《语林》:“谢公云:‘小时在殿廷会见丞相,便觉清风来拂人。’”^{[18]729}士人对他人的人格美所产生的审美性体验,犹如“清风”的自然属性所触发的感官感受,给人一种“清风来拂人”的美感。同时,“清风”亦被喻为为人格之美,用自然之美来形容人格之美。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18]159}又如“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18]150}玄度、王荆产两人饶有风度,具有“清通”之“清”与“玄风”之“风”相结合所形成“清风”之形容。“清风”由此融入了魏晋人物品藻的审美性倾向这一文化内核,象征着魏晋士人“光风霁月”的精神境界。

最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还影响了“清风”与“竹林”这一意象伴随使用的情况。魏晋人物品藻追求“任诞”的精神境界,“竹林七贤”在后世逐渐成为潇洒从容的魏晋风度的象征,推进了“竹林”这一意象的经典化进程。诗歌中“清风”与“竹林”意象的有机组合,往往流淌着魏晋风流的精神血脉,两者共同出现的诗文有200余首^①。“清风”与“竹林”意象之间相互缔结关系的不断深化,影响了唐代两者相结合所形成的“林风”意象的诞生。

(三)晋宋的“山水”属性

晋室南渡之后,士人的审美思潮再度发生变化,对“清风”文化内涵产生了新的影响。作为诗歌意象,这段时期的“清风”较少用以象征人物的道德品性,基本回归了“风”的自然属性,并在此基础上融入“山水”属性。诗人使用“清风”意象来描写山川万物,其视野和胸襟扩大到天地山水的全幅图景,不再局限于抒发凄清的“悲情”,而是一种以整体性的“自我”视角来对天地万物发生的审美体验,往往伴随着“闲适”“舒畅”,体现了诗人群体对自然风景的亲近与喜爱。这段时期使用“清风”意象的代表诗人有东晋陶渊明,南朝谢灵运和谢朓。事实上,“山水”属性的融入,使得“清风”意象基本走向成熟,唐代及其之后诗歌中的“清风”意象,与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晋宋时期,“山水审美”对“清风”文化内涵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都建立在“清风”自然属性的具象化的基础上。

^① 通过爱如生古籍库检索艺文类,只计入同时出现“竹林”与“清风”意象的诗歌,共计200余首。

首先,“山水视角”“山水胸怀”具有旷阔的时空维度,使得“清风”的自然属性往往被无限扩大。“风”本身具有的不分昼夜、无谓场所、贯通四季的自然属性,在诗歌中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如谢灵运《逸民赋》:“萧条秋首,葳蕤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风。御清风以远路,拂白云而峻举,指寰中以为期,望系外而延伫。”^[19]“清风”能够跨越“春”“秋”的季节时间,突破“寰中”“系外”的空间距离。又如谢朓《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其七》:“玄冬寂修夜,天围静且开。亭皋霜气怆,松宇清风来。”^[7]¹⁴⁴⁵辽阔浩瀚的“天围”在远,眼前的“亭皋”“松宇”在近,“清风”连通远景、近景,营造了“清寂”的诗歌意境。

其次,“山水”属性还放大了“清风”的形而上属性。晋宋时期佛教思想的融入,促使诗人的审美活动从情感体验转向精神悟道,强调对当下的自我存在的确证,达成一种虽是“天地之清风”,实乃“自身浩然气”的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清风”本有“道”之“清虚”的属性,能够引导诗人从眼前的山水景物进入无边的自然图景、宇宙天地之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全然相忘、融为一体,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分别。这也对唐代禅宗的审美境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南史·谢德传》:“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20]以“清风”“明月”为友,主体与客体相近相亲,与苏轼《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21]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诗人的灵魂与无边的宇宙天地产生的共鸣,在无限的时空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

此外,晋宋诗人的“山水视野”,还影响了“清风”和“明月”意象的同用,使其成为后世诗人常用的意象组合,诗歌数量多达近万首^①。“清风”与“明月”两种意象的同用虽在嵇康、阮籍的诗中就有出现,但在晋宋时期“山水胸怀”的注入下,“清风”与“明月”才相互缔结起超越时空的“以我观天地”的文化内涵。如谢朓《怀故人诗》:“……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7]¹⁴²⁹这种由“清风”与“孤月”共同营造的“清寂”“孤清”的意境,在后世使用“清风”“明月”意象组合的诗歌中,基本成为一种定调,成为能够代表中式美学的诗歌意境之一。此外,这种“清寂”的意境流淌着“哀而不伤”的中国诗歌精神。诗人超越眼前的山水景物,其精神置身于无限的时空之中,得以从短暂的

“哀”“悲”情绪中解脱出来,充满了对人生的哲思和对生命的深情眷恋。魏晋的审美风尚从“以悲为美”逐渐过渡到“哀而不伤”。

同时,“清风”与“明月”意象的进一步组合,又以“风月”的面貌出现在诗歌之中。“风月”虽发展出了有关男女之情的文化内涵,但其时空相关的属性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如惠崇禅师“一朝风月,万古长空”^[22]体现为穿越时空、以游无穷的精神自由,以及回归当下、静观生灭的心灵感受,是中国诗歌精神与禅宗文化融合之美的极致体现。

二、“林风”的文化内涵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使用“清风”意象数量较多,而“林风”则不曾出现,直到唐代才开始有一定数量的使用。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和贾岛等诗人皆有相关诗句流传,唐代使用“林风”意象的诗歌共有16首^②。宋明清时期,“林风”的使用数量不断增多,实现了其作为诗歌意象的经典化,使用“林风”意象的诗歌共计千余首^③。实际上,“林风”文化内涵的形成可追溯至魏晋时期,随着“清风”作为诗歌意象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内涵越来越丰富,“林风”便从其中分化出来,继承了“清风”的一部分使用功能。

魏晋南北朝虽没有“林风”这一意象,但是这一时期的“清风”意象与“林”颇有关联。曹植、阮籍使用“清风”的诗歌中出现过“北林”,嵇康使用“清风”的诗歌中出现过“松林”,可见在唐前,“清风”和“林”的关系就已经较为密切了。“林”与“清风”在诗歌中伴随出现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在诗歌中,由于“清风”形而上属性的消减,其作为“风”的自然属性愈发受到重视,“风”的空间性质关联其发生场所,“林”能够放大“风”的视听感官效应,是引发诗人诗兴的绝佳环境;另一方面,“竹林七贤”“林下风气”等魏晋人物品藻的经典化,使得“竹林”和“清风”的缔结逐渐加深,成为

① 通过爱如生古籍库检索艺文类,只计入同时出现“清风”“明月”意象的诗歌,共计9 000余首。

② 通过爱如生古籍库检索唐代艺文类,只计入完整使用“林风”意象的诗歌,共计16首。

③ 通过爱如生古籍库检索宋明清艺文类,只计入完整使用“林风”意象的诗歌,共计1 000余首。

中国诗歌文化中一种向往潇洒、自由的人生境界,一种不拘于礼法、放任于天地间的“游”的精神追求,是庄子的人生哲学与魏晋风流的完美体现。两者共同推动了“竹林”和“清风”熔铸为“林风”意象。

(一)“林下风气”与魏晋人物品藻

“林风”的文化内涵与竹林七贤和谢道韞潇洒与、高卓清远的人物品藻有关。唐代开始,出现“林风”这一意象的诗歌中,“林”偶尔指“松林”或“柏林”,但绝大多数是指“竹林”,这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自魏晋以来,“竹林”与“竹林七贤”的关系就密不可分,“竹林”从其游乐的场景逐渐关联起“竹林七贤”的人格魅力,“竹林”清幽葱郁的自然特点与士人的人物品藻相互融合,成为嵇康、阮籍等人精神品格的象征之一。如《世说新语·贤媛》:“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18]822“林”自然指“竹林”,这一评点认为谢道韞有“竹林七贤”的人物风范,可见“林风”逐渐与人物品藻的形容产生关联。在唐代及其后,使用“林风”的诗歌往往直抒对嵇康、阮籍等人的思慕之情。如孟浩然的《听郑五愔弹琴》:“阮籍推名饮,清风满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龙唇琴。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23]不仅有对阮籍不拘礼法、纵情酒琴的向往,还有对山水景物的钟爱之情。又如明代王绂《清风林》“种竹风满林,风清尘自远。芳樽聊独持,非敢慕嵇阮”^[24]5充满了与嵇康、阮籍跨越时空的“知音”情谊。此外,从此诗亦可见,“竹”“林”“清”“风”等元素之间相互组合,形成的“竹林”“清风”“林风”等诗歌意象,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魏晋风流的文化内涵。又如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25],虽不曾直接言明魏晋风流,但“幽篁”“弹琴”“长啸”等描写,都尽显魏晋士人的风貌气度。

(二)“松竹品性”与精神寄托

松竹的自然秉性经霜耐寒、高直凛落,在儒家比德说审美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美好品德的象征。魏晋时期,松竹与审美性的人物品藻相关,其道德意义并不明显。到了南朝时期,统治阶级对儒学的重视,使得儒家思想开始融入玄、佛两家。松竹象征道德品性的内涵与象征魏晋风流的人物品藻相融,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影响下儒家式的“君子处身”以“积极入世”的道德理念。“竹林”在这段时期是一种远离凡尘纷扰、保持高

尚情操的精神寄托。如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26]“贞”体现了对“竹柏”道德品性的赞赏,这一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屈原和汉儒思想的继承。受此影响,后世诗人使用“林风”意象所反映的人物品藻,不仅与潇洒不羁的魏晋风流相关,也与保持坚正操守的道德品性相关。因此,“林风”也往往用来象征清高自洁、独立于世的道德品性。如贾岛《送邹明府游灵武》:“……债多平剑与,官满载书归。边雪藏行径,林风透卧衣。”^[27]诗人做官三年清贫而归,以“边雪”掩迹、“林风”透衣的描述,来表现其清廉自洁的高尚品格。

与之相应,“竹林”“松林”也逐渐成为高士贤人处身的场景,象征着诗人们远离世俗纷扰、回归真我的美好愿望,但“竹林”“松林”毕竟是无法长居的,只能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成为诗人心中一片“桃花源”式的净土。正如后世诗人们时常表达对阮籍、嵇康等人的思慕之情,却无法真正成为他们,所以才有“非敢慕嵇阮”^[24]5的感叹。也因此,诗人常在居所周围种竹植柏,聊以宽慰。如唐代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28],松竹之品性被寄予了美好的精神愿望。

(三)“游而不居”与山水趣味

“林风”意象的普遍使用,切近“游而不居”的“山水”欣赏模式,是山水之趣融入中国诗歌精神血脉的表现。使用“林风”意象的诗歌,通常含有山水之乐趣。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山水之趣与“林风”的自然属性相关。种竹成林有一定的面积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这种“庄园”模式的审美活动,只有极少数诗人能够负担,或如隐居“田园”得以依傍竹林的诗人,也不过是少数。纵使诗人在居所种竹植柏以作为心灵寄托,也难以形成“竹林”的规模。所以,对大部分诗人而言,只有出行在外才有机会体验到“林风”,这种审美模式切合“游而不居”的山水欣赏活动。在外游玩往往能够触发诗人的诗兴,故“林风”意象通常与“山水”之趣关系密切。

其二,唐代以来,诗歌逐渐形成“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的写作模式,诗人处于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之中。“林风”不仅组成诗中的山水景物描写,还融入了山水欣赏的乐趣,使得诗人从凡尘俗世的纷扰中暂时解脱出来,成为与主体相亲相近的审美对象。同时,“竹林”提供了一种清幽

宁静的氛围,诗人身处其中,逐渐融入竹林的环境之中,其身心远离尘世纷扰,往往浮现淡泊功名利禄之思。而“游而不居”的欣赏模式,又使得诗人终将归还世俗,精神上的超脱将要回归现实,山水之趣面临终结,难免引发留恋不舍之情。

“林风”与“山水之趣”的关联,使其成为抛却名利、归隐山林的象征。这类诗例比比皆是,明代董其昌《和陆伯生三首·其二》“管领山川青笠外,消磨贤圣绿尊中……好在咏怀才未尽,朗吟如坐竹林风”^[29]表现了对功名利禄执念的淡忘;杜甫《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净琴张……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30]使用范蠡与西施乘舟归隐的典故,抒发了意欲超脱世事、回归自由的思想感情;又如宋代向子諲《西江月·五柳坊中烟绿》“抛掷麟符虎节,徜徉江月林风”^[31],纵有“麟符虎节”的权势声名,又何如“江月林风”的自然逍遥,在与山川风光的自然相亲中,诗人生出了归隐山林的愿望。

结 语

“林风”作为诗歌意象,受到了“清风”的孵化。“清风”与“林风”贴近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清风”的意义外延大于“林风”,其自然属性、山水属性、人物品藻属性和形而上属性相互碰撞、交融,使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审美意蕴。这一过程主要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使得“清风”的文化内涵与魏晋风流和魏晋时代精神高度相关。同时,随着“清风”与“竹林”意象的共用成为一种显著的诗学现象,“清风”与“竹林”逐渐融合形成“林风”,这一意象自唐代起便被广泛使用,后世使用“林风”这一意象的诗歌多达千余首。故“林风”虽诞生于唐代,其文化内涵的形成却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

值得注意的是,“林风”并非就此取代“清风”,而是从“清风”意象分化出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蕴。因此,“林风”也有明显不同于“清风”的特征:“林风”由“风”借助“林”而发,是有所凭依的,其作为“风”的自然属性得到了强调,几乎都与自然山水的描写相关,而较少抽象性的形而上表述。总而言之,魏晋时代精神陶铸了“清风”“林风”的文化内核,作为诗歌意象,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

射出中国诗歌的独特精神。

参考文献:

-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5.
- [2]阮毓崧.重订庄子集注:上[M].刘绍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2.
- [3]杨树达.老子古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6.
- [4]陈聪发.中国古典美学清范畴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1.
-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9.
- [6]朱熹.楚辞集注[M].黄灵庚,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0.
- [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陈衍.元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98.
- [9]袁济喜.汉末魏晋以“清”为美探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1):103.
- [10]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505.
- [11]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 [12]杨合林.清:中古文化与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J].学术月刊,2004,(12):79.
- [1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4]何庄.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1(2):123.
- [15]辛弃疾.辛弃疾全集[M].王步高,刘林,辑校汇评.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237.
- [16]穆孔晖,尤时熙.北方王门集:下[M].邹建锋,李旭,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40.
- [17]李白.李白集校注[M].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65.
- [18]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9]谢灵运.谢灵运集[M].李运富,编注.长沙:岳麓书社,1999:282.
- [20]李延寿.南史[M].周国林,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8:323.
- [21]苏轼.苏轼选集[M].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76.
- [22]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天津出版社,1991:176.
- [23]孟浩然.孟浩然诗集笺注[M].佟培基,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87.
- [24]王绶.王舍人诗集[M].上海:中华书局,1923.
- [25]王维.王维诗选[M].刘逸生,主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2.
- [26]刘勰.文心雕龙注:上[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9.
- [27]贾岛.长江集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3.
- [28]吴景旭.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58:1145.
- [29]董其昌.容台集:上[M].邵海清,点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106.
- [30]杜甫.杜甫全集[M].仇兆鳌,注.秦亮,点校.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19.
- [31]任汜,武陟仁.宋词全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396.

The Differentiation from "Qing Feng" to "Lin F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etics

—Starting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Feng Qi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Qing Feng" in the poetry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Xuanfeng, and its unique aesthetic connotation has been retained in the history of poetics, and the image of "Lin Feng" has gradually differentiated to meet specific writing needs. "Lin Feng" has appeared in poetry since the Tang Dynasty, but the formation of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n Feng" is differentiated from "Qing Feng",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Non-secularity" of person evaluation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ch embodies the poet's spiritual sustenance of pine and bamboo character, and fits the manor landscape appreciation mode of "visiting but not living". In fact, compared with "Qing Feng", "Lin Feng" dissolves the abstract nature of ontological philosophy about "not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i and Jin metaphysics, emphasizes the scenery characteristics of "Lin", highlights the natural attributes of "wind", and eternally condenses the time spirit of Wei and Jin scholars, which, for later poets, has a more targeted function of writing in a remote and expressive manner.

Keywords: "Qing Feng"; "Lin Fe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etics

(上接第74页)

[10] CARILLA E. Raíces del Americanismo literario [M]. Buenos Aires: Losada, 1968: 536-546.

[11] CARILLA E. Americanismo literario [J]. Boletín de Filología, 2017: 257-325.

[12] RAAB J. El Gran Viejo: Walt Whitman in Latin America [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13] BROTHERSTON G. La América de Rodó: sus banderas y

sus silencios [C] // José Enrique Rodó y su tiempo: cien años de "Ariel": 12º Coloquio interdisciplinario de la Sección Latinoamericana del Instituto Central para Estudios Regionales de la Universidad de Erlangen-Nürnberg. Frankfurt: Vervuert Verlagsgesellschaft, 2000: 59-71.

[14] 埃切维利亚. 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M]. 金薇,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51.

Latin Spirit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Rodó's Americanist Vision in *Ariel*

Chen Yishan, Ma 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Uruguayan modernist writer José Enrique Rodó, in his philosophical essay *Ariel*, reimagines the character of Ariel from Shakespeare's play *The Tempest*, infusing it with philosophical meaning and incorporating his vision of Americanism. Rodó's Americanism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aspect, aiming to construct a modern cultural identity for Latin America. Through contemplation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he envisions a "Latin spirit" that blends classical aesthetics,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o address a series of crises facing Latin American society at that time. *Ariel* and its Americanist conception reflect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pursuit of cultural independence, promote the reevaluation of self-worth among Latin American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Keywords: Americanism; Rodó; *Ariel*; Latin spirit; modernity

三维视角下整合设立背信罪的思考

阮俊杰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的背景下,背信罪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整合设立背信罪需要以“理论—实践—具体可行性”的递进式逻辑视角进行判断。理论层面确定其正当性:回应背信罪的构成要件并非模糊、背信罪的设立并非会沦为口袋罪的两层问题,为设立背信罪提供理论正当性。实践层面确定其必要性:通过刑法修正案的频繁介入但弊大于利、法秩序统一性的构建有赖于整合设立背信罪的两个角度,为设立背信罪提供实践必要性。规范层面讨论其可行性:从设立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与设定兜底条款的双重视角,为设定背信罪提供具体可行性。

关键词:背信罪;口袋罪;兜底条款;制度正当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13

背信罪,又称背任罪,是指“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以谋求自己或者第三者的利益,或者以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目的,违背其任务,给委托人造成财产上损失的行为”^[1]。可以说,背信罪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背信罪出现的频率、影响的范围以及行为的后果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严峻。早在1997年,我国就有学者提出需要增设普通背信罪的观点^[2]。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背信罪的危害以及出现频率远不及今,所以其观点被一再批驳、搁置;在随后重视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下,背信罪亟须被刑法重点关注与规制。在此社会环境下,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二)》)针对目前市场经营中较为常见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罪名作出积极回应,由此也可以判断国家机关对于设立背信罪所持有的态度。

本文认为,整合现有背信性质犯罪,设立能普遍应对背信行为的背信罪。然而,增设某一特定罪名并非易事。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判断其正当性;其次,从实践层面确定其必要性;最后,从规范层面讨论其可行性。因此,本文将从上述三维视角

出发,阐明我国现阶段应增设背信罪的缘由。

一、背信罪整合设立的理论正当性探讨

支持设立者认为,背信罪的增设有利于刑法对于背信行为的规制^[3];在支持设立的基础上,提出了背信罪的理论基础:滥用权限说与背信说^[4]。反对者则认为,因为背信罪部分构成要件的模糊,导致后续适用背信罪的不准确^[5]。也有学者提出背信罪的设立可能导致新型经济犯罪口袋罪^[6]。明确增设之罪的构成要件、确保自身避免成为口袋罪是新增罪名具备理论正当性的关键所在。所以,笔者将从反驳反对者的观点出发,证明背信罪增具备理论正当性。

(一)背信罪的部分构成要件并非模糊

反对者认为,“滥用权限”这一构成要件语义模糊。在设立背信罪的前提下,由于背信行为通常发生在具备高度射幸性的金融经济活动中,受托人在履行信托业务时,不一定能够实现委托人的意愿;或者是受托人为委托人从事商业活动时作

出某项具有风险的交易,进而使得委托人遭受财产损失。概言之,反对者的观点是假设受托人的信托行为造成了委托人财产的损失,但因交易风险的存在,导致无法正确判断受托人的主观心理,进而使得“滥用权限”这一构成要件难以判断,影响背信罪的有效适用。这种观点显然缺乏对金融交易行为的正确理解。任何金融活动的风险与收益是伴生的。即使是购买国债这种稳健的理财行为,也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依照反对者的观点,国家也可能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实际上,由于金融风险存在的普遍性,在任何的金融活动中,作为定量的风险可以不再考虑;在特定金融活动中,除了所有金融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外部金融风险,剩余的变量便是受托人的具体信托行为,那么受托人的具体信托行为便是我们需要重点考量的变量。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对者对于背信罪构成要件模糊的思考便是无意义的。因为最终会影响信托行为合理与否的关键因素,仍然是受托人的具体行为。假设在受托人出现滥用权限、背弃信用的行为,可能或已经损害委托人利益时,作为专项规制背信行为的背信罪便可以作出实际且恰当的规制效果。

反对者还认为,“信任关系”这一构成要件同样难以确定其具体含义。但是这一质疑不足以作为认定背信罪的构成要件模糊而缺少正当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在信托行为中,信任关系的判断并不复杂。在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必定存在着承担相关主体信任关系的桥梁,如书面合同、口头承诺等。在此基础上,受托人只需要按照委托人先前与之订立的相关合同、承诺的具体内容行事,即可认定受托人的行为是符合信任关系的。而之所以会产生对“信任关系”存在模糊界定的错误理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反对者对于成立背信罪的判断标准有理解上的偏差。背信罪的核心为:先违背其任务,再对委托人的财产造成损害。认为背信罪“信任关系”概念模糊的学者,错误地将成立背信罪的判断顺序倒置,将“对委托人的财产造成损害”作为成立背信罪的首要关注重心。假设以财产损失后果而非违背信任关系作为背信罪成立的前置判断条件,就会出现以下悖论:在某一信托关系成立后,假设委托人的财产受到了损害,那么受托人不论其主观心理如何、客观具体行为如何,其必定会被认定是背信行为的实施者。但是以财产损失为前置判断标准,在实际上则忽略了金融市场

外部的经营风险对委托人财产带来的潜在影响。这种想法的直接后果,不仅将经营风险不当地归责于受托人,更是会得出背信罪“信任关系”模糊这一谬论。在以财产损失为前置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假设经营风险已经对委托人的财产造成损失,那么不论受托人是遵守信任关系还是违背信任关系,在委托人财产损失这一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受托人被认定构成背信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再回头判断受托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就会得出部分人违背信任关系,部分人遵守信任关系,但所有造成财产损失的受托人都构成背信罪的定论,进而得出背信罪“信任关系”这一构成要件概念模糊的结果。

实际上,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中,“滥用权限”与“信任关系”表明了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心理,是认定本罪的最重要的要件。确定了两者明晰的概念,为证成设立背信罪提供了正当性理论支撑。

(二)背信罪沦为新型口袋罪的论断难以成立

关于口袋罪的概念,姜涛教授指出:“口袋罪,是立法者为堵截未来发生事实而采取开放性构成要件而形成的兜底犯罪。”^[7]在经济犯罪领域,最为典型的口袋罪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25条之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正随着纷至沓来的相关司法解释而逐步扩大,致使本罪呈现出被滥用的危险,肆意刑罚的口袋已经渐渐地张开”^[8]。从法律逻辑的视角观之,非法经营罪与背信罪存在相似之处:非法经营罪的本质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而背信罪的本质为“违背信任关系+对委托人财产造成损害”。两者同时具备确定具体罪名的前置判断条件,也规定了特定的入罪门槛。非法经营罪的本质,决定其自颁布之日起就是口袋罪,其本质便是两种抽象概念的集合;而背信罪并非如此,不论是“信任关系”还是“对他人财产造成损害”都有具体的概念界定。所谓“信任关系”,就是受托人对于委托人要求之遵守;而“对他人财产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完全可以由刑法规定具体的数额来进行量化,进而避免口袋罪的危险。更何况,对于非法经营罪而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这一表述完全可以更换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但是对于背信罪而言,其本质必须是在违背信任关系的前提下,以造成的具体损失数额作为入罪门槛。如果将具体损失数额前置作为判断此罪与彼罪的依据,

那么所谓的背信罪与《刑法》分则第五章中的侵犯财产犯罪又该作何区分?

此外,在我国刑法中,具备背信罪性质的法律条文大约有11条。如果认为背信罪的本质概念可以调换语序,那么就间接说明现有11条背信性质犯罪与财产犯罪无异,进而认定现行立法存在严重错误。从立法、司法、理论等多方面观之,现阶段的立法并未存在明显漏洞,因此也就证明背信罪本质概念的严格顺序性。对于可以随意调换构成要件顺序的非法经营罪,其认定犯罪的标准相较于严格限定判断顺序的背信罪而言,必定更加自由、宽松,这也就为其自身成为口袋罪提供了逻辑基础;而作为专职规制背信犯罪的罪名,没有对信任关系的违反就没有对后续财产损害后果的考量,因此在这样严格的规制程序下,背信罪成为口袋罪的可能微乎其微,反而可能成为专门规制背信行为的重要武器。

一个全新罪名的设立,需要在其设立后有完善清晰的构成要件判断具体犯罪行为,同时也能够确保自身的谦抑性,避免口袋化的再现。对于背信罪而言,其自身“违背信任关系+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害”的判断要件明确,并且能够将自身的调整范围严格限制在背信犯罪中,这便为未来背信罪的设立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正当性基础。

二、背信罪整合设立 的实践必要性思考

在理论构造的正当性方面,前文不仅说明了背信罪具备充足合理的理论基础,更解释了在设立背信罪之后,并不会出现所谓的相应构成要件模糊、形成金融犯罪新型口袋罪等不良后果。在设立背信罪具备了理论层面的正当性基础后,实践层面的必要性是设立背信罪又一需要考虑之因素。具体而言,刑法频繁修法弊大于利,能够说明被动应对型修正案方式之低效,进而证明整合设立背信罪存在实践必要性;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出发,能够再次证明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实践必要性。

(一)频繁修法弊大于利证明整合设立背信罪之实践必要性

作为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新型犯罪,背信行为辐射的领域已遍布各部门法。可以说,背信行为的

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秩序。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秩序的重要原因,在于背信行为具备隐蔽性与复杂性,以致常规的法律规制手段难以有效应对。

就刑法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一)》)始,背信行为俨然成为立法层面的“新贵”;而《修正案(十二)》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刑法中的第165条、第166条、第169条作出主体层面的修改。可以说,刑法以修正案的方式高度关注背信犯罪。但从背信罪本质特征角度出发,频繁修法不仅难以有效应对背信罪的发展情况,更会带来负面后果。兹以《修正案(十二)》为例加以说明,频繁的修法,不仅难以实现对背信犯罪的高效规制,更会产生部分负面后果。

1.《修正案(十二)》的介入规制不力。概言之,《修正案(十二)》无力解决当前背信犯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背信罪的根本特征:隐蔽性、复杂性。凭借修正案模式滞后被动的规制方法,难以作出有效应对。

首先来看背信罪的隐蔽性。背信罪发生的主要场景,是在以合同为媒介的相对性法律关系中。而相对性法律关系的背后,更多的是私密性质的约定。假设在发生背信行为后,委托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寻求法律介入,但由于相对性法律关系的特征,导致除去合同双方当事人外,其他人员对于合同内容以及具体信托活动的细节难以把控,进而难以得出违约甚至是犯罪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法律即使应当介入其中并对委托人进行保护,但由于证据的匮乏而无法及时规制不法行为,进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

其次来看背信罪的复杂性。背信罪作为行政犯罪,其构成要件要素、具体出入罪标准等因素会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不断变化;且由于背信罪主体范围的广阔,可能会出现自然人犯罪、单位犯罪、自然人与自然人犯罪、自然人与单位犯罪等多元的复杂犯罪模式,导致现有法律因为缺乏翔实规定而难以作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合法规制。

背信犯罪具有的隐蔽性、复杂性特征,决定了任何指向性条文只能对背信犯罪多元可能的其中一种作出规制,这对于日益庞杂的背信犯罪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修正案(十二)》便是针对三种特定背信罪,从犯罪主体、客观入罪标准两个方面进行扩充。针对本次修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处长解释称,本次作出三个背信犯罪罪名

修改的重要原因是:“第一点,本次修改要聚焦实践需要,第165条、第166条和第169条犯罪是实践中反映最为集中、突出的行为;第二点,本次修改应当从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权益的角度作出规定,要打击典型的腐败背信犯罪。”^[9]由此可以判断,《修正案(十二)》的修改是以解决现有问题为指向。这种具有特殊指向性的修改对于在隐蔽性、复杂性牵引下的背信罪而言,没有实质作用,不仅难以产生效果,更可能破坏刑法自身的稳定性,造成附随负面后果。

2. 频繁修法模式存在附随不良后果。从《修正案(十一)》到《修正案(十二)》,基本思路是以频繁修法应对复杂隐蔽的背信犯罪。频繁修法的根本性质仍然是被动立法,这对于背信犯罪的规制而言,并不存在有效结果。此外,频繁修法意味着积极刑法观的大范围铺开,这容易导致重刑主义泛滥与谦抑性的破坏,更与当下司法轻罪治理模式大相径庭,很可能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割裂。

《修正案(十二)》的实例表明,以频繁修法的方式无法规制隐蔽且复杂的背信犯罪,同时可能陷入立法窘境。从背信犯罪的本质特征、频繁修法无力的角度出发,都证明了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实践必要性。一方面,整合设立背信罪,是指在现有背信犯罪的基础上,设立具备兜底、普适效果的背信罪法条。对于频繁变化的背信犯罪行为而言,只要刑法中存在兜底性背信罪条文,都可以凭借此条文的兜底性涵盖任何背信犯罪,实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整合设立背信罪与频繁修法相比,不需要在社会中背信犯罪行为形式产生变化后,作出频繁回应;只需要凭借整合设立之兜底性背信罪进行社会风险的规制,进而避免频繁修法的附随负面后果。

(二)法秩序统一视角下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实践必要性

法秩序的统一性不仅能确认前置法的存在意义,实现刑法谦抑性,更能多维度地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与特定主体之合法权益。因此,以法秩序的统一性为锚点,讨论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实践必要性,具有实际意义。具体而言,明确现阶段背信行为层面法秩序不统一之具体表现,简述法秩序不统一带来的不利后果;深挖法秩序不统一之原因,明确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必要性;从法秩序统一性的底层逻辑出发,明确法秩序统一性与整合设立背信罪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深刻证明增设背信罪的实

践必要性。

由于现阶段背信行为多发,大量部门法对于背信行为都以具体的措施予以惩戒,但背信行为层面法秩序的统一性却无法完整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47条为例,其规定“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10]。纵览《刑法》全文,除去11条特定背信犯罪条文外,由于缺乏对应条文,刑法对于其他背信行为并无规制权限。此情况的附随后果,便是在出现前置法规定的情形但前置法难以有效规制时,由于缺乏刑法的有效规定,此类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被刑法宽宥,导致本该受到刑法保护的利益受到不当减损。

这一缺憾的原因,在于后置法的缺位。如上所述,我国刑法仅存11条背信犯罪条文,但此类不成体系的零散条文难以应对易变多发的背信犯罪,也难以实现背信罪的设立目的。因此整合设立背信罪,于解决法秩序不统一问题而言,为根本解法。由于刑法存在滞后性,假设以被动跟随的方式,当社会中出现背信行为后,以修正案的方式对新兴犯罪行为作出延迟规定,那么就会在背信行为出现后、刑法规范生效前这一时期出现刑法真空,进而导致特定法益的受损。在此逻辑下,深挖法秩序统一性缺憾得出的结论需要被进一步完善,即完备后置法的缺位。具体而言,整合设立背信罪便是“完备后置法”这一概念的具体界定。在现有背信犯罪条文基础上,设定能够包含现有及未来潜在背信犯罪的兜底性背信罪条款。在此基础上,对于前置法频繁变化的任何背信行为规定,这一兜底性背信罪条文都能够实现法秩序的统一。整合设立背信罪,能够实现法秩序的统一性。

背信行为是贯穿多重领域的具体法律行为,此特性决定其与法秩序统一性天然存在密切联系。背信行为视角下的法秩序统一性,意味着背信行为能够在前置法、后置法的双重监督下受到完备规制,进而确保背信行为所侵害的社会经济秩序以及特殊主体之合法权益安然无恙。从刑法的目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任何条文设立的根本目的,都是“规制犯罪、保护法益”;同时,追求法秩序统一性,同样可以实现刑法条文设立的根本目的。因此,可以将法秩序统一性的实现理解为刑法条文目的的实现。没有法秩序统一性,便没有刑法条

文存在的意义;而法秩序统一性的实现,又依赖于前后呼应条文的共同存在。在此逻辑下,便可得出如下结论:在背信行为层面,法秩序统一性的实现依赖于背信罪这一条文作为制度基础;而背信罪设立意义的实现,则是依托于法秩序统一性以完成。可以说,法秩序统一性与设立背信罪之间,存在双向证成、无法分割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为何以法秩序统一性作为支点,证明整合设立背信罪实践必要性的关键所在。

三、背信罪具体构建的可行性追问

在理论层面具备正当性、实践层面具备必要性后,如何在具体的构建活动中确定背信罪具备可行性?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律,需要考虑先前刑法中类似的法律规范。在具体构建背信罪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其构成要件要素能否囊括现有背信犯罪罪名、解决现阶段分散规定背信犯罪的问题,还要考虑到金融领域背信行为与时俱进的特性。为了更好地规制未来犯罪、减少刑法的变动,“兜底性条款”是否应当视为一种值得考虑的立法技术?笔者将从上述角度出发,探索构建背信罪的可行性。

(一)背信罪的构成要件设置

从四要件理论角度出发,背信罪的构成要件设置需要考虑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四个维度。

1. 背信罪的主体。根据背信罪的概念,构成背信罪的人需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种主体层面的要求,可以将背信罪的主体理解为是真正身份犯;对于委托人而言,实施信托行为的具体对象,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单位。因此本罪中的“人”,应当囊括所有潜在的自然人与单位。

2. 背信罪的主观方面。构成背信罪的主观心理必须是故意。有学者提出,具体的背信行为包括主观性背信与客观性背信,可将背信行为分为疏忽性背信、欺骗性背信和故意性背信三类,进而明确具体背信行为的处罚类型。任何客观行为都是主观心理的外化。在“背信”的语境下,行为人实施所谓的背信行为实际上已经对其自身需要作为的具体内容有所了解。单纯就背信行为而言,任何的背信行为实际上都是在明确的主观心理支配下的客观行为,也就可以认为所有的背信行为都是主观失信,那么这种分类就没有存在必要。此外,该

学者还认为对于疏忽性背信不存在处罚必要。因为疏忽性背信是受托人主观上存在失误,对于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认定为故意而应当是过失。这种观点同样错误理解了背信罪中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的真正内涵:在一段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对于委托人的要求以及自己的义务都处于明知状态,所以即使是受托人陷入了“疏忽”状态,也不能直接从“疏忽”的字面含义出发,简单判断其主观心理^[11]。在这种受托人明知自身义务却仍然使得委托人的财产陷入“疏忽”状态进而遭受损失的情况,应当被认定为是间接故意心理,也就应当受到处罚。实际上,对于背信罪主观心理的判断十分简单,除单纯受到经营风险等不可抗客观因素影响外,任何对委托人财产造成的不利结果,都可以归结为受托人的主观故意(间接故意)。此外,背信罪的主观方面还包括对于目的的判断,在日本刑法中,背信罪就是以谋求自己或者第三者的利益或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为目的的目的犯。但是现阶段,设立背信罪并不需要具有“为己牟利或损害他人利益”这一具体的目的。一方面,为自己牟利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目的在实践中难以判断。在具体的金融环境下,面对各种风险以及大量的外部因素,将某一可能影响委托人财产的信托行为认定为具有上述主观目的的难度过高。另一方面,上述主观目的与侵犯财产犯罪中的部分犯罪目的一致,如果认定背信罪的设立也需要此主观目的,那么本罪与部分财产犯罪便难以区分,进而可能出现立法上的漏洞。所以,背信罪的主观方面,需要重点关注“故意”因素;对于主观目的,可以不做考虑。

3. 背信罪的客观方面。其客观方面从概念观之,应是“违背与委托人之间的约定,实施了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对于“违背约定”这一客观要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判断:先是根据受托人的具体信托行为;再是根据委托人的主观理解。综合这两方面要素,作出受托人有无违背约定的实际论断。对于本罪的整体客观要件,上文中已经提及“违背约定”是区分背信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前置条件,“造成损害结果”是确定某一行为构成背信罪的入罪门槛。换言之,背信罪的客观方面呈现阶梯状分布,只有满足“违背约定”的前置条件,才能根据财产损失对具体行为进行背信罪的判断。

4. 背信罪的客体。本罪的客体不应当是单纯的财产权,而是以金融秩序与信任关系为主、以财

产权为辅的复杂客体。从法律分布角度观之,现有的背信犯罪都集中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而非第五章的财产犯罪,证明立法机关对于背信犯罪的客体判断应当是金融秩序。此外,与传统财产犯罪不同的是,背信犯罪行为多发生在金融活动中,其关注的重心自然会偏向金融秩序与交易信用。从修法的频率判断,作为传统犯罪的财产犯罪基本不会被修改,但具备行政犯罪性质的金融犯罪却是常改常新,具备相当的时效性。假设背信罪的客体是财产权,那么在设立背信罪之后,根据客体进行犯罪分类的刑法便会将本罪归类至第五章,随后便会出现背信罪常常修改、而其他财产犯罪雷打不动的不协调局面。因此,背信罪的客体不应当是财产权,而应是以金融秩序与信任关系为主、以财产权为辅的复杂客体。

(二)背信罪的兜底条款设置

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实质要求是,不仅要能够解决现有的问题,更要对未来的潜在背信风险行为进行预先规制。在立法技术中,设置类似“其他”等兜底条款的罪名,往往被认为是口袋罪。上文中已经阐述了背信罪的基本构成要素,都是具体而明确的,因此不会像非法经营罪一般沦为口袋罪。设立背信罪的浪潮早在20世纪末便已掀起,但因频繁的修法掩盖缺少背信罪的问题,导致这一观点被人们忽视。随着最新修正案的不断被关注,设立背信罪的意见又重新被人们重视。先前频繁修法能够掩盖缺少背信罪的问题,但也正是频繁修法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增设背信罪,不仅刑法的谦抑性会被打破,司法资源也会不合理地向金融背信领域倾斜。而在增设背信罪的基础上,如果背信罪并不具备能够预防未来部分背信犯罪的能力,那么背信罪的设立便毫无意义,刑法修正案仍然会频繁地出台,来被动地填补背信犯罪漏洞。因此,在背信罪设立的过程中,有必要增加兜底条款,使背信罪能够防御现有背信风险的同时,具备一定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这样就可以减少刑法修改频次,进而确保刑法的谦抑性。

在明确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兜底条款的设置后,整合设立的背信罪条文,大致内容应如下:

受托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滥用代理他人事务的权限,实施违背其任务或信任的行为,致使委托人财产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并限制受托人经营资格一年;致使委托人财产利益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限制受托人经营资格三年。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处罚金,同时依照前款规定限制单位经营资格,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其他违背信用行为,给他人财产造成损失的,依第一款规定处罚。

结 语

面对日益频发、影响甚广的背信罪,单纯依靠刑法修正案这一被动路径难以规制,增设背信罪或许是全新路径。在讨论整合设立背信罪的同时,需要从“理论—实践—具体可行性”的递进式逻辑视角出发进行判断。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判断其正当性,从背信罪的构成要件并非模糊、背信罪的设立并非会沦为口袋罪角度出发,思考增设背信罪的初步理论正当性基础;其次,从实践层面确定其必要性,应该从频繁修法但弊大于利、法秩序统一性角度出发,明确增设背信罪的深层实践必要性基础;最后,从规范层面讨论其可行性,应该从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兜底条款的设置出发,思考设置背信罪的最终具体可行性。

我国背信罪已然有高发之势,刑法在惩治该类犯罪之时,虽显成效但流弊甚多。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惩治与治理机制最适合应对当前的问题和挑战,暂且认为整合设立背信罪较适宜。增设背信罪并非盖棺之论,更多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思索,希冀通过对背信行为的研究,检讨弊病、厘清进路,共同寻找并论证妥洽的破解之道。

参考文献:

- [1]郑泽善.背信罪新探[J].政法论丛,2015(1):80.
- [2]张明楷.关于增设背信罪的探讨[J].中国法学,1997(1):67-73.
- [3]王骏.论增设普通背信罪[J].河北法学,2018,36(12):88-101.
- [4]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72-373.
- [5]彭文华.背信及其刑法规制[J].当代法学,2020(6):88-98.
- [6]柏浪涛.我国当前不宜增设一般性背信罪[J].湖湘法学评论,2024,4(1):11-15.
- [7]姜涛.刑法的明确性与口袋罪之限缩适用:兼论“明确优于不明确”公式的运用[J].政治与法律,2023(4):113. (下转第92页)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周兴陆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以新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基础,从社会转型、文艺管理等视角,以禁毁主体、原因效果、法律制度为主体,梳理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何承袭传统、发生新变;揭示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管理制度和活动相较于清代前中期发生变革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因。全书文献资料翔实,研究视角精当,研究内容深入,问题意识突出,“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张天星;拓展;深化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24.04.014

多年来,清代小说戏曲的禁毁问题一直是具有一定关注度的话题。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活动最频繁、最严厉,现象突出,与禁毁相关的问题是研究清代小说戏曲、思想文化、法律制度等难以回避的内容。但目前对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缺憾,即清代前中期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较集中,晚清的小说戏曲禁毁问题关注较少。张天星新著《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版,以下简称《禁毁问题研究》)即是填补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空白的一部力作,该成果在文献资料、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内容等方面全面推进和深化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堪称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局之作。

一、文献资料翔实

《禁毁问题研究》是张天星研究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长达15年的学术结晶。在2008年前后完成博士论文《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

间,张天星发现晚清报刊刊载有大量小说戏曲禁毁史料,遂留心整理该类史料,最终汇集成《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上、下)》。该汇编获批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汇编时间跨度从1869年至1911年,涉及刊载有小说戏曲禁毁史料的晚清中文报刊70余种,共收录小说戏曲禁毁史料2000多则(篇),近百万言。该汇编较大地丰富了清代小说戏曲禁毁史料,其学术价值获得学界的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前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进先生认为:该汇编是目前所有同类中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著作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也是所涉地域最广、所涉城市最多的一部。它基本上显示了当时的历史概况,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相关资料。该汇编的问世,将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晚清戏曲小说的深入研究,开创一个研究的新局面^[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2015年元明清文学研究综述》评价说:张天星《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一书共从70余种晚清中文报刊上获得小说戏曲禁毁史料2300余则,按照禁毁令章、查禁报道、禁毁舆论的分类

方式,以时间先后为序,首次将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较完整地整理呈现出来^[2]。文献资料是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石。《禁毁问题研究》在文献利用上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对晚清报载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其实,这也是研究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的内在要求:一者,从传播媒介上看,晚清小说戏曲传播开始有了近代报刊的参与,近代报刊以其无所不载的丰富性和快速传播的时效性保存了大量小说戏曲禁毁史料;二者,晚清报刊还相当程度上参与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报刊通过登载论说和新闻、制造舆论、新闻曝光、呼吁查禁、褒扬先进、批评落后等方式直接参与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充分占有和利用报载禁毁史料的基础上,《禁毁问题研究》还兼及方志、日记、小说戏曲文本、善书、广告等文献史料。于是,《禁毁问题研究》有了“人详我略、人略我详”^{[3]15}的底气,在每一研究方面几乎都做到了补前人所未备,或发前人所未发,诸如绅士、善会善堂、州县官、地保、差役、警察等如何参与禁毁及其影响,庚辛禁毁运动和小说界革命的关系,禁毁活动对晚清小说编刊的影响,晚清上海租界的小说戏曲查禁活动的认识价值,查禁刑罚在晚清的近代转型等,都多有发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学界一般认为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运动是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禁毁小说运动,张天星则用翔实的史料证明1900—1901年跨越江浙两省的庚辛禁毁运动才是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禁毁小说运动。其余对清廷查禁《新小说》的经过和影响、宁波官方查禁串客推动甬剧“生在宁波,长在上海”文化现象的生成等,都是运用新见史料考证禁毁问题的范例。

二、研究视角精当

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视角相当程度上左右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基本思路乃至创新之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张天星有清楚的认识:“要突破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的点状研究现状,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成为必需。”^{[3]11}笔者认为,在张天星强调和实施的研究视角中,“社会转型”和“文艺管理”两个视角可圈可点,可谓抓住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牛鼻子”。

其一,社会转型的视角。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中国逐渐加速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艰难转型,“变”是晚清社会文化的整体趋势。由于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牵涉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政策、法治思想和社会治理,“特别能体现晚清社会文化转型中‘旧’和‘新’交锋与融合的历程,也特别能从文学艺术方面反映晚清社会转型沉重而艰难的历史原貌”^{[3]11}。《禁毁问题研究》用社会文化转型眼光审核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贴近历史地揭示出禁毁主体、禁毁原因、禁毁法制等在社会转型中的具体呈现,既有宏阔的鸟瞰,也有细微的审视,很好地解决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为什么转型、如何转型等系列问题。例如,从禁毁原因的流变上,《禁毁问题研究》在研究比较中认为:清代中期以后,文字狱消歇、文网渐弛,自清朝入关以来一直保持的、高压的钳制思想言论的文化政策趋于松弛。晚清国运日蹙,内忧外患,西学东渐,报刊兴起,新闻舆论日渐活泼,清廷禁锢思想、清除异端、禁止抵触本朝等动机有心无力,对海盗的指责也相对微弱,遏制海淫遂成为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最普遍的原因。清末启蒙运动兴起,海淫和迷信关乎民德、民力、民智,遏制海淫和迷信小说戏曲成为清末禁毁活动的两大要因。又如,在禁毁主体的变革上,《禁毁问题研究》揭示出:清代前中期禁毁主体基本由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主导,晚清禁毁活动的主导权由中央层面向地方层面转移;家族、士绅、善会善堂等民间主体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晚清禁毁活动的常态化;州县等地方官通过颁布告示、督促差保、亲自缉查、审理判罚等方式主持基层查禁;差保因容隐、勒索、谋利和避责,会让基层禁毁活动形成张弛相间的查禁态势。清末创建警政,警察开始成为小说戏曲管理的法定力量。《禁毁问题研究》揭示了查禁和时势的纠缠结合和冲突融合,梳理出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的发展态势和细节表现,很好地回答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承古萌新的时代个性。

其二,文艺管理的视角。小说戏曲禁毁问题与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紧密关联,其传播涉及意识形态和治安风化,有合理管理之必要。本质上讲,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属于文艺管理的范畴。过去,受时代风气或研究视角的局限,不少研究者过度强调了禁毁问题中统治与被统治、文化打压和反打压等对立关系。《禁毁问题研究》在批判晚清官方和道德之士崇雅抑俗、压制民众娱乐需求、一

刀切地禁断等保守禁毁观念和行为的同时,也注意到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晚清剧场事故、色情演出、凶恶戏和迷信戏搬演、演戏聚赌、违禁小说出版等层出不穷,禁毁活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淫秽小说戏曲的编撰和传播,净化了文化市场,对夜戏、赌戏、借演戏敛钱的禁止客观上也有益于社会安定,晚清禁毁小说戏曲活动有其合理的一面。”^{[3]533}由于感到“禁毁”“查禁”等词语难以涵盖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的全部,该书能按照历史、研究的逻辑,运用文艺管理的视角,揭示出晚清禁毁小说戏曲活动如何具有过渡性,即中国近现代文艺管理制度在晚清禁毁活动中萌芽并开始建立,并提出许多创见。如认为:官方和民间的查禁原因还萌生了开启民智、培育近代国民的因子;清末创办警政,警察代替差役参与小说戏曲管理,开始结束传统文艺管理人员驳杂的局面。伴随近代警政内容的社会化,官方小说戏曲管理开始从以禁为主的管理理念向禁止、审查和扶持三者结合的管理理念转型;《大清律例》规定的小说戏曲禁毁刑罚的碍难执行以及西方法律制度的输入,使小说戏曲管理法规实现了轻刑化。在清末,小说戏曲违禁被作为风化罪列入《违警律》,最重的处罚是罚金或拘留。晚清小说戏曲禁毁中管理动机、管理理念、法律制度的变革是中国近现代文艺管理制度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这些观点言而有据、言之成理,对推动中国近代文艺管理制度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三、问题意识突出

突出的问题意识是该书的主要特色之一。全书各章都贯穿了作者对研究对象“是什么样的呈现—为何是如此呈现—如此呈现具有什么样的认识价值”的研究叩问,把禁毁研究的系列问题引向深入,并获得客观结论。

例如禁毁主体研究,该研究一直是禁毁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晚清禁毁主体已由清代前中期的中央主导转移到地方主导,《禁毁问题研究》兼顾官方和民间,从家族、善堂善会、士绅、州县官、差役、地保、警察等方面考察晚清禁毁活动的主体。在研究中,作者梳理这些禁毁主体参与禁毁活动的表现及其原因,归纳该主体参与禁毁活动对禁毁制度的影响。例如,家族参与禁毁的方式包括

禁藏小说戏曲刊本、禁止子女阅读小说戏曲、禁止女性外出观剧、禁止子孙择业优伶、禁演花鼓。惩戒方式是训斥和体罚,以及对沦为优伶的族人不准入谱和宗谱除名。家族禁抑小说戏曲包括禁止子弟观看小说戏曲的原因主要是防止败坏心术、耽误正业、有误文章,禁止女性外出观剧主要是严男女之防和防止人身伤害,禁止子孙择业优伶是防止由良入贱,禁演花鼓是防止败俗滋事。造成的影响是:家族禁抑小说戏曲活动将禁毁小说戏曲观念和舆论日常化、生活化,并通过官方俯就民意和家族精英参与官禁等方式,实现了民间禁毁意愿与官方禁毁意志的相互转化。最后得出家族对禁毁制度产生影响的结论:“清代家族禁抑小说戏曲活动是有清代禁毁小说戏曲活动兴盛的社会基础。”^{[3]163}其余善堂善会、士绅、州县官、差役、地保、警察等,在研究中皆是如此,即做到了明其传统、知其缘由、识其利弊、晓其影响。

再如禁毁效果研究,即禁制执行过程产生的效果。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思考禁制效果时没有用禁毁与反禁毁这种对立思维来思考问题,而是符合历史实际地解析禁制执行过程中如何被禁止与抵制、配合与消解、固守与变通的复杂呈现及成因。例如第四章“州县官”和第二十三章“清代查禁小说刑罚在晚清的近代转型”,分析州县等地方官为什么不愿意按照《大清律例》规定的杖、徒、流等刑罚判处违禁者,用确凿的史料证明州县等地方官在法律实践中使用笞刑、枷示、掌颊、罚金等刑罚判处小说戏曲违禁者,以便宜行事的方式在自觉不自觉中变革了清代禁毁法制。其中可以看出清代官员对禁制的固守和变通,正是这种变通为查禁法制的近代转型埋下了内因。第五章“差役”和第六章“地保”分析差保在查禁与违反、配合与消解中执行禁令,从而形成基层查禁活动张弛相间的管理态势,有理有据地说明传统文艺管理制度与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之间适应与矛盾、迎合与背离的复杂关系。第十六章“晚清小说创作中的自我禁抑现象”和第十七章“禁毁小说活动对小说编刊的影响”则分析了作家和书贾在禁毁政策、禁毁舆论等作用下自我禁抑的侧重点及其表现,说明作家和书贾对禁制的遵奉、违反和配合等丰富的心路历程。此类研究,深入思考,证据充分,贴近历史,评价客观,足以深化对禁制效果复杂性的认识。明确的问题意识,增加了本书研究的深度。

四、研究内容丰富

小说戏曲禁毁问题不仅牵涉编创、传播、接受等小说戏曲研究本身,还与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紧密关联,又是传统教育观、女性观、情欲观、养生观、治生观的部分折射,其内涵纷繁复杂。《禁毁问题研究》采用点面结合,以个案为切入点,辅以综合概括的章节和结语,全书包括绪言、正文、结语等部分。正文由第一编禁毁主体、第二编禁毁原因、第三编禁毁效果、第四编禁毁法制等四编构成,凡计二十三章,框架思路较严密,辐射较全面。在禁毁主体研究上,该书抓住晚清禁毁主体已由清代前中期中央主导转移到地方主导这一趋势,兼顾官方和民间。官方主体包括州县官、差役、地保、警察,民间主体包括家族、士绅、善堂善会,将晚清禁毁主体参与禁毁的具体形式、作用、转换和认识意义较全面地呈现出来。在禁毁原因上,该书将禁毁动机分为观念性禁毁和制度性禁毁,认为二者属于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关系,具体涉及海盗即认为小说戏曲内容鼓励和诱导以武犯禁、犯上作乱;海淫即认为小说戏曲内容或戏曲表演诱人淫亵、有伤风化。此外,戏曲因传播和接受时需要聚集人群、敛钱搬演、关联习俗,妨碍治安、有害民生、丧戏违礼也是被禁的要因^{[3]530}。为防止窒碍民智民德,清末还禁止海淫和迷信的小说戏曲。该书在突出海淫这个晚清最突出、最普遍禁毁原因的同时,较全面地梳理出禁毁原因的方方面面。在禁制对文学内外部影响的研究上,该书既着力于探讨禁毁主体、原因、法制等外部研究,也深入到禁制对小说戏曲主题、文本形态、作家和书贾的

自我禁抑等内部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格局上全面拓展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总之,《禁毁问题研究》论禁毁主体兼顾官方和民间,析禁毁原因兼及制度禁毁和观念禁毁,谈禁毁效果突出其得计和失策的深层问题,辩查禁刑罚强调其转型意义。最后在结语中总结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活动对当前文艺制度建设的镜鉴意义,体现了研究者的现实情怀。全书“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中国近代社会不过倏忽80年,但近代文学遗留下需要解决的问题纷繁复杂。概言之,造成近代文学繁杂性的要因主要有二:其一,近代文学古今交融、中西交汇,其新旧杂陈、冲突融合的复杂性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二,近代去今未远,新闻出版采用近代新技术,遗留下海量文献。如何在繁杂的近代文学和文献中抽丝剥茧、寻觅学术增长点,张天星选择了从文献搜集整理到研读提问的治学之途,也许这种治学之路成果出得少、出得慢,难以应对当前的量化、绩效考核,但却是近代文学研究行之有效的途径。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并探索一些理论问题,根基才牢固,立论才可靠。

参考文献:

- [1]袁进.一部极为重要的史料汇编:评《晚清报载小说戏曲禁毁史料汇编》[J].中国文学研究,2016(3):127-128.
-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201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06.
- [3]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4.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Qing Dynasty

—Comment on Zhang Tianxing'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ou Xing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ca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newly banned historical materials, Zhang Tianxing'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udies the activities of banning and destroying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inherit tradition and make new changes in the main contents of subjects of prohibition, causes and effects, leg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ctivities of banning and destroying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has full of detailed documents, precise angles of view, in-depth contents and outstandi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search ideas of continuing traditions, new changes and present time conne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end in the research. In a word, the research has expanded the new way of research on banning and destroying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eepened the academic horizon of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hibition and Destruction of Novels and Opera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Tianxing; expansion; deepening

(上接第87页)

[8]葛恒浩.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成因与出路[J].当代法学,2016,30(4):70.

[9]张义健.刑法修正案(十二)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24(2):71-83.

[1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EB/

OL].(2017-11-04)[2024-03-24].<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4Nzc1NDBhYTU%3D>.

[11]谭琦琦.我国增设普通背信罪探讨[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26(3):20-26.

A Reflection on the Crime of Breach of Trust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Ruan Junjie

(School of Criminal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ision of *Amendment (XII)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rime of breach of trust has once again entered the public eye. The integration of its establishment needs to be judged from a progressive logical perspective of "theory — practice — concrete feasibility".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determine the legitimacy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involving that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are not vague, and that its establishment will not be reduced to a pocket crime, which is to provide prop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ts establishment. Practical necessity is then identified on the practical level, which should depend on two perspectives to provide practical necessity. One is the frequent interven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which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unity. Finally, its feasibility should be discussed on the normative level. The feasibility can be achieve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establishi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breach of trust and setting up catch-all clauses.

Keywords: crime of breach of trust; pocket crime; catch-all clauses;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台州学院·校史馆

历史厅展示了学校百年办学历程中栉风沐雨的发展故事。以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个个精美的模型、一段段厚重的视频，展现学校创办初期敢为人先的革新、战争年代弦歌不辍的坚韧、师专时期的蓬勃发展、升本以来的显著成就，勉励师生们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校史馆·序厅



校史馆·历史厅

成就厅分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工作、教育国际化、服务地方、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七个部分。以一串串数据、一张张证书，呈现台州学院各时期的发展业绩，展示了学校以“地方性、应用性、综合性”为办学定位并逐步成长为台州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源”和“助推器”的办学成就。



校史馆·成就厅

校友厅分为校友毕业合影照、优秀校友、校友会（基金会）、我与校友合影四个部分。恢恢学府钟毓秀，桃李芬芳出名贤。校友中涌现了作家许杰，革命家王观澜、徐明清、陈法文、郭凤韶等优秀代表。展厅通过数字化技术，汇集了各时期校友们的事迹。如今，学校输送的毕业生更犹如繁星般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校史馆·校友厅

校史陈列室和校史馆以史实和史料为依据，图文与实物相结合，利用大屏联动、电子翻书、体感拍照等技术，全面展示学校的发展建设与光辉历程，真实反映台州学院百年育人史，激发了台州学院人知校、爱校、荣校、兴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中国·台州

TAIZHOU CHINA

主管单位 台州学院

Authority Tai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台州学院

Sponsor Taizhou University

主编 李钧敏

Editor-in-chief Li Junmin

副主编 邵凯云

Deputy Editor Shao Kaiyun

编辑出版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605号

Address No. 605, Dongfang Avenue,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邮编

Postcode 317000

网址

The URL <https://journal.tzc.edu.cn>

印刷单位 台州印刷厂(有限公司)

Printed by Taizhou Printing House(Co., Ltd.)

国内发行 台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Domestic Distributor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Taizhou University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782信箱 邮编: 100011)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782, Beijing 100011, China)

电子邮箱

E-mail xbb@tzc.edu.cn

电话

Tel. 0576-85137169

双月刊

1979年创刊

第46卷 第4期

(总第246期) 2024年8月20日出版

Bimonthly Started in 1979

(Issue No. 246) Vol. 46 No. 4 Aug. 2024

封面题字: 沙孟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2-3708

CN 33-1306/Z

定价: 12.00元



ISSN 1672-3708



9 771672 370241